

申 报	系列：教师系列 教学科研并重 型
	专业：英语
	职称：副教授

业绩成果材料

（申报人的业绩成果材料包括论文、科研项目、获奖以及其他成果等）

单 位（二级单位）____外国语学院____

姓 名 侯丽娴

材料核对人：

单位盖章：

核对时间：

华南农业大学制

目 录

一、教学研究业绩

1. 教学研究项目：

- 1.1. 关于“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跨文化教学改革与实践——以《中外文化比较》课程为例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校级项目，主持人） 5
- 1.2. 入选华南农业大学第二批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及有关佐证材料（等同校级教改项目，主持人）9
- 1.3.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英语”模块课程融合课程思政的探索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B类项目，参与人） ..11
- 1.4. 关于学术交流英语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资料（C类项目，参与人） 20
- 1.5. 关于“学术英语模块课程协同育人虚拟教室”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资料（校级项目，参与人）24
- 2. 教改论文：
 - 2.1. DPE - 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研究.....27
 - 2.2. 移动技术与情感教学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44
- 3. 教学成果：关于《基础学术英语》一流课程认定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省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参与人）53
- 4. 教学比赛证书..... 59

二、科研项目

- 1. 主持：关于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项目的立项通知（合同）及有关佐证（B类项目）61
- 2. 主参：

2.1. 关于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B 类项目)	66
2.2. 关于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项目的立项通知及有关佐证材料(A 类项目)	74

三、论文、著作等

1. 检索证明.....	79
2. 以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论文情况	
2.1.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hina:situat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B 类论文)	82
2.2.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C 类论文)	106
2.3. 青年网络短视频女权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研究(B 类论文)	126
2.4. 香港青年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研究(普刊) .	141
2.5. 香港青年大湾区短视频实践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研究(普刊)	150

四、其他业绩

1. 指导学生学科竞赛	
1.1.2024 年“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短视频大赛广东省省赛金奖(B 类学科竞赛)	158
1.2.2021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一等奖(B 类学科竞赛)	159
1.3. 广东省第九届“联盟杯”本科高校英语写作大赛英语专业组特等奖(B 类学科竞赛)	160

2. 个人荣誉	
2.1.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一批）	161
2.2.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	162
2.3. 获选华南农业大学 2019-2020 年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候选人.....	163
3. 连续 9 个学期教学评价排名前 20%.....	164
4. 关于港澳台侨统战工作新趋势研究：以香港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为例项目的立项通知（校级项目主持人）	165
5. 社会服务.....	166

华南农业大学文件

华南农教〔2024〕52号

关于公布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经项目负责人申报、所在单位推荐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决定立项“基于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人才需求的智能网联技术课程改革”等 121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等 36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根据学校年度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及本年度申报项目质量，立项“‘长基计划’下新文科历史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等 11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长基计划”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项目（经

- 1 -

费由“长基计划”专业专项资金资助)。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各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建设任务及要求,及时开展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学校人才培养改革,并力争取得高水平的教学成果。各单位要切实履行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督促、指导,以确保项目能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特此通知。

- 附件: 1.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立项名单
2.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立项名单
3.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长基计划”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立项名单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 8 月 15 日

(联系人: 孙齐胜; 电话: 85288020)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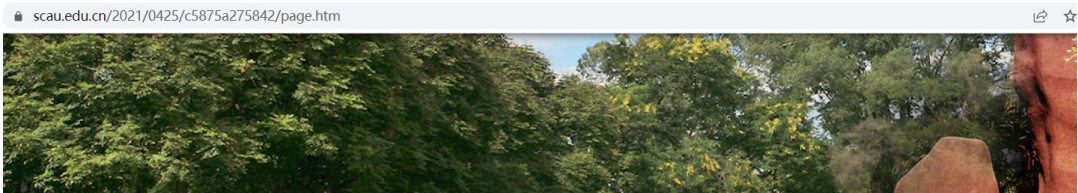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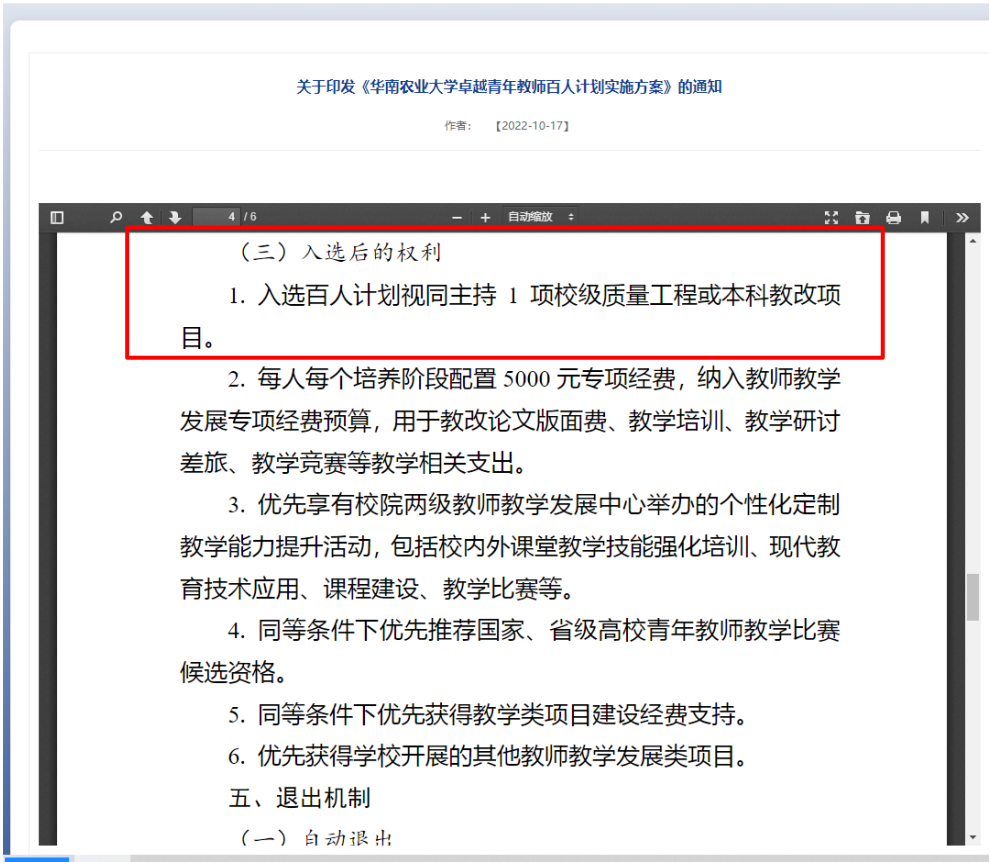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0 日印发
-------------	-------------------

华南农业大学2024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JG2024001	重点项目	工程学院	基于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人才需求的智能网联技术课程改革	吴伟斌	李庆、高锐涛、赵新、张建莉
2	JG2024002	重点项目	动物科学学院	基于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养猪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洪林君	孙宝丽、李耀坤、柳广斌、吴珍芳、邓铭
3	JG2024003	重点项目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数智驱动：AI赋能的 林木育种学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周玮	陈晓阳、张俊杰、骈瑞琪、欧阳昆唏
4	JG2024004	重点项目	公共管理学院	融合人工智能的土地资源管理“新文科”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刘轶伦	王红梅、袁中友、李灿、王枫
5	JG2024005	重点项目	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基于新时代就业形势的生涯教育课程本土化探索与改革	卢小圣	鲍金勇、肖华、陈巍、陈琦
6	JG2024006	重点项目	农学院	农学类专业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耕作学课程为例	王小龙	陈健文、祁剑英
7	JG2024007	重点项目	工程学院	基于OBE理念的工程伦理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	张亚莉	齐龙、李高扬、贾瑞昌、陈鹏超
8	JG2024008	重点项目	食品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的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苗建银	肖苏尧、曹庸、赵力超、宋明月、吕慕雯
9	JG2024009	重点项目	材料与能源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一流农林院校《材料物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张学杰	雷炳富、董汉武、梁业如、李唯
10	JG2024010	重点项目	经济管理学院	基于社会情绪和创新能力提升的课程教学改革——组织行为学为例	徐峰	万俊毅、尹爱兰、左伟
11	JG2024011	重点项目	图书馆	新媒体环境下知识产权素养微课程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程燕锋	刘熙东、何效平、刘洋、欧阳中一
12	JG2024012	重点项目	食品学院	面向行业应用及创新人才培养的《酿造工艺学实验》改革研究	蹇华丽	朱新贵、钟武杰、肖南、罗树灿
13	JG2024013	重点项目	植物保护学院	“双一流”背景下本科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以植物保护专业为例	崔紫宁	郝星宇、刘家莉、陈建平、陈奕
14	JG2024014	重点项目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营养学》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	谭成全	习欠云、任文凯、邓近平
15	JG2024015	重点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整体性比较视角下高校“四史”教育之党史课程内容体系构建研究	王景奇	袁尔纯、王超、孙华、陈珏君
16	JG2024016	重点项目	资源环境学院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环境工程专业“新工科沉浸式实践教学”模式探索	梁瑜海	余光伟、陈娴、仲海涛、黄荣
17	JG2024017	重点项目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设计表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刘京一	陈崇贤、夏宇、潘建非、李梦然
18	JG2024018	重点项目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多元协同培育创新型人才模式探索与实践——以管理科学类专业为例	韦婷婷	毛小娟、黄文玲、杨春、熊俊涛
19	JG2024019	重点项目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赵文锋	李若衡、彭孝东、郭琪
20	JG2024020	重点项目	基础实验与实践训练中心	基于“互联网+”的新工科工程训练云平台构建研究	温威	王红军、何剑飞、孙志全、刘小波、张殿武
21	JG2024021	重点项目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新农科引领下林学一流专业改造提升路径探索与实践	刘效东	何茜、苏艳、李雪
22	JG2024022	重点项目	资源环境学院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探索与革新——以《土壤学》为例	李博	卢瑛、任宗玲、白翠华、何艳玲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单位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71	JG2024071	青年项目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农业院校“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探索	邱少健	周敏、祝胜林、李舜鹏
72	JG2024072	青年项目	人文与法学学院	“双一流”背景下农林院校“农文化+文学”教育模式新探索	张吕坤	王瑛、孙宗美、李飞
73	JG2024073	青年项目	经济管理学院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改革	徐光毅	杨学儒、郭萍、冯江洪
74	JG2024074	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田野调查在思政育人中的创新与运用	张慧慧	王敏、李若衡、杨琳
75	JG2024075	青年项目	食品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OBE理念的“畜产品加工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	郭宗林	郑华、吴绍宗
76	JG2024076	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问题链教学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的创新与运用	林逸云	林晓希、周轩宇
77	JG2024077	青年项目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中华水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陈文杰	周浩澜、姜俊红
78	JG2024078	青年项目	国际教育学院（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农业院校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口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研究	邱倩	陈喜华
79	JG2024079	青年项目	兽医学院	“兽医寄生虫学实验”课程思政改革研究	许瑞	冯耀宇、夏宁波
80	JG2024080	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	高校思政课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视域研究	孙晓晖	谢倩
81	JG2024081	青年项目	马克思主义学院	时间视域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升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孙飞争	钟健、刘晓雷、王超
82	JG2024082	青年项目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基于OBE和云边协同的DSP技术与应用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	高鹏	宋淑然、李震、孙道宗、吕石磊
83	JG2024083	青年项目	园艺学院	《园艺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彭泽	张志珂、杨向晖
84	JG2024084	青年项目	动物科学学院	新农科背景下高质量动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何小敏	陈志远、邓铭、付晓兰、陈婷
85	JG2024085	青年项目	海洋学院	基于 OBE 理念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	苏婉	祁红、彭金富、杨慧荣、林慷祺
86	JG2024086	自筹项目	工程学院	多维视角下的《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教学：思政教育与工程知识的融合	李成杰	李长友、张烨
87	JG2024087	自筹项目	食品学院	“新工科”视角下基于OBE教学理念的《食品有害物质检测分析》多模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王群	曹庸、刘晓娟、苗建银、李梦婷
88	JG2024088	自筹项目	基础实验与实践训练中心	《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数字资源的构建与实践	许可	詹福建、许燕珍、母培强、何平
89	JG2024089	自筹项目	公共管理学院	新文科“专创融合”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新文科创新创业思维与就业力提升》课程为例	周毅	申佑佑、贾海薇、余祥、郭雪倩
90	JG2024090	自筹项目	外国语学院	“讲好中国故事”视域下跨文化能力教学改革与实践——以《中外文化比较》课程为例	侯丽娟	文珊、侯金萍、郭圣琳、赵轶哲
91	JG2024091	自筹项目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三全育人”背景下《编译原理》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王海燕	方凤美
92	JG2024092	自筹项目	工程学院	课程思政在《燃烧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中的实践	胡志锋	任永志、吕娟、马巧智
93	JG2024093	自筹项目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以学生为中心的《传感器与检测技术》课程整体优化研究与实践	赵懿琨	刘洪山、谢家兴、梁亨茂、韩宋佳
94	JG2024094	自筹项目	外国语学院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英语影视听说》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李姝惠	彭英、吕丽珊、王世龙

侯丽娴（第 34 号）入选华南农业大学第二批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截图）；华南农办〔2020〕4 号：四（三）入选后的权利 1. 入选百人计划视同主持 1 项校级质量工程或本科教改项目（截图）



关于华南农业大学第二批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入选名单的公示

审核发布：人力资源处 来源单位及审核人： 发布时间：2021-04-25 浏览次数：4636

各学院（部处、中心）：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华南农办〔2020〕4号）精神，学校开展了华南农业第二批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遴选工作，经各学院（部处、中心）教师自愿报名、学校资格审查、遴选后，确定王小龙等4师为第二批卓越青年教师百人计划入选者，现予以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农学院	王小龙
2	农学院	金晶
3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吴道铭
4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单体江
5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李培
6	园艺学院	赵杰堂
7	动物科学学院	谭成全
8	动物科学学院	蔺文成
9	动物科学学院	李耀坤

10	动物科学学院	孙宝丽
11	资源环境学院	李荣华
12	资源环境学院	张池
13	海洋学院	黄玉妹
14	海洋学院	孙红岩
15	海洋学院	曾芳
16	食品学院	宋明月
17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杨雨冰
18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卢小圣
19	材料与能源学院	刘维
20	材料与能源学院	袁腾
21	材料与能源学院	刘海峰
22	数学与信息学院	王雪琴
23	数学与信息学院	金玲玉
24	数学与信息学院	李娇娇
25	数学与信息学院	周燕
26	经济管理学院	董莹
27	公共管理学院	曾永辉
28	公共管理学院	王枫
29	公共管理学院	徐强
30	公共管理学院	曲霞
31	人文与法学院	李颖
32	外国语学院	林绿
33	外国语学院	郭圣琳
34	外国语学院	侯丽娟
35	艺术学院	栗志弘
36	艺术学院	欧阳文昱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梁娟
38	植物保护学院	郑正
39	植物保护学院	徐春玲
40	植物保护学院	孔广辉
41	植物保护学院	刘家莉
42	植物保护学院	陈少华

公示时间为2020年4月25日至5月1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内实名向人力资源处教师发展中心反映，匿名及其他形式的异议恕不受理。

联系人：吴长芹 卢菁 顾瑞

地 址：行政楼916室

电 话：85285590

邮 箱：325879657@qq.com

人力资源处

2021年4月25日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2023〕4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2 年广东省本科 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安排，经学校遴选推荐、省教育厅审核、评审、公示及异议复审等环节，现将 2022 年省本科高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情况

确定立项建设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7 个、校企联合实验室 23 个、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58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44 个、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2 个、课程教研室 112 个、现代产业学院 23 个、未来技术学院 1 个、专项人才培养计划 58 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781 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委托类）

5 个。具体立项名单见附件。

二、项目管理

（一）本次公布项目均为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建设项目经学校组织建设、校内结题并通过省教育厅统一组织项目验收后，正式认定为省级项目。

（二）项目正式实施前，请确保已对项目建设目标、建设举措、预期成果、建设进度安排等进行科学论证，论证专家应不少于 5 人，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外校。论证后的目标、任务等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时的重要依据。

（三）项目日常管理由学校主管部门负责，学校应统筹做好项目中期检查、校内结题验收等工作。校内结题时，邀请校外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满足以下条件的项目，经学校正式申请，可以参与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项目验收：

- 1.项目已完成立项时设定的主要建设任务和目标；

- 2.项目已取得标志性建设成果，且该成果已在教学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有效应用；

- 3.已按照要求完成项目校内结题；

- 4.符合当年度省统一验收规定的其他条件。

各校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将作为学校下一年度项目立项限额的参考依据。

（四）项目实施过程中，其名称、建设内容（任务）、建设目标、建设周期、主要负责人、预期成果等发生重大变更的，需

由时任项目负责人在发生变更后及时提出，经学校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由学校正式来函说明原因；擅自变更上述内容的，验收评定时列为不通过。

三、其他事项

（一）2022 年度各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并获得立项的项目，学校须将项目校内评审、推荐及论证相关材料妥善保存，留底备查。

（二）各校要统筹本校“冲补强”提升计划资金及自有资金对立项项目予以资助，项目获得学校资助情况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时重要考察因素之一。如项目建设中取得具有推广价值的优秀成果，请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厅高教处。

联系人：李成军、傅兴淙，联系电话：020-37626882、37627703。

附件：2022 年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立项项目名单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校对人：傅兴淙

43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融合“树医生”理念的《园林植物栽植与养护》课程思政与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刘天丽
43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教学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本科生评教指标体系的优化	贾莉
43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农林院校数学类公共基础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实践	丁仕虹
43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问题驱动下农林院校的数学分析课程线上线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王石安
43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英语”模块课程融合课程思政的探索	冯立新
43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助力乡村振兴的高阶性新型农商复合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齐文娥
43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大思政课”视野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改革与实践	崔芸
43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肖前
43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知识地图的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微课体系构建研究	刘小波
43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乡村美育实施背景下农林院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朱虹
44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教学核心素与“三农”情怀融合的《大学数学I》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曹静
44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双一流”背景下农林高校公共基础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大学数学课程群为例	李朗
44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馆校协同+合作学习”的历史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	龚金红
44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思政教育融合双创教育在专业实验课程中的研究与探索	罗霞
44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课程思政建设的高校体育课程研究	周华锋
44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双一流”建设农林院校本科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研究 ——以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为例	熊俊涛
44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后疫情时代全英《植物学》国际化教学探索	龚维
44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知农爱农”的农业高校课程思政模式建设研究	张运红
44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落实“育德”教育与实践，打造《饲料生物技术》思政“金课”	孙加节
44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五维优化，三层互助”的专业课程改革、思政建设与实践 ——以《家具与室内材料学》为例	孙理超
45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夏宇
45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SPDC+PBL”的《形势与政策》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项赠
45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强综合、重实践、补短板——面向专业认证的科产教融合式建筑设计课教学改革	陈乃华
45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新工科课程思政一体化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测量学》课程为例	姚朝龙
45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基于PDCA与CDIO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汽车构造实验》为例	周锡恩
45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思政课程机制研究	李俊宏
45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	《用户体验设计》课程深度学习模式与效应研究	周秀
45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中医思维高阶培养的中医基础理论“IAC”教学法研究	安海燕
45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Python生物医学计算基础在线教学平台建设与应用	曹蕾
45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药物化学》课程教学综合改革实践	陈金香
46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计算机可视化的腹腔镜外科基础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陈韬
46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医学生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何江
46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新文科、大外语背景下英语读写主题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蒋文凭
46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大学附属医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金玥
46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医科院校专业课“纵横结合、德智交融”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以临床诊断学《症状学》为例	林春燕
46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标准化情景演练背景下的沉浸式教学在创伤急救课堂中的探索与实践	李旭
46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问题为导向的口腔组织病理学慕课课程构建及实践研究	麻丹丹
46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模拟高坠命案现场勘验的教学实验设计	缪启锋
46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成就需要激励理论的书院导师队伍建设研究	钱怡
46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知识图谱建设的《急危重症护理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史雷
47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新时代医学生体育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	宋军
47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OBE理念的内科学课程体系改革实践	孙嘉
47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临床实践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田智慧
47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卫生事业管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王冬
47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OSCE模式的《妇女健康与物理治疗》课程建设	王康玲
47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虚拟仿真实验结合CBCL教学模式在医学影像教学中研究与应用	文戈
47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小儿外科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吴凯
47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专业拔尖人才“四化优培”创新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吴砂
47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卫生经济学》课程思政设计与融入路径研究	向国春
47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三黄方”不同剂型的中药学专业综合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实践	张璐
48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基于卓越护理人才培养的外科护理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张萍
48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高阶能力导向的《分子生物学》课程设计与实践	周洋宇
48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南方医科大学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数理统计》项目驱动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庄严
48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E教学模式下融入化学史教育的有机化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陈传兵
48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骨伤科学影像判读与实践诊疗的教学研究	陈镇秋
48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学习投入度视角下中医四诊技能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与评价	陈卓群
48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新医科背景下课程思政赋能本科订单定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以《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为例	邓剑峰
48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三全育人”视域下《康复评定学》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	郝曼
48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大类招生下复合型创新药学人才培养为导向的化学基础课程 教学体系一体化构建与实践	何建峰
48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人工智能优化学习者认知负荷的教学实践研究 ——以《Python程序设计》课程为例	洪佳明
49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五抓四促三融合”：新医科视域下整合课程的改革和探索 ——以风湿免疫整合课程建设为例	黄雅丽
49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融入高校思政课程教学的实践路径研究	林志彬
49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以OBE理念为基础，对分课堂为载体，开启生理学混合式教学新篇章	刘海梅
49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多元化中医思维范式下夯实中医基础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刘凌云
49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TBL真实岗位能力导向的视光专业教学改革	刘求红
49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思维引导”“多维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模式 融入《中西医结合症学》的探索与实践	李志尚
49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管理产教融合项目化课程体系构建	庆艳华
49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案例的情景模拟在急危重症抢救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邱定荣
49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数据驱动学习在高阶《医学英语》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丘晓媛
499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基于系统评价法的“三维三课”有效教学翻转模式研究	任溪海
500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基于护教协同模式的护理学临床课程案例库建设研究 ——以《内科护理学》为例	吴燕
501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三师同堂”教学模式在中医康复规范化培训中的探索	谢韶东
502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广州中医药大学	教师模拟标准化病人在中医骨伤科学正骨理伤手法临实践教学中的探索应用研究	杨文斌
503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定向师范生跨学科体育教学能力培养模式构建	陈荣杨
504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师生共享 研学共进 心智共育——《普通心理学》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	陈莉茜
505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基于产出导向的近代物理设计性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	丁格媛
506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基于大学生综合人文素养训练与提升的文学理论系列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段吉方
507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五位一体”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侯永雄
508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华南师范大学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学术前沿与文献导读”的英语师范生科研能力培养实践	金檀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申 请 书

学 校 名 称 :

项 目 名 称 :

项 目 负 责 人 :

负 责 人 职 称 :

联 系 电 话 :

填 表 日 期 :



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英语”模块课程
融合课程思政的探索

冯立新

副教授

2022.11.4

广东省教育厅 制

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认可所填写的《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下简称为《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申请书》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 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究过程真实，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 遵守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有关管理规定以及广东省财务规章制度。

4. 凡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费使用问题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 项目立项未获得资助项目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经费时，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 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布、使用、宣传《项目申请·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负责人（签章）：



2022年11月4日

一、基本情况

项目 简况	项目名称	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英语”模块课程融合课程思政的探索						
	是否申报 省委托教改	是/否√ (申报委托教改须符合重点选题领域要求并参与竞争性遴选)						
	项目性质	√1. 研究性教改 2. 实践性教改						
	起止年月	2022.11 至 2025.10						
项目 负责人	姓名	冯立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REDACTED]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REDACTED]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学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华南农业大学		手机号码	[REDACTED]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1994-2014	大学英语	本科生		外国语学院		
		2015-至今	科技翻译	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		
	曾主持项 目情况 (限填近 3 年主持 项目情 况)	项目级别	项目名称				获批时间	
项目 组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3	3			1	4	1
	主要成员 (不含主 持人)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工作 单位	分工	签名
		梁红梅	女	[REDACTED]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主 讲、课 程设计	[REDACTED]
		苏安梅	女	[REDACTED]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主 讲、课 程设计	
		侯丽娟	女	[REDACTED]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主 讲、资 源建设	
		秦建华	男	[REDACTED]	副教授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主 讲、数 据分析	
		周美珍	女	[REDACTED]	讲师	外国语学院	课程主 讲、资 源建设	

学校教研项目系统已有记录

项目管理

首页

教研项目

系统帮助

通知公告

安全退出

申报人 | 侯丽娜

校级项目

▼

省级项目

▼

国家级项目

▼

参与项目

▼

5

2024

校级

质量工程项目

课程教研室

学术英语模块课程党建思政协同育人虚拟教研室

国际教育学院（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冯立新

Alex Runchman, 梁红梅, Stephen Kelly, 苏安梅, 侯丽娜, 秦建华, 周美珍, 邵家声, 郝刚

申报阶段

待学校审查

6

2024

校级

在线开放课程

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教育学院（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梁红梅

冯立新, Runchman, Alex, Kelly, Stephen, 苏安梅, 秦建华, 周美珍, 侯丽娜

华南农教（2024）53号

ZXKC202407

过程管理

开题论证待提交

7

2024

校级

在线开放课程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西方文明史）

外国语学院

侯金萍

朱捷, 尹晓霞, 张丁元, 侯丽娜, 陆杰, 1李雷鸣

申报阶段

待学校审查

8

2023

省级

省一流本科课程

基础学术英语

外国语学院

梁红梅

冯立新, Alex Runchman, 郝刚, 苏安梅, 周美珍, 秦建华, 侯丽娜

粤教高函（2023）33号

过程管理

开题论证待提交

9

2022

省级

教学改革项目

教改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学术英语”模块课程融合课程思政的探索

国际教育学院（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冯立新, 冯立新

梁红梅, 苏安梅, 侯丽娜, 秦建华, 周美珍

粤教高函（2023）4号

过程管理

中检待学校审核

10

2018

校级

教学改革项目

自筹项目

结合任务型教学法的《商务英语听力》课程教学改革

外国语学院

秦洁

贾丽, 吴章欣, 侯丽娜, 许瑾瑜, 钟建铃

华南农教（2018）43号

JG18099

结项管理

已结项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粤高校教管学会〔2022〕1号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关于公布 2021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关于开展2021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申报的通知》，学会组织开展了2021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的推荐与遴选工作。经专家评审，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共遴选出《生命科学研究课》等296个项目立项为2021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现将名单（见附件）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建设项目由项目的牵头高校和共建高校共同开展建设与研究。

二、牵头高校要做好项目的监督与管理工作，保障项目的建设进度与成效。

三、项目负责人要积极整合团队力量，按照要求开展项目建设，确保项目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四、项目建设期为2年，结题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 一门或多门课程融入课程思政完整的教案（包含每章节的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政融入策略、课程思政考核要素）；

2. 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思政案例集（每门课程至少10个）。

59	X-KCSZ2021059	广州工商学院	一般	基础会计	黄静	2000
60	X-KCSZ2021060	广州工商学院	一般	会计信息系统	周福萍	2000
61	X-KCSZ2021061	广州工商学院	一般	管理学	周桂凤	2000
62	X-KCSZ2021062	广州华商学院	一般	财务管理	杨俏文	2000
63	X-KCSZ2021063	广州商学院	一般	“六进四合三嵌”三位一体课程思政模式——以《资本运营理论与实务》为例	彭文华	2000
64	X-KCSZ2021064	广州商学院	一般	数据结构	黄静	2000
65	X-KCSZ2021065	广州理工学院	一般	经济学原理	黄爱青	2000
66	X-KCSZ2021066	珠海科技学院	一般	计算机应用基础	龚玉清	2000
67	X-KCSZ2021067	湛江科技学院	一般	中外舞蹈史	樊蒙蒙	2000
68	X-KCSZ2021068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一般	中国美术史	邓铨	2000
69	X-KCSZ2021069	华南理工大学	自筹	智能机器人创新实践	陈安	经费自筹
70	X-KCSZ2021070	华南理工大学	自筹	风景园林业务实习	赖文波	经费自筹
71	X-KCSZ2021071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物理光学	杨初平	经费自筹
72	X-KCSZ2021072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学术交流英语	梁红梅	经费自筹
73	X-KCSZ2021073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应用文写作	李桂芹	经费自筹
74	X-KCSZ2021074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大学英语	郑成英	经费自筹
75	X-KCSZ2021075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互联网创新创业	林钻辉	经费自筹
76	X-KCSZ2021076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公共体育课(体育舞蹈)	钞飞侠	经费自筹
77	X-KCSZ2021077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计量经济学课	芮玉红	经费自筹
78	X-KCSZ2021078	华南农业大学	自筹	采风	赵英姿	经费自筹
79	X-KCSZ2021079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卫生事业管理学	王丽芝	经费自筹
80	X-KCSZ2021080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急危重症护理学	史蕾	经费自筹
81	X-KCSZ2021081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精神心理照护学	陈瑜	经费自筹
82	X-KCSZ2021082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妇产科临床见习实习	王雪峰	经费自筹
83	X-KCSZ2021083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神经病学	蒋海山	经费自筹
84	X-KCSZ2021084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实验诊断学	郑磊	经费自筹
85	X-KCSZ2021085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消化道整合课程	厉周	经费自筹
86	X-KCSZ2021086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医学微生物学	曹虹	经费自筹
87	X-KCSZ2021087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口腔科学	陈婷	经费自筹
88	X-KCSZ2021088	南方医科大学	自筹	认知心理学	王优	经费自筹
89	X-KCSZ2021089	广州中医药大学	自筹	医院管理学	庞震苗	经费自筹
90	X-KCSZ2021090	广州中医药大学	自筹	生理学	关莉	经费自筹

附件 2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2021 年度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申报书

推荐单位 (盖章) _____

课程名称 学术交流英语

课程负责人 梁红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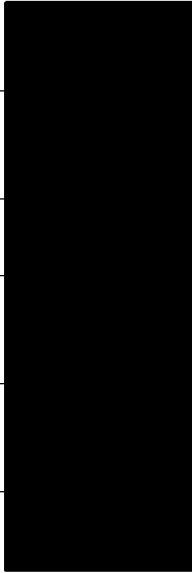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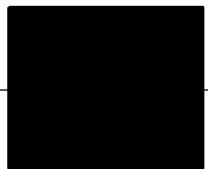
推荐类别: ☐ 职业教育 ☒ 普通本科教育

申报日期 2021.10.1

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学会 制

二〇二一年八月

一.基本情况

负责人信息	姓名	梁红梅	性别	女	年龄	
	职称/职务	副教授	联系电话		邮箱	
	所在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课程分类	<input checked="" type="radio"/> 通识课 <input type="radio"/> 公共基础课 <input type="radio"/> 专业课 <input type="radio"/> 其他				
	面向专业	国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本科 4+0 项目				
	所属学科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是否具有以下项目	<input type="checkbox"/> 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input type="checkbox"/> 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input type="checkbox"/> 省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input type="checkbox"/> 省级在线开放课程项目				
本单位主要参与人情况	单位	姓名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分工	
	华南农业大学	苏安梅	讲师		教案设计与案例录课收集	
	华南农业大学	赵轶哲	讲师		教案设计与案例录课收集	
	华南农业大学	侯丽娴	讲师		资源建设	
	华南农业大学	尹晓霞	副教授		课程思政指导与内容审核	
	华南农业大学	刘傲冬	副教授、教学院长		学科教学指导与内容审核	
华南农业大学	冯立新	院长	中外合作办学教学指导			
参与高校及参与人	单位	姓名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分工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刘宁	副教授/主任		共同进行课程思政案例开发与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郑燕敏	助理教授		共同进行课程思政案例开发与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文件

华南农教〔2024〕52号

关于公布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 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经项目负责人申报、所在单位推荐和学校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决定立项“基于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人才需求的智能网联技术课程改革”等 121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等 36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项目；根据学校年度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及本年度申报项目质量，立项“‘长基计划’下新文科历史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等 11 个项目为 2024 年度“长基计划”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项目（经

- 1 -

费由“长基计划”专业专项资金资助)。具体名单见附件。

请各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建设任务及要求,及时开展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学校人才培养改革,并力争取得高水平的教学成果。各单位要切实履行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督促、指导,以确保项目能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特此通知。

- 附件: 1.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立项名单
2.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本科质量工程立项名单
3.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度校级“长基计划”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专项立项名单

华南农业大学

2024 年 8 月 15 日

(联系人: 孙齐胜; 电话: 85288020)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0 日印发
-------------	-------------------

华南农业大学2024年度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学院	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1	ZLGC202401	专项人才培养计划	人文与法学学院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验班	杜国明	赵艳萍、刘傲冬、钟继军、王琳、王慧、顾方瑜、官隆清
2	ZLGC202402	专项人才培养计划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新文科创新试验班与领导力培养试验班	史传林	唐斌、蔡茂华、王希、袁中友、贾海薇、廖杨、古佳妍、余祥
3	ZLGC202403	现代产业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	低碳农业现代产业学院	余光伟	仇荣亮、郭勇军、舒迎花、张池、邓兰生、姚朝龙、梁瑜海、李择桂、郑华、刘可星、陈扬梅等专任教师、行业教师20人
4	ZLGC202404	校企联合实验室	经济管理学院	华农-知链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创新联合实验室	蔡键	董莹、张沁岚、周伟、苏柳方、李巧璇
5	ZLGC202405	校企联合实验室	材料与能源学院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联合实验室	张超群	罗颖、刘威、张淑婷、王洋、董先明、徐悦华、方丹迪、李宗翰、沈镇坤、陈棋锐
6	ZLGC202406	校企联合实验室	食品学院	熟成肉制品微生态精准调控实验室	方祥	钟青萍、廖振林、王洁、艾民珉
7	ZLGC202407	校企联合实验室	工程学院	农用户外电源联合实验室	杨丹彤	黄世醒、张亚莉、黄燕娟、范金凤、赖轲
8	ZLGC202408	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动物科学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爱健康清远麻鸡全产业链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陈伟国	谢青梅、孙宝丽、张新珩、李鸿鑫
9	ZLGC202409	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益力达生物科技产学研联合实践教学基地	王海洋	王海洋、张敏、李庚英、陈幸斌
10	ZLGC202410	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动物科学学院	广东华农大新龙畜牧股份有限公司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邓铭	陈飞洋、李耀坤、徐智城、贾坤、刘天增、何杰、刘德武、郭勇庆、孙宝丽、柳广斌
11	ZLGC202411	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工程学院	广州市威控机器人有限公司	孙振刚	赵祚喜、周学成、漆海霞、莫嘉嗣、孔莲芳、梅慧兰、胡仁俊
12	ZLGC202412	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金蝶杯一实践教学基地	张建桃	宋世领、陈炜颖、余平祥、吴春胤、杨振刚、邓成剑、黄文玲、韦婷婷
13	ZLGC202413	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公共管理学院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人民政府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邓永超	高云华、林玲、张小娟、苏亨、朱泽坤
14	ZLGC202414	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赵娜	李俊良、张帆、胡辉、郑文华、唐涤非、王柯、胡年春、王新锋、梁松清
15	ZLGC202415	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专业	郑欣	陈薇薇、冯悦、黄鑫、胡朝晖、李春、翁威奇、李女仙、邱巧玲、戚芳妮
16	ZLGC202416	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材料与能源学院	家具设计与工程专业	胡传双	王清文、涂登云、郭琮、孙理超、易欣、宋杰、林秀仪、鲁群霞、周宁昌
17	ZLGC202417	校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刘勇	杨意、成兰仙、欧阳强、林祖芳、楼群、林上港、严炳辉、罗志环、贾维卿、陈金华
18	ZLGC202418	课程教研室	材料与能源学院	生物质先进材料课程教研室	孙理超	郝笑龙、周海洋、易欣、欧荣贤、李丽萍、郭垂根、孙瑾、云虹、王清文
19	ZLGC202419	课程教研室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设工程造价课程教研室	李高扬	陈幸斌、黄刚、李庚英、陆金驰、李东南
20	ZLGC202420	课程教研室	农学院	遗传学实验课程教研室	刘自强	王少奎、谢庆军、胡斌、王兰、李楠
21	ZLGC202421	课程教研室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智慧农业课程教研室	黄标	黄琼、相栋、王燕、陈淑霞、谢金荣、黄日芳、黄国燕、涂海琴
22	ZLGC202422	课程教研室	国际教育学院（广州都柏林国际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学术英语模块课程协同育人虚拟教研室	冯立新	Alex Runchman、梁红梅、Stephen Kelly、苏安梅、侯丽娟、秦建华、周美珍、邵家声、郝刚、Paul Fanning、Li Chenguang、柯蔓、Laurisha、Daniel、David、Sean Hall、李雷、吕石磊、蔡希云、袁鹏、伏花、相洪、宋淑敏、王文博
23	ZLGC202423	课程教研室	电子工程学院（人工智能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教研室	孙坦示	、徐梅宣、陈楚、郭琪、姜晟、殷惠莉
24	ZLGC202424	课程教研室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安全与国防教育教研室	王向方	李永宝、曹汉林、欧阳娟、伍鹏、杨松霖、聂锐、黄煌华
25	ZLGC202425	课程教研室	工程学院	智能车辆电子控制技术课程教研室	李庆	李君、陈学深、吴双龙、肖博一、施琳琳、周锡恩
26	ZLGC202426	课程教研室	食品学院	葡萄酒科学与文化课程教研室	廖振林	薛红卫、徐振林、黄旭明、王洁、曾仁芳
27	ZLGC202427	大国“三农”课程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熊俊涛	黄文玲、邓成剑、骆威、邓金
28	ZLGC202428	大国“三农”课程	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统计学》	吕玉红	尹爱兰、范文正、李宗璋、洪炜杰、张志珂、张旭
29	ZLGC202429	大国“三农”课程	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网络安全技术与实践》	宋歌	张凯、赵丽宁
30	ZLGC202430	大国“三农”课程	外国语学院	《农业科技英语新闻听读》	李珂	沈文静、余乐斌、朱婕
31	ZLGC202431	“四新”示范课程	公共管理学院	《公益慈善学概论》	廖慧卿	卓彩琴、张开云、徐强、陈玉生、苏巧平、曾永辉、唐晓容

ISSN 2096-4366

CN 43-1536 / 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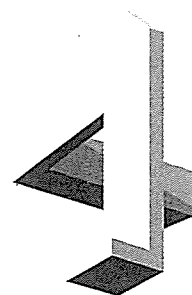
FLC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季刊

第4卷 第4期 (总第14期) 2020年12月



2020

目 次

文学文化研究

- 001 阐释的分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种族”与“性别” 潘雯
014 德国巴洛克戏剧家格吕菲乌斯《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与君权观念 王珏

英国文学研究

- 024 沃尔特·佩特对蒙娜丽莎的颓废主义形塑与审美的现代性 周雪滢
036 道德教诲、娱乐与欢笑——论英国瘟疫文学中的生命书写 张秀丽
046 本·琼生宫廷假面剧中的共同体想象 吴美群
055 毒性物质、中毒身体与物质伦理——印德拉·辛哈《人人都叫我动物》的物质生态批评解析 付文中

美国文学研究

- 065 乔治·桑塔亚纳对柏拉图主义的文学实践 谢敏敏
075 谁是美国人——《血色子午线》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国家身份意识 付林 陈世丹
084 回归文本：《白鲸》结局新解 央泉

翻译研究

- 093 “感染型”公示语的分类与翻译 曹波 李中涵
103 “增添诗意”还是“褻渎经典”——《飞鸟集》冯唐译本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 王宏城
115 汉英会议交替传译员的“为”而“不见”——基于“角色空间”的观察研究 胡娟

语言学研究

- 125 《庄子》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途径与意义 张伟红
133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研究 侯丽娟

学苑杂谈

- 146 关于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名与授奖词的翻译 王理行

Contents

- 001 **Wen Pan** The Div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 Western Feminism between Racial and Gender Discourses
- 014 **Jue Wang** Monarchal Images and the Concept of Monarchical Power in German Baroque Dramatist Gryphius' *Carolus Stuardus*
- 024 **Xueying Zhou** Walter Pater's Decadent Fashioning of the Mona Lisa and the Aesthetic Modernity
- 036 **Xiuli Zhang** Moral Preaching, Entertainment and Laught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fe Writing in English Plague Literature
- 046 **Meiqun Wu**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Ben Jonson's Court Masques
- 055 **Wenzhong Fu** Toxic Material, Toxic Bodies and Material Ethics: A Study on Indra Sinha's *Animal's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Ecocriticism
- 065 **Minmin Xie** George Santayana's Literary Practice of Platonism
- 075 **Lin Fu** Who is American: *Blood Meridian* and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Mid-19th Century
- 084 **Quan Yang** Return to the Tex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nouement of *Moby-Dick*
- 093 **Bo Cao, Zhonghan Li** Classific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Appellative Public Signs
- 103 **Hong'e Wang** "Adding Poetry" or "Blaspheming Classics": A Review of Feng Tang'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or's Behavioral Criticism
- 115 **Juan Hu** Interpreters: "Act but not to be Seen" in Chinese-English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An Observation Based on "Role Space"
- 125 **Weihong Zhang**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of *Zhuangzi*: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 133 **Lixian Hou**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DPE-Comprehensive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 146 **Lixing Wang** On Translations of the Name of the Laureate and Awarding Speech of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20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研究

◎ 侯丽娴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以突出思辨力情感特质及认知技能双重发展、提高元思辨力为目标的英语专业文学文化课程教学改革。本文通过将文秋芳的思辨力分层模型与基于女性主义教学论形成的DPE(对话-参与-经验)教学模式相结合,构建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并以英语专业选修课《圣经》的教学实践为例,展示此教学模式如何有效促进学生思辨力的全面发展,同时进一步揭示这种教学模式对外语专业教学改革带来的启发与反思。

关键词: 思辨情感特质 思辨认知技能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 女性主义教学论 英专文学文化课程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0) 04-0133-13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高校哲社专项“广府民俗文化的译介及影响研究——以《粤讴》为例”(2019GXJK111)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Title: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DPE-Comprehensive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Abstra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English major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urses, highlighting the mutual development of affective components and cognitive skills, concomitan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It integrates the core teaching model of DPE (Dialogue-Participation-Experience) which is based on feminist pedagogy into Wen Qiufang's model of critical-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the teaching model of DPE-comprehensive critical-thinking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applies this teaching model to the English majors' selective course "the Bible" and illuminates how it facilitates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meanwhile, elaborates on the inspir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reform of the English majors' courses based on the new teaching model.

Keywords: affective components, cognitive skills, the teaching model of DPE-comprehensive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feminist pedagog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urse

Author: Lixian Hou, Lecturer,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思辨力,作为“一种有目的性、能自我调节”的思维能力(Facioné 2),是我国外语学界近二十年来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黄源深,《思辨缺席》1, 19;黄源深,《再谈》11-16;胡文仲、孙有中 243-47;文秋芳、王海妹等 350-55;文秋芳、张伶俐等 794-804;孙有中,《教改深入》49-58;孙有中,《外语教育》22-23;任文 10-17;文秋芳、孙旻 6-12)。文秋芳、王建卿等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适用于国内外语教育的层级思辨力模型(42),其重要性在于定义了思辨力的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层级关系,即完整的思辨力是由元思辨力、认知、情感特质这三个要素组成的,前者为第一层次能力,后两者构成了第二层次思辨力,而元思辨力对第二层次思辨力有调控作用。当下国内学者的思辨力研究大多是对单一要素的研究,集中在:元思辨力的发展(张莎 125-35);认知技能的发展及与具体英语课程相结合的教学改革(余继英 20-28;陈则航等 11-19;任文 10-17;孙旻等 49-56;王艳 80-85;徐天成、夏蓓洁 109-12;王剑娜 93-98;金衡山 22-29)。然而学界甚少讨论以下四个重要方面:1)思辨情感特质的作用;2)它与认知技能的关系;3)如何促进思辨力情感与认知技能的有机结合,形成完整思辨力教学模式;4)这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应用于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本文从思辨力情感特质入手,主要围绕以上四方面进行探索:1)结合国内外思辨力模型中对情感特质的论述,揭示其重要性以及与认知技能的紧密联系;2)将文秋芳、王建卿等的思辨力分层模型(42)与基于女性主义教学论的核心教学原则而生成的DPE教学模式(Chow et al. 260)相结合,构建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并分析此教学模式如何能促进思辨情感特质与认知技能的有机结合,提高元思辨力发展;3)将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应用于英语专业文学文化选修课程《圣经》的教学改革中,展示此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有效性;4)基于上述实践,进一步揭示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给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带来的启发与反思。

一、国内外思辨能力模型中情感特质的作用、与认知技能关系评析

关于思辨力的定义及分类,权威模型主要是特尔斐项目组(Delphi Project)的“双维结构”(文秋芳、王建卿等 39),保罗(Richard Paul)和埃尔德(Linda Elder)的“三元结构”(文秋芳、王建卿等 40),以及安德森(Lorin Anderson)等的“六级能力结构”(孙有中,《深入》52)。我国学者多引用和讨论前两个模型,而这两个模型均强调了情感的重要作用,认为认知与情感密不可分。

特尔斐项目组(Delphi Project)的“双维结构”界定思辨能力由认知能力与情感特质两个维度组成。认知维度可分解为6项能力:阐释、分析、评价、推理、解释、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Facioné 6)。情感维度包括好奇、求知欲强、警惕、信奉理性发问、自信、开放、灵活、善于理解他人、公正、诚实、谨慎、愿意修正意见(Facioné 13)。法乔恩(Peter Facioné)认为情感特征是“促使学生的认知技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必要条件”(11),并强调,“不能只

关注认知技能的发展,必须同时设计合理有效的教学材料、教育方法、评估工具等来发展学生的情感维度,而只有保证认知技能及情感因素的有机结合和双重发展,学生获取的思辨力才能超越狭隘的课堂,灵活运用于个人及公民生活之中”(13)。保罗、埃尔德的“三元结构”模型也有类似的论述,包括思维元素、标准和智力特征:谦虚、独立、正直、自信(confidence)、勇敢、坚持不懈、有同情心、公正无私(15)。其中,思维元素及智力特征两者是“同步发展、紧密联系”的(16)。

文秋芳、王建卿等借鉴以上模型整合出符合我国外语教育的层级模型,该模型将思辨力细化为两个层次:元思辨力和思辨力(42)(如表1)。第一层次是元思辨力,指对自己的思辨计划、检查、调整与评估的技能。第二层次是由认知及情感两要素组成的思辨力。其中,“认知”包括三项核心技能:“分析、推理、评价”以及五项标准。而情感特质主要有五种,包括好奇、开放、自信、正直、坚毅。由此可见,在文秋芳、王建卿等的层级模型中,思辨力情感特质是整合了“双维结构”模型的情感维度及“三元结构”模型的智力特征。尽管层级模型暗示了思辨情感特质的重要性,但与法乔恩和保罗、埃尔德不同,文秋芳、王建卿等并未在其层级模型的说明中阐明情感特质的地位及与认知的关系。而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落在认知技能的发展和突出以认知技能培养为目标的英语专业课程改革上,忽略了思辨情感特质的培养及思辨情感特质和认知技能两者的有机结合。

表1 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转引自文秋芳、王建卿等42)

元思辨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第一层次		
思辨能力——第二层次		
认知		情感
技能	技能	
分析(归类、识别、比较、澄清、区分、解释等)	精晰性(清晰、精确)	好奇(好疑、好问、好学)
推理(质疑、假设、推论、阐述、论证等)	相关性(切题、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开放(容忍、尊重不同意见,乐于修正自己的不当观点)
评价(评判预设、假定、论点、论据、结论等)	逻辑性(条理清楚、说理有根有据)	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敢于挑战权威)
	深刻性(有广度与深度)	正直(最求真理、主张正义)
	灵活性(快速变化角度、娴熟自如地交替使用不同思辨技能)	坚毅(有决心、毅力,不轻易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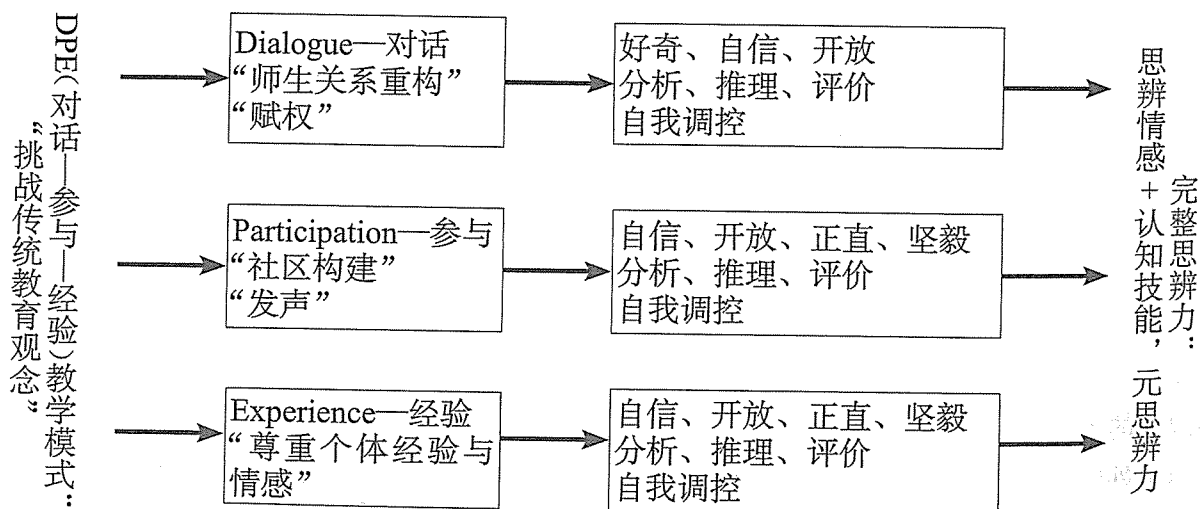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兴起了“情感革命”(Sutton and Wheatly 328)。大部分人文及社会学科都关注“情感”的影响,开展大量关于情感的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范式转向下,法乔恩与保罗、埃尔德的思辨力模型均阐释了情感因素和认知技能/思维元素的关系,突出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在外语教育中,尽管情感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但学者们均认同情感是影响学生外语学习及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因素(Arnold and Brown 1-24; Watson-Gegeo 331-50; Martínez Agudo 1-13; 王初明 7-11; 胡亚琳、王蕾 40-48)。最近十年,欧美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师研究领域中更是出现了“情感转向”(Richards 446),即外语教学及改革的焦点转移到学生及教师的情感因素上。因此,在这种情感范式转向下,结合法乔恩,保罗、埃尔德中关于

情感在思辨力中的积极作用,笔者以思辨力情感特质培养为重点,采用基于女性主义教学论而构建的DPE教学模式作为理论框架,一方面补充文秋芳、王建卿等的层级模型中关于思辨力情感与认知能力的关系这部分论述的缺失;另一方面探索促进思辨力情感与认知技能双重发展,同时提高元思辨力的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

二、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的构建

女性主义教学论(Feminist Pedagogy)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教育思潮。它指的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教育观进行反思和评判,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和教学法,并力图通过这些工作为高等教育的方向和人才培养提供独特的视角”(肖巍 99)。这一教学论被广泛应用于各门学科的教学改革中,对西方教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历了与社会化理论、性别差异理论、结构理论及解构理论的碰撞后(107),当下的女性主义教学论着重重构学生的知识体系、教与学、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Shrewsbury 8; Chow et al. 259; Shackelford 571; 肖巍 99),体现在以下六个核心原则:1)师生关系的重构;2)赋权;3)社区构建;4)以发声为重点;5)尊重个体经验的多样性;6)对传统教育论观点的挑战(Webb et al. 1-20)。

艾斯特·周(Esther Chow)等学者提出了DPE(Dialogue-Participation-Experience),即“对话-参与-经验”教学模式(259-75),并将六个核心原则内化其中。本文将文秋芳等的思辨力层级模型中的五种情感特质、三种认知技能及元思辨力与DPE教学模式结合,形成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图1),结合女性主义教学论六个核心原则,阐释这样的教学模式如何促进思辨力情感与认知技能有机结合、双重发展,同时提高元思辨力。



▲图1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

首先, DPE教学模式中的“对话”模式强调课堂上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对话开放平等地学习 (Chow et al. 264), 体现的是“师生关系的重构”和“赋权”这两个核心原则。“师生关系的重构”在于课堂上老师对学生“赋权”的实践。“赋权”中的“权”指向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即老师对学生进行“支配”, 而是指老师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能量、能力和潜力 (Shrewsbury 8)。在这样的原则下, 课堂是去中心化的,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 而老师的角色也从知识的领导者转变为多元角度的激发者 (Scering 66), 从真理的源泉变成学生与讨论话题的中介, 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答案 (Webb et al. 68)。因此, 这两个原则有利于培养学生好奇、自信、开放这三种思辨力情感特征, 同时在“学习主体”的构建中, 加强他们分析、推理、评价的认知技能。在“赋权”原则下, 学生同样能够增强自我调控、反思的能力, 从而提高元思辨力。

其次, “参与”模式强调参与式学习, 建立老师—学生—课内—课外的学习社区 (Chow et al. 267), 体现的是“社区建设”和“以发声为重点”这两个原则。“社区”指课堂上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课内与课外大环境互动, 是三者综合而成的学习社区。社区建设强调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进行以“关系构建”和以“对话”为中心的“合作性学习” (Webb et al. 69)。“发声”原则在“对话”“合作”的基础上, 鼓励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尊重其他同学的多元观点。因此, 这种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信、开放、正直、坚毅的思辨情感特征。在培养这种情感的过程中, 学生也通过与教师的对话和同辈的交流, 表达自己与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 进一步掌握多角度分析问题、评价现象的认知能力, 并有利于在集体讨论中进行推理能力的锻炼, 同时还能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 培养自我调控的元思辨力。

最后, “经验”模式强调学生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情感获取知识, 以此为依据生成自己的观点并勇于发出不同声音。它亦使学生认识到知识的偏向性, 即所有知识都是特定时代、情景、阶级、种族、性别的产物, 体现了“尊重个体经验的多样性”这一核心原则。重视学生的个人经验及情感, 鼓励学生从独特的个人经验与情感中形成自己的观点, 并平等地与别人一起讨论协商不同的观点。这个模式能进一步培养学生自信、开放、正直、坚毅的特点。同时, 这种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民主平等的讨论, 又能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推理、评价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对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而对事物的随大流乃至刻板印象的行为进行反思, 从而提高元思辨力。

DPE教学模式将“对话—参与—经验”三者结合, 贯彻了女性主义教学论的前五个原则, 实际上起到解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及将知识视作客观权威的传统教育观点的作用, 亦即落实了第六个核心原则——挑战传统教育观点。该模型不仅通过上述三种模式和六个原则将思辨力情感特质与认知技能有机结合, 在整体上也帮助学生看到权威知识背后的压制性本质, 鼓励学生形成多元解读, 解构权威知识, 亦即自我调节及自我修正之前对权威知识的麻木信任和崇拜, 形成属于自己的、创新性的见解, 促进元思辨力的提高。

三、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 课程内容

笔者将DPE-完整思辨力教学模式应用于《圣经》文学文化课堂的改革实践中,改革目的除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之外,还突出学生思辨情感特质与认知技能有机结合、元思辨力同步提高的思辨力全方位的发展。《圣经》课程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建议开设的社会文化课程之一,在国内众多高等院校作为英语专业课程开设已达20年之久。笔者所在外语学院于2018年开设《圣经》文学文化课程,是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笔者从2018年9月开始授课,上下学期的授课对象分别是2017级英语文学、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每学期开设三个班,每班人数大约在10-30人。选修课一共32学时,每周2课时90分钟,16周结束课程。

笔者采用由任东升、张德禄、马月兰主编的“十二五”普通高校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圣经文化导论》作为教材。此教材主要讲述《旧约》及犹太文化,故事性强,其中选取的故事更是包含丰富的女性角色。在课程内容选择及设置上,笔者主要挑选具有争议性的角色、特别是女性角色的文本进行课堂讨论,剩余的文本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布置学生自主阅读。在教学实践中,运用DPE-完整思辨力教学模式改革课堂教学(图2)。笔者在每节课之后会进行教学日志记录,记录学生的课堂反应、发言、讨论等情况,以便笔者更好地反思、调整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以下分析中引用的学生发言均来自于笔者2018—2019年两个学期共64篇教学日志及学生的108份(两个学期学生共118人)有效教学评价报告。

(二) 课堂教学实践

1. 三层“对话”模式

第一层对话:学生小组内部讨论。每个班分为10个小组,每组抽签分析笔者挑选的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并推断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笔者还要求每组查阅最少一篇关于该故事分析的学术文章,评价文章的观点与形成自己小组的论述。以上内容,限时15分钟,以小组报告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在这一层对话中,学生通过小组内对话,培养合作精神、好奇、自信和坚毅的情感特质,同时也提升整个小组的分析、推理、评价的认知技能,以及根据其他组的评论而自我调整观点的元思辨能力。

第二层对话:小组之间的同辈讨论。所有学生就小组报告的内容,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并就老师课前布置的问题讨论自己思考的结果,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引导者、听众和主持人的角色。一方面协调学生小组之间的互相评论及发言,培养学生好奇,开放的情感特质;另一方面用问题引导学生小组之间进行合作以便进行更细致的推理和阐释,培养学生自信、正直、坚毅的情感特质,同时也促进学生全面认知技能的培养。

第三层对话：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在上述两层对话中，学生的五种思辨情感特质和三种认知技能都有所提升。在这层对话中，时间大约为1课时，笔者基于课前布置的问题以及前面两层对话的结果，用两层女性主义阅读角度引导大家重新审视文本，培养学生开放的思辨情感，巩固认知技能：1）引导学生反思刻板的男女性别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旧约》文本中对女性的描写是包含刻板的性别书写，而传统教学中，对这些女性角色的解读，也是遵循这种性别刻板角度进行的，但女性主义阅读角度引导学生了解这种权威、正统解读的性别盲点，有利于进行第二层阅读；2）挑战传统权威观点，使学生了解权威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大家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有利于促进学生思辨力（分析评价）及元思辨力发展（调整自己原来对传统权威观点的盲目认同）。

通过这两层阅读角度，引导学生将文本所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量，重新思考女性角色在传统阅读之外的主体性，同时也让学生反思之前自己的阅读观点，进行自我纠正和自我扩宽，提高元思辨力。例如，在分析《士师记》中参孙和大利拉这一经典故事时，大部分学生在第一、二层的对话中分析和总结得出大利拉的形象是主流观点中的“荡妇、淫娃”。笔者用两层阅读角度引导学生进一步分析大利拉在古代以色列父权制度下的处境，协助学生将她与另一位同时代背景的犹太民族女英雄雅亿作对比，分析两人的叙事如何互为镜像，从而使学生反思这种对比叙事背后的民族—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这促进学生调整了之前对大利拉的评价，重新寻找大利拉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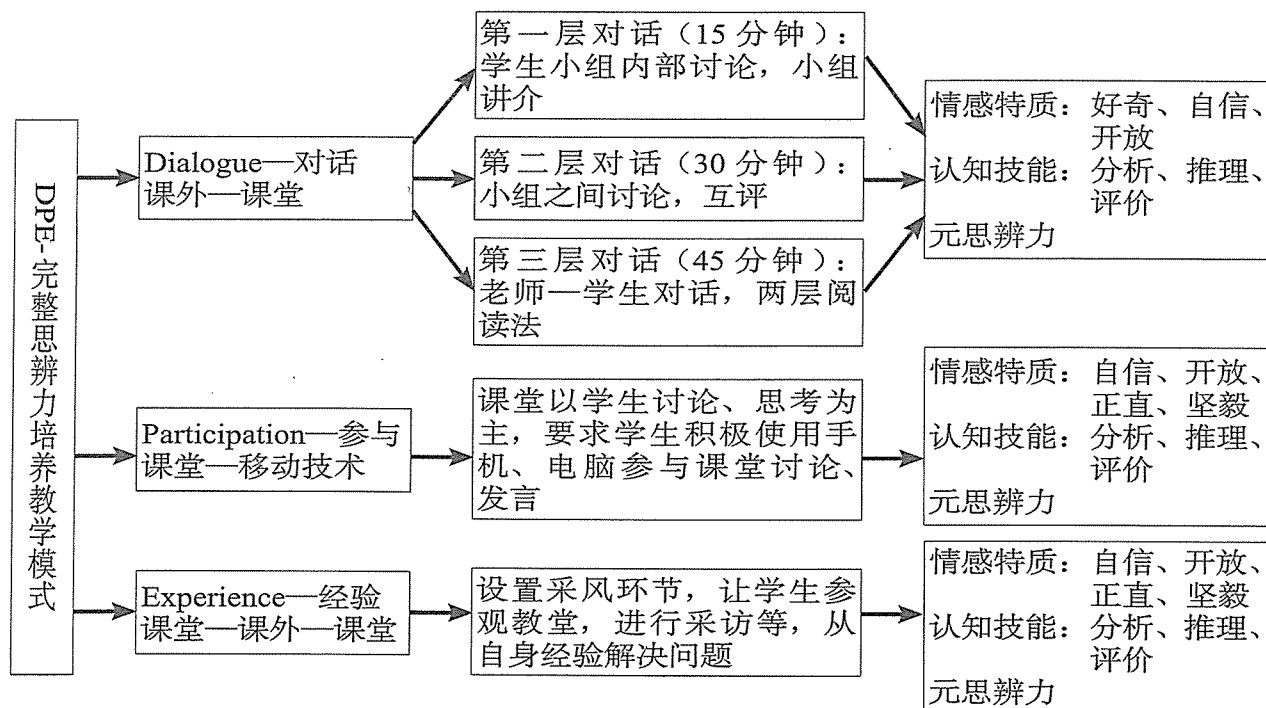
2. 融合移动技术辅助学习的“参与”模式

参与模式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参与小组讨论、发言，在参与式学习中生产知识，有效培养学生自信、开放、正直、坚毅的情感。笔者在每节课前布置了5-10个问题，让学生提前阅读故事及寻找答案。在课堂上，笔者强调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其他组报告的观点及课前问题的答案；重点要求学生使用智能手机或手提电脑对其他组及自己组员的不同观点当场进行核对，并进行二次讨论，调整所在小组观点，从而提高认知技能以及元思辨力；最后小组以手机或电脑汇总自己小组的评论并在课堂上分享。为了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参与到发言，课堂上要求每个小组每次由不同的学生代表发表评论并由教师进行记录。在这种鼓励使用移动技术的合作式和参与式课堂中，笔者观察到大部分学生学习投入度和积极性都有明显提高。例如他们高效地利用手机查阅资料促进小组讨论而非使用手机进行娱乐。许多学生从不愿意发言到积极举手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同学也采取开放态度认真聆听。

3. 加入采风体验的“经验”模式

在第一节课上，笔者特意让每一个学生回答两个问题，“你所知道的《圣经》有哪些内容？你想通过这个课程解决什么问题？”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很一致，认为自己不懂《圣经》是什么，但觉得《圣经》故事沉闷、宗教性强，同时希望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将《圣经》当作经典。

笔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两个问题,而是设置采风实践,要求学生个人或小组在期末到教堂进行采风,观察教堂建筑及活动,并建议学生如果有机会,可以和有信仰的同学或者朋友进行交流,通过自身的经验找寻答案。在最后一周,笔者要求每位学生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采风经历,并重新回答第一节课程的两个问题。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原来《圣经》故事这么有趣”“我看懂了教堂”“我对我的外国朋友更了解”“我再也不会觉得将《圣经》当作经典的人很奇怪,因为这些故事从文学及文化角度来看都很棒!”学生通过课堂的激发,再到课外采风实践,再回到课上的分享,培养了开放、自信、正直、坚毅等思辨情感。学生反映,从以前只在网络上获取对《圣经》的理解,从而对有信仰的外国朋友产生歧视和偏见,到现在会反思自己的狭隘见解,调整自己心态和观点,更努力地去寻找不同的声音,同时更有兴趣聆听不同的观点,并主动、自信地分享自己对《圣经》故事的了解,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同时他们也表示,通过实践再回到文本本身,他们发现对《圣经》故事多重解读、推理、评价的可能性,促进了认知技能的提高。



▲图2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课堂实践

(三) 教学成效

笔者运用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对《圣经》文学文化课的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学生在“对话”“参与”“经验”三种模式中实现思辨力情感和认知技能共同发展,元思辨力同步提高,其教学成效是比较满意的。2018—2019学年的两个学期,该课程教学成效排名在学院分别占前10%(表2)和15%(表3)。

在思辨情感发展方面,除了笔者在课堂活动中的观察所得外,期末的教师评价调查中也有突出体现。其调查由教务处组织学生进行,从教学内容、方法、质量等8个方面进行反馈,8

项占的权重不同, 每项设置“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具体分数段(如表2、表3), 满意度作为最终评价, 其计算方法为某项评价指标的所有评价分数的平均值百分比值。其中, 第一、六项涉及“对话”及“参与”模式, 第五项涉及“经验”模式, 三种模式如上部分论述, 能促进学生“好奇、自信、开放、正直、坚毅”五种思辨力情感。2018—2019 第二学期的调查中, 上述三项满意度分别为: 93%, 94%, 94%, 第一学期为: 94%, 94%, 94%。第八项为学生的总体收获满意度, 第二学期为 93%, 第一学期是 92%。另外, 学生在上述教学评估中的留言, 以及在最后一周课堂上, 笔者组织的学生对课程的开放性讨论及反馈中, 有如下评论:“非常好玩, 大家经常一起讨论的感觉好棒”, “非常开放的课堂, 我不仅仅从老师身上学到许多, 也从同学身上学到很多”, “老师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 我变得更勇敢, 更积极参与讨论和发言了”, “解开了对《圣经》的误解, 对《圣经》故事有了一定了解, 对以后的文学学习更有信心了”, “人生第一次去教堂, 第一次和有信仰的人聊天, 收获良多, 想更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等。

表2 2018—2019 第一学期教学评价调查

评价号	评价指标	满意度	权重	理论/ 实验	优 95	良 85	中 75	合格 65	不合格 55
1	教师关心同学的学习状况, 课内外均乐于答疑解惑	94%	0.10	理论	54	6			
2	教师从不迟到早退及随意调停课	94%	0.10	理论	54	6			
3	教师敢抓、严抓课堂纪律, 教学秩序好	93.66667%	0.10	理论	52	8			
4	教学内容充实, 安排合理, 重点突出	92.5%	0.15	理论	46	13	1		
5	教师授课能理论联系实际, 不照本(屏)宣科	93.83333%	0.15	理论	53	7			
6	教师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发表个人见解	93.5%	0.15	理论	51	9			
7	教师能合理运用板书、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92.16667%	0.10	理论	43	17			
8	教师的教学使我理解和掌握了该课程的内容, 我觉得有收获	91.66667%	0.15	理论	41	18	1		
参评学生人数: 60		有效参评人数: 54	对教师评价分: 93.296		学院排名: 15%				

表3 2018—2019 第二学期教学评价调查

评价号	评价指标	满意度	权重	理论/ 实验	优 95	良 85	中 75	合格 65	不合格 55
1	教师关心同学的学习状况, 课内外均乐于答疑解惑	93.44828%	0.10	理论	49	9			
2	教师从不迟到早退及随意调停课	92.93103%	0.10	理论	46	12			
3	教师敢抓、严抓课堂纪律, 教学秩序好	92.06897%	0.10	理论	41	17			
4	教学内容充实, 安排合理, 重点突出	93.27586%	0.15	理论	49	8	1		
5	教师授课能理论联系实际, 不照本(屏)宣科	93.96552%	0.15	理论	52	6			
6	教师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 发表个人见解	94.13793%	0.15	理论	53	5			
7	教师能合理运用板书、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93.7931%	0.10	理论	51	7			
8	教师的教学使我理解和掌握了该课程的内容, 我觉得有收获	92.58621%	0.15	理论	44	14			
参评学生人数: 58		有效参评人数: 52	对教师评价分: 93.529		学院排名: 10%				

在分析、推理及评价这三项认知技能的提升和元思辨力的提高上,该门课程期末考试的开放性题目中也有所反映。该课程除小组报告、小组互评等开放性评估手段外,笔者在期末的总结性评估里设置了40分客观知识题及60分主观开放性赏析题及论述题。两个学期下来,93%的同学选择论述题:“请评价《路得记》中的女主角路得。”在这些选题中,84%的学生分析中,除了简单复制大多数主流学者赞扬路得有女性主体意识、是民族女英雄这些观点,还加入了自己的评价和反思。例如,有学生认为“路得没有打破传统父权制的框架,而只是取巧地利用了某些父权制规定来帮助自己,因此严格意义上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还有67%的同学掌握了两层阅读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再阐释”,论述“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下审视路得,要求作为外邦寡妇的路得彻底打破当时牢固的父权制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她的做法其实也是“对当时父权制规训下被动和柔弱的女性形象的反抗和挑战”,再次肯定了路得的女性意识及主体性。对于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能做到这种“反思的反思”,实属难能可贵。

四、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的启示与反思

在本文中,笔者将女性主义教学论与思辨力层级模型相结合,形成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并以此对英语专业文学文化课《圣经》的课堂进行了改革。从两学期的教学实践看,笔者认为该教学模式对于以提高学生思辨力为目标的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积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要求教师构建赋权型自由课堂,进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性教学活动,鼓励学生通过分工合作进行讨论和自由使用如手机等移动电子设备查找资料,提倡学生通过实践寻找答案,产出自己的观点。该举措能够促进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有效迎接移动数码技术时代带来的学生学习主体性增强、课堂内外界限被打破等改变与挑战。

(二)弥补我国思辨力研究中对情感培养的不足,促进思辨力情感特质及认知技能的有机结合、共同发展。在女性主义教育论指导下的课堂实践重视对话式、合作式的平等学习社区建设,重视学生情感及个人经验,鼓励每位学生积极发言并尊重其他人的观点,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好奇、开放、自信、正直、坚毅的情感,从而促进学生分析、推理、评价能力的发展,以及自我反思和调整等元思辨力的发展。

(三)融合女性主义教学论的思辨力培养更切合当下英语专业的性别特点。我国外语专业普遍女生居多,在笔者所在班级里,两学期118名学生中只有12位男生。女性主义教学论中的教学思想和方法论不仅帮助全体学生建立自信、开放的思辨情感特质,培养其勇于发声和评价的能力;同时,女性主义理论也更能帮助女生建立女性意识,帮助男生更好地了解文本

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从而使英语专业学生更好地认识并解构性别文化,更和谐地进行日常交往及合作式学习。

但需要注意的是,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是对教师个人素质及课堂掌控力的极大挑战。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和参与式学习的教学方式需要教师做好充分引导,包括讨论前问题的设置,讨论中对不同学生不同意见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和拆解,并引导学生进一步评价及反思。这些过程十分耗时,笔者往往在一个半小时的课堂中只能刚好实现教学目标。此项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尚存有待改进与深化的方面。例如在教学评估中,还可以采用访谈法,以便更仔细地了解学生思辨力情感特质、认知技能,以及元思辨力发展情况。关于如何完善外语教学中思辨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如何在理论及实践上进一步推进,以及如何引入相关教学理论促进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学术思辨力培养的有机结合,都需要更多外语学者和教师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nderson, Peter, et al.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mplete Edition)*. Pearson, 2001.
- Arnold, J., and H. D. Brown. "A Map of the Terrain." *Affect in Language Learning*, edited by J. Arnold, Cambridge UP, 1999, pp. 1-24.
- Chen, Zehang,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rformance Framewor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English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no. 3, 2016, pp. 11-19. [陈则航等:《构建英语写作中思辨能力表征框架》,载《中国外语教育》2016年第3期,第11-19页。]
- Chow, Esther, et al. "Exploring Critical Feminist Pedagogy: Infusing Dialogue,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Sociology*, no. 3, 2003, pp. 259-75.
- Facioné, Peter.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for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The Delphi Report Executive Summary)*. The California Academic, 1990.
- Hu, Wenzhong, and Youzhong Sun. "On Strengthen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38, no.5, 2006, 243-47. [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重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8卷第5期,第243-47页。]
- Hu, Yalin, and Qiang Wang. "A General Review on Teachers' Emotions: Concep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Theme."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14, pp. 40-48. [胡亚琳、王蔷:《教师情感研究综述:概念、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载《外语界》2014年第1期,第40-48页。]
- Huang, Yuanshen. "Ab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7, 1998, pp. 1, 19. [黄源深:《思辨缺席》,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年第7期,第1,19页。]
- . "English Major's Courses Must be Reformed: Reexamining 'The Syndrome of Ab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1, 2010, pp. 11-16. [黄源深:《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思辨缺席症”》,载《外语界》2010年第1期,第11-16页。]
- Jin, Hengshan. "Humanity Educ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urse Design: Reflections on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1, 2019, pp. 22-29. [金衡山:《人文教育、批判性思维与课程设置:〈西方文明导论〉课的实践与启示》,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期,第22-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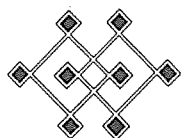
- Martínez Agudo, Juan de Dios, editor.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and Teacher Education*. Springer, 2018.
- Paul, Richard, and Linda Elder. *Critical Thinking: 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6.
- Ren, Wen. "Revisiting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urs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0, no. 1, 2013, pp. 10-17. [任文:《再论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缺席”还是“在场”?兼论将思辨能力培养纳入外语专业教育过程——以英语演讲课为例》,载《中国外语》2013年第10卷第1期,第10-17页。]
- Richards, Jack. Afterword.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and Teacher Education*, edited by JDM. Agudo, Springer, 2018, pp. 445-49.
- Scering, Grace. "Themes of a Critical / Feminist Pedagogy: Teacher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no. 1, 1997, pp. 62-68.
- Shackelford, Jean. "Feminist Pedagogy: A Means for Bring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to the Classro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2, 1992, pp. 570-76.
- Shrewsbury, Carolyn. "What is Feminist Pedagogy?"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no. 3 and 4, 1993, pp. 8-15.
- Sun, Min, et al. "Critical Thinking Sub-skills in EFL Public Speaking: The Case of Persuasive Speeche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2, no. 5, 2015, pp. 49-56. [孙旻等:《英语演讲实践中的思辨分项技能——以说服力演讲为例》,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5期,第49-56页。]
- Sun, Youzhong. "Toward a Critical Thinking-Oriented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8, no. 3, 2011, pp. 49-58. [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入》,载《中国外语》2011年第8卷第3期,第49-58页。]
-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2, no. 2, 2015, 22-23. [孙有中:《外语教育与思辨能力培养》,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2期,第22-23页。]
- Sutton, Rosemary, and Karl Wheatley. "Teachers Emotions and Teach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no. 15, 2003, pp. 327-58.
- Wang, Chuming.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Need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1991, pp. 7-11. [王初明:《外语学习中的认知和情感需要》,载《外语界》1991年第4期,第7-11页。]
- Wang, Jianna. "Study on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to English Major's Teaching Mode: Taking Cours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Example." *Journ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17, no. 4, 2017, pp. 93-98. [王剑娜:《纳入思辨能力培养的英语专业教学模式研究——以“跨文化交际学”课程为例》,载《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7卷第4期,第93-98页。]
- Wang, Yan. "Critical Listening: Rationale,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vol. 12, no. 2, 2015, pp. 80-85. [王艳:《思辨听力:理据、框架与操作》,载《中国外语》2015年第12卷第2期,第80-85页。]
- Watson-Gegeo, Karen. "Mind, Language, and Epistemology: Toward a 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no. 4, 2004, pp. 331-50.
- Webb, Lynn, et al. "Feminist Pedagogy: Identifying Basic Principles."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no. 6, 2002, pp. 67-72.
- Wen, Qiufang, Haimei Wang,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Liberal Arts Major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42, no. 5, pp. 350-55. [文秋芳、王海妹等:《我国英语专业与其他文科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2卷第5期,第350-55页。]
- Wen, Qiufang, Jianqing Wang, et al. "On Construction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1, 2009, pp. 37-43. [文秋芳、王建卿等:《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载《外语界》2009年第1期,第37-43页。]
- Wen, Qiufang, Lingli Zhang, et al. "Ar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Inferior to the Other Majors in Critical Thinking?"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vol. 37, no. 6, 2014, pp. 794-804. [文秋芳、张伶俐等:《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逊色于其他专业学生吗?》,载《现代外语》2014年第37卷第6期,第794-804页。]

- Wen, Qiufang, and Min Sun. "On Key Issues about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in College EFL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o. 3, 2015, pp. 6-12. [文秋芳、孙旻:《评述高校外语教学中思辨力培养存在的问题》,载《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3期,第6-12页。]
- Xiao, Wei. *Feminist Pedagogy and Teaching Practices*. China Remin UP, 2007. [肖巍:《女性主义教育观及其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Xu, Tianshu, and Beijie Xia. "On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2, no. 5, 2015, pp. 109-12. [徐天成、夏蓓洁:《基于思辨能力导向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构建》,载《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2卷第5期,第109-12页。]
- Yu, Jiying. "Construction on an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of English Writ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Development."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5, 2014, pp. 20-28. [余继英:《写作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载《外语界》2014年第5期,第20-28页。]
- Zhang, Sha.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Metacognitive Level: Framework and Education Principl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ol. 3, no. 3, 2019, pp. 125-35. [张莎:《元思辨理论框架构建与培养原则》,载《外国语言与文学》2019年第3卷第3期,第125-35页。]

◇责任编辑:易佳

外语与文化

WAIGUO YUYAN YU WENHUA



刊 号: ISSN 2096-4366
CN 43-1536/H
国内定价: 28.00 元

ISSN 2096-4366



英语广场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湖北省优秀期刊

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05

(总第149期)

2021年2月



中国古典诗词开放性译文筛选平台建设

基于CiteSpace的
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1980—2019)的可视化分析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的英语师范生培养改革探索

高中英语课程评价体系的现状反思与改进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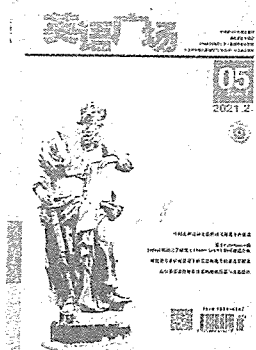
ISSN 1009-6167



05>

9 771009 616219

目录 CONTENTS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English Square
2021年第5期(2月)(总第149期)

学术委员会

-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
- 刘道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教材编委会
主任
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任
- 郭著章** 武汉大学英文教授
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
- 杜青钢** 武汉大学法文教授、博导
- 任晓晋** 武汉大学英文教授
- 沈启智** 英语特级教师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英语教研员

编辑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 | | | |
|-----|-----|-----|
| 张祖春 | 谢群 | 陈毅平 |
| 崔东 | 甘文平 | 胡孝申 |
| 夏向东 | 扈华唯 | 龙江 |
| 罗良功 | 梁绯 | 余承法 |
| 王文明 | 张国庆 | 周家斌 |
| 张庆圭 | 程雪猛 | 李志斌 |
| 吕万英 | 肖芬 | 刘世平 |
| 马萧 | 尧玮 | |

Academic Council

- | | | |
|--------------|-------------|--------------|
| DAI Weidong | LIU Daoyi | NIE Zhenzhao |
| GUO Zhuzhang | DU Qinggang | REN Xiaojin |
| SHEN Qizhi | | |

Editorial Board

- | | | |
|---------------|---------------|-------------|
| ZHANG Zuchun | XIE Qun | CHEN Yiping |
| CUI Dong | GAN Wenping | HU Xiaoshen |
| XIA Xiangdong | HU Huawei | LONG Jiang |
| LUO Liangong | LIANG Fei | YU Chengfa |
| WANG Wenming | ZHANG Guoqing | ZHOU Jiabin |
| ZHANG Qinggui | CHENG Xuemeng | LI Zhibin |
| LU Wanying | XIAO Fen | LIU Shiping |
| MA Xiao | YAO Wei | |

文学评论与欣赏

- | | |
|---------------------|---------|
| 03 创伤理论视角下的《金翅雀》解读 | 屈荣英 吴成丞 |
| 06 生态女性视角下的《南方与北方》 | 张越红 肖海燕 |
| 09 谎言与真实:《魔桶》解构主义分析 | 刘晓庆 |

翻译理论与实践

- | | |
|---|---------------------|
| 12 功能对等视角下的《中国园林》英译本研究 | 陈筑依 |
| 16 功能对等视角下《逍遥游》片段英译本对比研究
——以Legge、赵彦春译文为例 | 温泉 杜萌萌 |
| 21 中国古典诗词开放性译文筛选平台建设
——兼论平台的理论基础、特征与设计模式 | 沈梦双 田纪烨 石嘉宁 王昊天 王金秀 |
| 24 风格标记理论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研究 | 张欣雨 王金安 |
| 27 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视域下《春江花月夜》意象英译比较分析 | 赵春阳 王胜利 |
| 30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洛阳红色文化旅游翻译译例分析 | 赵洁 |
| 33 生态翻译学理论视角下中国古诗词汉译英对比翻译研究
——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 颜延 王荣媛 |
| 36 目的论视阈下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中的语用失误研究 | 宋燕 张乃丹 |
| 39 “外聚焦”视角下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译本对比探微 | 杨迪 |
| 42 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下植物配置文本的英译
——以慕课《草木皆缤纷——走进植物配置》教学内容为例 | 刘健 郝兴跃 |
| 45 功能学派目的论视角下中文慕课字幕英译策略选择
——以《MySQL数据库设计及应用》慕课字幕翻译项目为例 | 李昕妍 杜萌萌 |
| 49 变译理论视角下国产动漫电影的字幕英译
——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 刘思捷 方庆华 |
| 52 目的论视角下应用文本的翻译研究
——以《中国关键词:精准脱贫篇》的英译为例 | 刁小丽 |
| 55 土木工程专业术语翻译探析 | 陈堂堂 高军 |
| 58 从读者反应理论看中国茶文化的外宣翻译 | 邱博 |
| 61 关联理论视域下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研究 | 左桂 姚欣 |

中国邮政

随心订阅
“邮”享生活



语言学理论与研究

- 68 国内生态女性主义热点与前沿信息可视化分析 王超君
- 72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认知语言学研究(1980—2019)的可视化分析
刘正喜 王雨霞
- 77 电影《小妇人》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魏于怡
- 80 语言不平等视角下教师和学生语言偏见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袁游朋
- 83 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的元功能分析 何文静
- 86 浅析语块对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抑制作用 田野 宋 泉

教学理论与创新

- 90 移动技术与情感教学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侯丽娟
- 93 护理英语课程教学困局破解之策 吴 萌
- 96 新工科背景下跨文化沟通类课程体系的立体化建设
——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为例 张冰天
- 99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提升路径的研究 韩卉颖
- 102 应用型本科口译教学改革探索 王 媛
- 105 简析新媒体时代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管理改革 杨云皓
- 108 基于软技术的大学英语泛在学习模式研究 周建川

教学实践与探讨

- 111 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的英语师范生培养改革探索
江晓红 叶怡菲 叶露红 李珊珊 梁思恩 甘飞燕
- 116 英语核心素养视域下学科英语研究生评价素养的培养策略 赵小青
- 119 活动主导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英语辩论课程中的应用 熊淑慧
- 122 i+1背景下思维导图在基础英语合作学习课堂中的使用策略和实践研究
杨艳丽
- 125 浅谈翻转课堂及其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闫 鑫
- 128 “金课”背景下人工智能对本科翻译教学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孟海宁 曲家丹

基教理论与思考

- 131 优质提问教学法
——探索优质高效的英语课堂 李 静
- 134 高中英语课程评价体系的现状反思与改进路径 李佳璐

主管单位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湖北大家报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肖昌斌
总 经 理 周发秋
社长/主编 向 东

编辑出版 《英语广场》编辑部

执行总经理 吴 垒

执行总编辑 潘 洁

编辑部主任 方 卫

执行主编 万 学

责任编辑 杨 理 周宇婷

特约编辑 刘仲轲 赵雪纯 张媛媛

美术编辑 高 越

投稿信箱 esteachers@163.com

投稿电话 027-87158992

发行热线 13397135872

发行范围 公开

发行单位 湖北大家报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单位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617/G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6167

邮发代号 38-526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编辑部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址 <http://bk.11185.cn>

广告许可 鄂广登准字(2019)4200000016

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地 址 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67号湖北教育
报社社210室

邮 编 430079

本刊声明

1. 作者给本刊投稿时, 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因作者抄袭或一稿多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本刊概不负责。
2. 作者如无特别声明, 本刊拥有修改和删节来稿的权力。
3. 本刊原则上不退稿, 请自留底稿。三个月未收到刊用通知者, 请自行处理。
4. 本刊发表的文章, 未经本刊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5.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及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来稿凡经录用, 如无特殊声明, 即视为投稿者同意授权, 其文章版权使用费由本刊编辑部统一处理。

惯和文化特征的有机结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交际者应学习运用语块,并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有助于交际者在具体的语境中得体地运用语块顺利完成交际过程,减少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还有助于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 [1] ALTENBERG B, GRANGER S. The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patterning of make in native and non-native student writ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22): 173-194.
- [2] BECKER J. The phrasal lexicon[M]. Cambridge, Mass: Bolt and Newman, 1975.
- [3] LEWIS M. The lexical approach: the state of ELT and a way forward[M].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 1993.
- [4] NATTINGER J R, DECARRICO J S.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白珊.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现象及解决策略[J]. 文教资料, 2016 (20): 30.
- [6] 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7] 刘景岫.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及其对策[J]. 教学研究, 2008 (7): 22-24.
- [8] 王静. 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原因及对策[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9): 176.

(特约编辑: 赵雪纯)

移动技术与情感教学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 侯丽娟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情感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充分考虑认知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情感因素的积极作用来完成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本文借助国外外语教育学界关于情感教学与移动技术相结合的新论述,探究在国内高校英语教育中移动互联网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本文以智能手机、微信为例,将“乐趣”课堂、合作式学习以及移动技术三者进行有机结合,以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学习中。

[关键词] 情感教学; 移动技术辅助语言学习;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167(2021)05-0090-04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专院校校内在线课程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学生上网课时需要转换不同设备和程序进行跨媒体学习,师生、学生缺乏互动交流,部分学生产生了焦虑、困惑等多种负面情感,学生学习效率降低,学习积极性下降(李文昊等,2020)。

在“互联网+教育”的研究及实践中,许多学者忽略了情感教学在新型教学模式中的作用。本文借助国外外语教育学界关于情感教学与移动技术相结合的最新研究,探究国内高校英语教育中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入课堂教学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

作者简介: 侯丽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 英语教学、情感教学。

1 国外外语教育中情感教学与MALL的新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外语教育从突出“理性”转变为重视“情感”在教学中的作用,开始关注师生情感与学习各要素的复杂关系,并提出“情感教学”这一重要教学模式。移动辅助语言学习(Mobile-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以下简称“MALL”)是移动技术与语言学习的结合体。随着移动技术功能不断增强并在人们生活中日渐普及,移动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习,例如用于促进阅读技能、写作技能、口语技能及听力技能等(李青等,2016)。与此同时,学者们一直重视情感对外语学习的重要作用。面对移动互联网与外语教育相结合的教学范式转变,学界提出教师不能只关注技术层面的结合,同时需要重新审视智慧课堂中的积极情感构建(Agudo,2018)以及课堂中学生与移动技术的情感关系及变化等(Benesch,2012),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MALL的发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1.1 MALL带来的新焦虑

随着智能手机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以及学习的必需品,King et al.(2010)指出,年轻人普遍出现一种新的焦虑症状——“无手机恐惧症(nomophobia)”。许多学生需要时刻查看手机以免错过社交圈子的最新动态,而有些学生甚至直接使用手机远程参与朋友的活动,学生因为注意力被大量分散而产生学习焦虑以及不适感.Regan et al.(2012)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以移动技术为中心、强化智能手机使用的课堂,事实上并不能缓解学生的焦虑。

1.2 MALL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

另外一些研究则表明,融合移动技术的课堂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Benesch(2012)通过课堂实践发现手机是学生获取信息的必要工具,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安全感,这使得他们对外语学习更有自信。而其他学者也发现,当教师在课堂适当使用智能手机开展教学活动时,学生更愿意进行互动性学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学能力及学习自信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Chen,2013)。

综上所述,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技术与与课堂教学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既能引起学生的焦虑,也能调动其积极性。而关键在于教师应该重视学生对智能手机使用的复杂情感,合理设计教学模式,将智能手机的使用有机融入教学实践,使学生在焦虑、安全感、积极情感三者中取得平衡。

2 我国情感教学与MALL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研究人道主义心理学理论并开始关注情感因素对学生外语学习的影响(王初明,1988),但至今相关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仍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测试学生的焦虑情感对其外语学习的负面影响(李炯英等,2016)。在外语教学实践中,大部分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仍然是传统的“重知轻情”教学模式,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普遍感到焦虑、无聊,学习投入度低(王西娅,2012)。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教育的结合,我国越来越多学者积极提倡MALL,例如将智能手机与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相结合、指导学生使用各种学习App等。学者们普遍肯定了智能手机在促进学生课外学习以及提高学生学习效能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郑莹,2019)。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转课堂中的课外部分上,例如微课、线上学习App等。而有关课上融合移动技术的教学模式讨论大多集中在辅助性教学活动,如雨课堂、外研社U校园中的点名、小测及作业布置等功能上。这种以认知为中心、个人化的、以练习测试为目的的辅助性学习活动,并没有改变沉闷的语言课堂氛围,反而会使学生感到焦虑。

由此可见,我国外语教育学界对“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及混合式教学等的应用大都集中在课外学习以及课上的练习测试环节,缺乏对情感教学的深入挖掘。但事实上,学生面对多媒体、跨媒体学习的焦虑应该成为教师们进一步改革线上与线下、情感与移动技术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反思

基础。

3 移动技术与情感教学有机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结合笔者的大学英语教学经验,提出复课后,外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应促进课堂氛围、合作式学习、智能手机的有机融合,从而使学生在逐渐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中心的课堂中,在焦虑、安全感、积极情感这三者间取得平衡,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移动技术提高自身的学习自信心和效能感。

3.1 营造充满乐趣及安全感的课堂氛围

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外语课堂中焦虑情感与积极情感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活跃的课堂氛围令学生积极参与到容易让他们产生高焦虑的课堂活动中(Dewaele et al., 2017)。笔者在三年的大英课堂教学实践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因此,安全、自由、活跃的课堂氛围对促进学生更主动、更有效率地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如果没有积极的课堂氛围作为支撑,教师也难以在课堂上运用智能手机开展合作式学习。死气沉沉的课堂只会促使学生过度使用手机进行社交娱乐。在推进合作式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也不愿意积极参与,只是应付式完成任务。因此,营造一种充满乐趣以及安全感的课堂氛围是促进学生进行合作式学习、提高学习效能感的前提及中心。

3.2 将手机微信与合作式学习进行有机结合

Benesch (2012) 提出,智能手机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许多学者也证明了合作式学习有助于降低学生的外语学习焦虑。因此,基于手机终端的合作式学习课堂教学模式,能促进学生更愉快、更主动地学习英语。但当下大部分移动学习的策略都是针对学生个体的学习。而合作式学习意味着学生通过共同工作来促进自己和他人学习效果的最大化,实现共同的学习目标。如何将看似矛盾的两者的进行结合?笔者尝试将手机微信与合作式学习进行有机结合,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形式建立微信学习群,形成合作学习社

区,进行个体自主以及朋辈互助学习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国内外研究证明通过手机学习英语词汇是大学生最经常使用,也是最有效率的外语学习方式(Darmi et al., 2014)。因此,笔者选择融合智能手机的词汇学习作为初步课堂活动。学生通过手机查阅并理解词汇,从而降低语言学习的焦虑,提高其学习信心以及自主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建立微信群,并形成学习社区,完成创意写作活动。创意写作使课堂充满乐趣以及自由的氛围,学生也更有自信进行写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微信学习社区构建学习共同体,通过互助学习进行创作,能进一步提高自身对于语言学习的积极情感、自信以及效能感。

4 结语

“互联网+教育”是大势所趋,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课的普及也证明了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其中,学生的情感因素是不能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当前,外语教师必须重新审视情感教学的作用。各高校只有将情感教学与移动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提出高校教师应为学生营造充满乐趣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构建微信学习合作社区,从而最优化地利用智能手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参考文献

- [1] BENESCH S. Considering emotions in critic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2] CHEN X B. Tablets for informal language learning: student usage and attitudes[J].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2013, 17(1): 20-36.
- [3] DARMİ R, ALBİON P. A review of integrating mobile phones for language learning[C]//Proceedings

护理英语课程教学困局破解之策

□ 吴萌

信阳师范学院医学院

-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Learning. Madrid, Spa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4.
- [4] DEWAELE J M, WITNEY J, SAITO K, et al. 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and anxiety in the FL classroom: the effect of teacher and learner variables[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7, 22 (6): 676-697.
- [5] FERNANDEZ D M. Emo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research and teacher education[C]. AGUDO M, DE DIOS J, eds.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
- [6] KING A L S, VALENA A M, NARDI A E, et al. Nomophobia: the mobile phone in panic disorder with agoraphobia: reducing phobias or worsening of dependence?[J].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neurology, 2010 (1): 52-54.
- [7] REAGAN K, EVMENOVA A, BAKERET P, et al. Experiences of instructors in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dentifying and regulating emotions[J]. 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 2012, 15 (3): 204-212.
- [8] 李炯英, 李青. 我国外语焦虑研究: 回顾与反思——基于外语类期刊近十年(2006—2015)论文的统计分析[J]. 外语界, 2016 (4): 58-65.
- [9] 李青, 翁克山. 协作式移动语言学习协作行为与协作模式分析研究[J]. 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 2016 (6): 44-53.
- [10] 李文昊, 祝智庭. 改善情感体验: 缓解大规模疫情时期在线学习情绪问题的良方[J]. 中国电化教育, 2020 (5): 22-26+79.
- [11]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中的情感因素[J]. 现代外语, 1988 (2): 46-48.
- [12] 王西娅. 情感因素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J]. 外语教学, 2012 (6): 67-70.
- [13] 郑莹. 智能手机辅助大学英语ESP混合式教学探究[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9, 38 (3): 190-194.

(特约编辑: 赵雪纯)

【摘要】 长期以来, 由于受到专业重视程度、教师传统观念、学生学习习惯以及教学效果反拨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护理英语课程在课程定位、教学目标、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护理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难以达到社会对护理人才在外语方面的要求。本文重新审视护理英语的课程定位, 提出高校应科学确立教学目标, 多渠道解决师资问题, 多维度改进教学方法。

【关键词】 护理英语; 课程定位;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167(2021)05-0093-04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到我国求医问药, 许多国内护理专业毕业生也选择到国外学习或就业。此外, 国际医护领域交流以及较高层次的护理科研都需要有相应的护理专业英语能力作支撑。然而, 目前大多数护理专业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和水平远远达不到市场要求。因此, 加强护理英语课程建设和加大护理英语课程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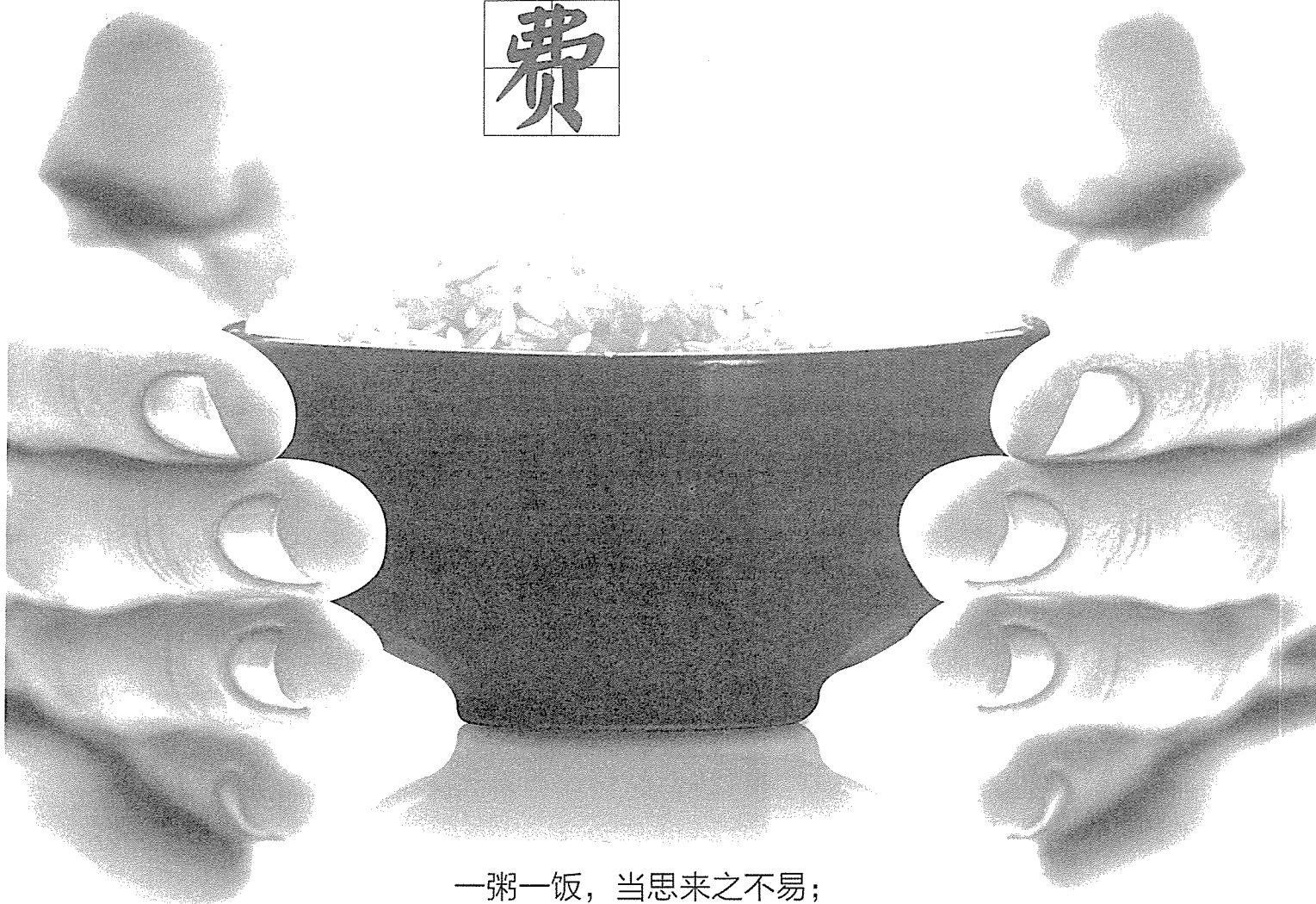
1 护理英语课程教学现存问题

1.1 课程定位不够准确

在语言层面, 护理英语相对于通用英语(EGP,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或专业英语的范畴。在课程层面, 护理英语相对于大学英语之类的通识课程, 属于专业课的范畴。大多高校的护理专业将其列

作者简介: 吴萌,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护理教育

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主管单位：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43007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67号湖北教育报刊社A座210室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2-1617/G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9-6167

国内邮发代号：38-526 定价：20元

检索证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侯丽娟4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作者排名	论文等级	作者文中单位	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中科院大类分区
1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出版年: 2020 JUL 2 卷期: 21 3 页码: 337-355 文献类型: Article	第一作者	B类	华南农业大学	SSCI, AHCI	IF2-year=0.259 IF5-year=0.61 (2020)	法学 4区 Top期刊: 否 (2020)
2	青年网络短视频女权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出版年: 2020 卷期: 19 6 页码: 82-91 文献类型:	第一作者	B类	华南农业大学	人大复印资料		
3	DPE-完整思辨力培养教学模式研究	外国语言与文化 出版年: 2020 卷期: 4 4 页码: 133-145 文献类型:	第一作者		华南农业大学	CNKI		
4	移动技术与情感教学相结合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英语广场 出版年: 2021 卷期: 5 页码: 90-93 文献类型:	第一作者		华南农业大学	CNKI		

说明: 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章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 如未盖章, 报告无效



广东省教育厅

粤教高函〔2023〕33号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3 年度省级一流 本科课程认定结果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省一流本科课程遴选认定工作的通知》，经学校推荐、专家评审、公示、复审等环节，认定中山大学《收益管理》等 950 门课程为 2023 年度省一流本科课程。其中，线上一流课程 66 门，线下一流课程 349 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491 门，社会实践一流课程 44 门，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一流课程建设，积极为认定课程的持续更新完善及教学应用提供资金及政策支持，充分发挥认定课程在教学改革中的示范作用，引导教师全员更新课程建设理念、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完善过程考核评价，全面提升课程质量。

以上认定课程应至少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至 2028 年，期间课程负责人、教学团队、排课情况应保持基本稳定。线上一流课程须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平台开放共

享。相关课程平台应做好课程的运营、服务、及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保障课程稳定运行。

省教育厅优先支持上述认定课程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并通过评价调研、定期检查等方式，对认定课程的后续建设工作进行跟踪监管。未能按照一流课程要求应用、完善或共享的课程，将取消省一流课程资格。

附件：广东省 2023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



学校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华南农业大学	大学语文	白海英
华南农业大学	基础学术英语	梁红梅
华南农业大学	分子生物学	王少奎
华南农业大学	传统工艺（植物染、刺绣）与时尚设计	彭梅
华南农业大学	土地信息系统	王枫
南方医科大学	神经生物学	高天明
南方医科大学	医院管理学	王冬
南方医科大学	科研方法概论	毛琛
南方医科大学	血液与肿瘤	李玉华
南方医科大学	危重病医学	刘克玄
南方医科大学	Clinical procedures	李薇
南方医科大学	生物安全	赵卫
南方医科大学	法医物证学	朱波峰
南方医科大学	妇产科学	马颖
南方医科大学	口腔修复学	邵龙泉
南方医科大学	中医养生指导	孙晓敏
南方医科大学	药剂学	涂盈锋
南方医科大学	运动系统与皮肤	相大勇
南方医科大学	机能实验学 I	董为人
南方医科大学	小儿外科学	吴凯
南方医科大学	医疗机构营销	王丽芝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伤科学	林定坤
广州中医药大学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何彦丽
广州中医药大学	健康评估	李春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医妇科学	梁雪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妇产科护理学	杨明

附件 4

广东省本科高校线下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

课程名称：基础学术英语

课程负责人：梁红梅

课程类别：☒ 通识课/公共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课 ☐ 其他

申报课程学校：华南农业大学

所属学科门类：文学

所属专业类：英语

专业代码：050201

申报日期：2023.8.16

广东省教育厅制
二〇二三年六月

	Success Story of Sustainabl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angdong, China 李岚茵; Changes Generat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and Crop Cultivation 吴迪	杯“美丽乡村,希望田野”英语写作技能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奖(选手李岚茵获二等奖、选手吴迪获三等奖)。	
	学术交流英语	2021 省首届课程思政教学比赛校级比赛三等奖(独立)	2021 年 9 月 18 日
	研究、实践、范式、互通:英语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	2021 省教育厅首批本科高校课程思政优秀案例排第四	2021 年 12 月 6 日
	An Integrated English Class on Fatherhood following UbD	2020 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全国决赛二等奖排第四	证书编号: 2020-01JD-189
		2020 省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二等奖排第四	证书编号: G2OWSDW013

2.课程团队情况（含课程负责人）

序号	成员姓名	所在单位	学科背景	职称	手机号码	承担课程任务
1	梁红梅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主讲教师、课程思政设计
2	冯立新	华南农业大学都柏林国际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院长负责:课程思政指导与学术指导,协同育人
3	Alex Runchm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Dublin、GDIC	英语文学、应用语言学	Senior Teaching Fellow		课程主任负责:课程规划、设计、制定、期中与期末试卷撰写,学术培训与指导,协同育人
4	郝刚	华南农业大学都柏林国际学	植物学	教授		教学院长负责:课程思政指导与学术

		院				指导, 协同育人
5	苏安梅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讲师		资源建设、课程成果应用与推广
6	周美珍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讲师		资源建设、课程成果应用与推广
7	秦建华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	副教授		资源建设、课程成果应用与推广
8	侯丽娴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研究	讲师		资源建设、课程成果应用与推广

*课程团队成员超过 5 人的, 可以续表填写。

3.课程基本信息

3-1 课程 基本 信息	课程名称	GDIC1001K: English for University Studies 大学基础英语（原名称）基础学术英语（现名称）
	课程编码（教务系统中的编码/选课代码）	1. 2023-2024-1: 课程编码: 602984; 课程名称: 基础学术英语 2. 2021-2022-1: 课程编码: 602533; 课程名称: 大学基础英语 3. 2022-2023-1: 课程编码: 601817; 课程名称: 大学基础英语（阅读） 4. 2020-2021-1: 课程编码: 601817; 课程名称: 大学基础英语
	面向专业	都柏林国际学院 4+0 项目
	开课年级	一年级
	课程学时	总 130 学时 = 中教 78+外教 52
	课程学分	总 8 学分 = 中教 4.8 + 外教 3.2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高考英语成绩 110 分以上
	后续课程名称（选填）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通用学术英语）、Academic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学术交流英语）、Academic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专业学术英语）
	主要教材	书名、书号、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提供封面及版权页） 中教负责听力与阅读部分, 主要教材: 书名: Access EAP Foundations 书号: 9781859645246, Sue Argent 作者: Olwyn Alexander

华南农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 “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 获奖名单

公示

2024-12-26 来源: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各学院（部、中心）：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评选办法》（华南农办〔2017〕71号）要求，经各学院（部、中心）推荐、学校审核、评奖专家组评审，确定严慕婷等 20 位教师获得华南农业大学 2023-2024 学年 “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现将获奖名单（按姓氏笔画）予以公示。

奖项	姓名	比赛课程	单位
一等奖	严慕婷	海洋生物学基础	海洋学院
	李培	林木遗传育种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郑倩望	食品微生物学	食品学院
二等奖	王光	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园艺学院
	沈兴	食品营养学	食品学院
	张学杰	材料物理	材料与能源学院
	张新珩	动物免疫学	动物科学学院
	陈珺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施诗	树木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顾方愉	知识产权法学	人文与法学院
三等奖	王小玉	用户界面设计	艺术学院
	王晓亚	草地管理学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邓光远	二外德语	外国语学院
	周文英	体育舞蹈	体育教学研究部
	周宇峰	兽医药理学	兽医学院
	侯丽娴	中外文化比较	外国语学院
	施琳琳	智能控制	工程学院
	顾婷	生物统计附试验设计	动物科学学院
	董莹	投资学	经济管理学院
	程蛟文	园艺植物种子生产原理与技术	园艺学院

公示期自 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0 日。对结果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方式向本科生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实名反映，匿名不予受理。

联系人：卢老师 朱老师

地 址：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邮 箱：jsfzzx@scau.edu.cn

本科生院

2024 年 12 月 26 日

结项证书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共建课题

(批准号: 2022GZGJ249)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 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
大湾区认同机制研究

负责人: 侯丽娴 (华南农业大学)

主要成员: 柳青、霍胜侠、郭燕平、曲舒文、张颖、

周舒燕、赵铁哲

结项等级: 良好

证书号: GZSK2024291

本项目经审核准予结项, 特发此证。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30 日



课题编号

2022GZGJ249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立项协议

甲 方：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二楼

联系电话：020-89815149

法定代表人：曾伟玉

乙 方：华南农业大学（单位） 侯丽娴（课题负责人）

地 址：（单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课题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手机号码：

课题负责人邮箱：

二〇二二年五月

一、经专家组评审、社会公示，报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将乙方申请的课题《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研究》立为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共建课题（课题编号：2022GZGJ249）。本课题负责人侯丽娴，课题组成员霍胜侠、柳青、郭燕平、曲舒文、张颖、周舒燕、赵轶哲。课题研究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30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

二、该课题的研究经费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保障或课题负责人自筹，由所在单位保障的可参照羊城青年学人课题的经费标准提供并管理。课题完成后，由乙方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鉴定结项，结项评审结果通报市社科规划办。如乙方无故终止课题研究，按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经费预算明细表 (由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决定是否填写)			
序号	科目	预算金额 (万元)	预算支出内容
一	间接经费(小计)	0	/
1	管理费	0	
2	其他支出	0	
二	直接经费(小计)	3	/
1	资料费	0.2	用于购买和项目相关学术书籍及资料的费用

2	数据采集费	0.5	用于采访研究对象而产生相关数据采集费用
3	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0.6	用于参加与课题相关学术会议的会议注册费和差旅费
4	设备费	0.1	采访录音设备费用
5	专家咨询费	0.6	用于支付与本课题相关专家的指导与咨询费
6	劳务费	0.8	用于支付编码短视频内容以及转写采访录音的工作人员劳务费用
7	印刷出版费	0.2	用于支付印刷项目相关资料、出版项目论文费用
8	其它支出	0	
总 额		3 万	

三、课题研究和结项要求

1.以论文为最终研究成果的：一般性论文（市级以上媒体的理论文章）发表2篇。

2.以研究报告为最终研究成果的：研究报告不少于2万字，研究主要内容获区级以上有关职能部门采纳、借鉴1批次以上。

3.以专著为最终研究成果的：专著书稿符合正式出版条件或已出版。

对应课题申请书承诺的最终研究成果形式，满足以上条件之一的即可以申请结项。

需提交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结项材料：①结题报告书；②研究成果（论文或研究报告或专著书稿）；③佐证材料（职能部门采纳证明的复印件、期刊相关内容复印件等）。并发送以上材料电子版至市社科规划办邮箱 gzsgbh@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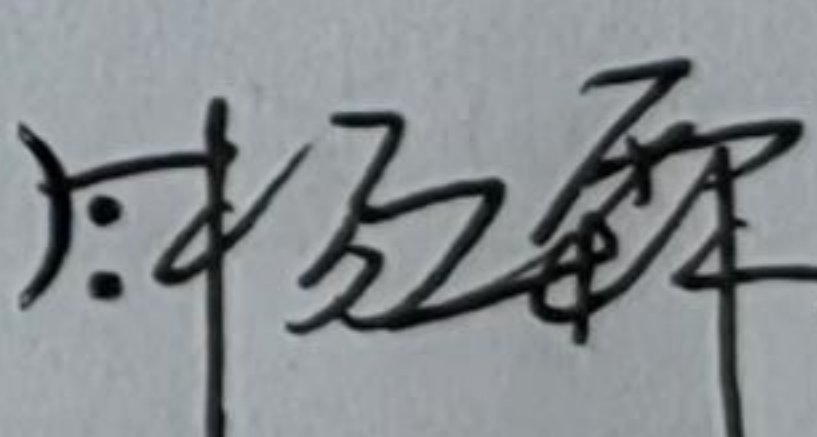
四、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期刊发表或出版，或被相关部门采纳），应标注“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 2022 年度课题”字样和课题编号。

五、课题组必须遵守《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和所在单位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规定，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合理使用课题研究经费，保证恪守学术规范，不弄虚作假，保证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六、《课题立项协议》一式三份，一份由甲方保存，一份由乙方保存，一份由乙方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保存。

甲方：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盖章）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 363 号宝供大厦二楼

市社科规划办/市社科联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日期：2022 年 5 月 30 日

乙方：华南农业大学（单位 盖章） 侯丽娴（课题负责人）

通讯地址：（单位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

日期：2022 年 5 月 30 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粤社科规办通〔2021〕42号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1年度外语专项立项通知书

柳青同志：

经资格审查、立项评审及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您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1年度项目外语学科专项《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获准立项，批准号：GD21WZX01-13。项目资助经费5万元，第一次拨款3.5万元，预留经费1.5万元。请认真填写立项回执（从“广东社科规划”网站“下载专区”下载），并于11月20日

- 1 -

前寄回我办，资助经费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直接拨付给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项目负责人填写回执后，本通知即成为具有约束效力的立项协议。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须承担保证责任。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须了解和执行以下规定：

1. 批准后的项目经费不再追加，课题组可以不接受。而一经接受，将不能以经费不足为由，擅自变更原设计的最终成果形式和内容。

2. 项目立项后，课题组须按项目申请书所列计划开展研究。研究过程中，如有变更项目负责人、改变成果内容或形式、变更项目管理单位、变更或增补课题组成员、终止项目或撤消项目等重要事项，项目负责人或所在单位必须及时填写《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报我办审批。

3. 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须提供准确的项目经费账号。账号信息如有变动，须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我办，以便及时拨款。

4. 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发表时，必须注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字样。

5. 项目鉴定结项由我办统一组织，每年下半年集中受理一次。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我办提交项目结项材料。结项所需材料、装印要求等具体事项，请登录广东社

科规划网站“结项信息”栏目查看。

6. 项目最终成果的结项鉴定实行匿名鉴定制度。

7. 成果鉴定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通过结项的，将拨付预留经费。不合格即未能通过结项，其预留经费不予拨付，课题组需修改后重新申请结项鉴定。仍不能通过的，将作撤项处理。所有项目成果的鉴定等级均通过广东社科规划网站予以公示，并通知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

8. 对于立项后两年不能完成的项目，我办将在第三年统一组织清理。在规定时间内不提交结项材料，或结项成果经鉴定不合格的，省社科规划办予以终止或撤项处理，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报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9. 课题组须遵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对于出现违规行为的，我办依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以上规定，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须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如有异议，可不接受资助（在回执中注明），立项协议自行废止。

联系人：张媛媛

电话：(020) 83825078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科中心 9 楼省社科规划办

邮编：510635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8 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项目 外 语 专 项

申 请 书

项 目 类 别 外语学科专项
项 目 名 称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
知话语建构研究
项 目 负 责 人 柳青
负责人所在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
填 表 日 期 2021 年 6 月 5 日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制

二〇二一年五月

一、项目负责人、主要参加者情况

项目名称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							
研究方向	文化与跨文化研究					研究类型	基础理论研究	
项目负责人姓名	柳青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REDACTED]		
职 称	讲师	行政职务	无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最后学位	博士		
研究专长	话语分析	担任导师	硕士导师		外语语种 熟练程度	精通		
工作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联系电话	[REDACTED]	电子邮箱	[REDACTED]		传 真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					邮 编	510660	
主要参加者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研究专长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侯丽娴	女	[REDACTED]	讲师	文化学	博士研究生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
	金茹花	女	[REDACTED]	讲师	话语分析	博士研究生	博士	中原工学院
	林金容	女	[REDACTED]	讲师	话语分析	博士研究生	博士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
预期成果形式（不超过两项）	论文 3 篇（CSSCI 和 SSCI 期刊）				字数（单位：千字）	27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5				预计完成时间	2023 年 7 月 1 日		

第二参与人：2021 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批准号：GD21WZX01-13）

科研空间

欢迎您，侯丽娟老师

科研动态

我的办公

我的项目

我的经费

我的成果

我的学术交流

我的考核

我的主页

常用下载

项目立项

项目申报 (1)

所有项目

职称评定

主持的项目

参与的项目

博硕导评定

主持的项目

参与的项目

项目性质

纵向(4项)

项目分类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1项)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

参与形式

主持(1项)

参与(3项)

总数:4项 (表中经费单位: 万元)

项目名称

查询

新增

删除

导出

全选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项目成员	起止日期	合同金额	项目状态	审核状态	操作
<input type="checkbox"/>	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研究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侯丽娟,柳青,霍胜侠(外),郭燕平(外),曲舒文(外),张颖(外),周舒燕(外),赵铁哲	2022-05-30--2024-05-30	0	完成	学校通过	编辑
<input type="checkbox"/>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柳青,侯丽娟,金茹花(外),林金容(外)	2021-09-30--2023-09-30	5	进行	学校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广州市多语生态环境下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郭圣琳,肖好奎,杨曙,赵无忌,侯丽娟,陈琳慧	2020-04-30--2022-11-15	1	完成	学校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广府民俗文化的译介及影响研究--以《粤讴》为例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文瑞,李韵婷,侯丽娟,侯金萍,任杨,朱婕,王岫庐(外),陈庆(学)	2020-03-18--2022-03-18	3	进行	学校通过	

1/1 共4条

1

科研空间

欢迎您，侯丽娟老师

科研动态

我的办公

我的项目

我的经费

我的成果

我的学术交流

我的考核

我的主页

常用下载

项目立项

项目申报 (1)

所有项目

项目查看

导出

职称评定

操作

编辑

主持的项目

参与的项目

博硕导评定

主持的项目

参与的项目

项目性质

纵向(5)

项目分类

广州市

广东省

广东省

(1项)

参与形式

主持(1)

参与(4)

立项信息

项目文档

批复预算

额度预算

预算结余

衍生成果

到账经费

支出经费

外拨经费

年度工作量

仪器设备

【基本信息】

学科门类:

社科类

项目名称:

来华留学生对中国抗疫的认知话语建构研究

项目编号:

GD21WZX01-13

校内编号:

负责人类型:

本校老师

负责人:

柳青

所属单位:

外国语学院

学科分类:

项目来源: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项目分类: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级别:

省部级

项目子类:

税率:

0

外拨经费单位(合作单位):

无

【详细信息】

关闭

科研空间

欢迎您，侯丽娟老师

科研动态我的办公我的项目我的经费我的成果我的学术交流我的考核我的主页常用下载

项目立项项目申报(1)

所有项目

项目查看

【详细信息】

项目类型：	独立课题	批准号：	GD21WZX01-13
经费来源单位：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费用类型：	非财政资金项目支出类（省级科研）
承担方式：	主持	项目状态：	进行
立项日期：	2021-09-30	开始时间：	2021-09-30
计划完成日期：	2023-09-30	结项日期：	
合同经费：	5 万元	间接经费：	2 万元
直接经费：	3 万元	财务账号：	E220011
外拨经费：	0 万元		

【项目成员】

署名顺序	人员来源	成员姓名	学科方向	成员性别	职称	学历	工作单位
1	本校老师	柳青	语言学	女	初级	博士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
2	本校老师	侯丽娟	新闻学与传播学	女	讲师	博士研究生	外国语学院

关闭

导出

操作

编辑

结项证书

项目类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9CDJ013）

项目名称：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

负责人：郭燕平

主要参加人：张颖 侯丽娴 席艺洋 黎俊忻

证书号：20232238

鉴定等级：合格

本项目经审核准予结项，特发此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3年06月29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立项通知书



与原件相符

郭燕平

同志：

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您申请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

获准立项，批准号 19CDJ013，项目类别 青年项目，资助总额 20.00 万元，第一次拨款 19.00 万元，预留经费 1.00 万元。

本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5 日，立项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您及责任单位要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承担相应责任并执行以下规定：

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精品意识，立足学术前沿，体现有限目标，突出研究重点，避免重复研究，弘扬优良学风，恪守学术规范，着力推出代表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项目

项目登记号	
-------	--

项目序号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申 请 书

学 科 分 类	党史·党建
项 目 类 别	青年项目
课 题 名 称	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 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
申 请 人 姓 名	郭燕平
申 请 人 所 在 单 位	华南师范大学
填 表 日 期	2019.02.15

与原件相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制

2018 年 12 月

课题负责人承诺：

课题名称	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									
关键词	农村放映 电影宣传 社会动员 集体化									
项目类别	C	A.重点项目 B.一般项目 C.青年项目 D.一般自选项目 E.青年自选项目								
学科分类	DJC	党史·党建其他学科								
研究类型	A	A.基础研究 B.应用研究 C.综合研究 D.其他研究								
课题负责人	郭燕平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行政职务	无	无	专业职称	C	中级	研究专长	DJC	党史·党建其他学科		
最后学历	A	研究生	最后学位	A	博士	担任导师	无	无		
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K	广东省				所属系统	A	高等院校、其他学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	身份证件号码				是否在内地(大陆)工作的港澳台研究人员		否		
课题组成员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职称	学位	工作单位	研究专长	本人签字			
	张颖		副高级	博士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电影史研究				
	侯丽娟		中级	博士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媒介文化研究				
	黎俊忻		中级	博士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社会文化史研究				
	席艺洋		中级	博士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媒介史研究				
第一推荐人		专业职称			工作单位					
第二推荐人		专业职称			工作单位					
预期成果	C	A.专著 B.译著 C.论文集 D.研究报告 E.工具书 F.电脑软件 G.其他					字数(千字)	40		
申请经费(单位:万元)		20		计划完成时间		2022年2月15日				

二、课题设计论证

项目参与证明

本人郭燕平（[REDACTED]）是华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主持 201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项目《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电影宣传与社会动员研究》（批准号：19CDJ013）。

侯丽娴（[REDACTED]），华南农业大学讲师，是此项目的第二参与人，主要负责资料搜集以及提供媒介文化分析的建议。特此证明！

签名：[REDACTED]

日期：2022-4-10

SCAULIB202519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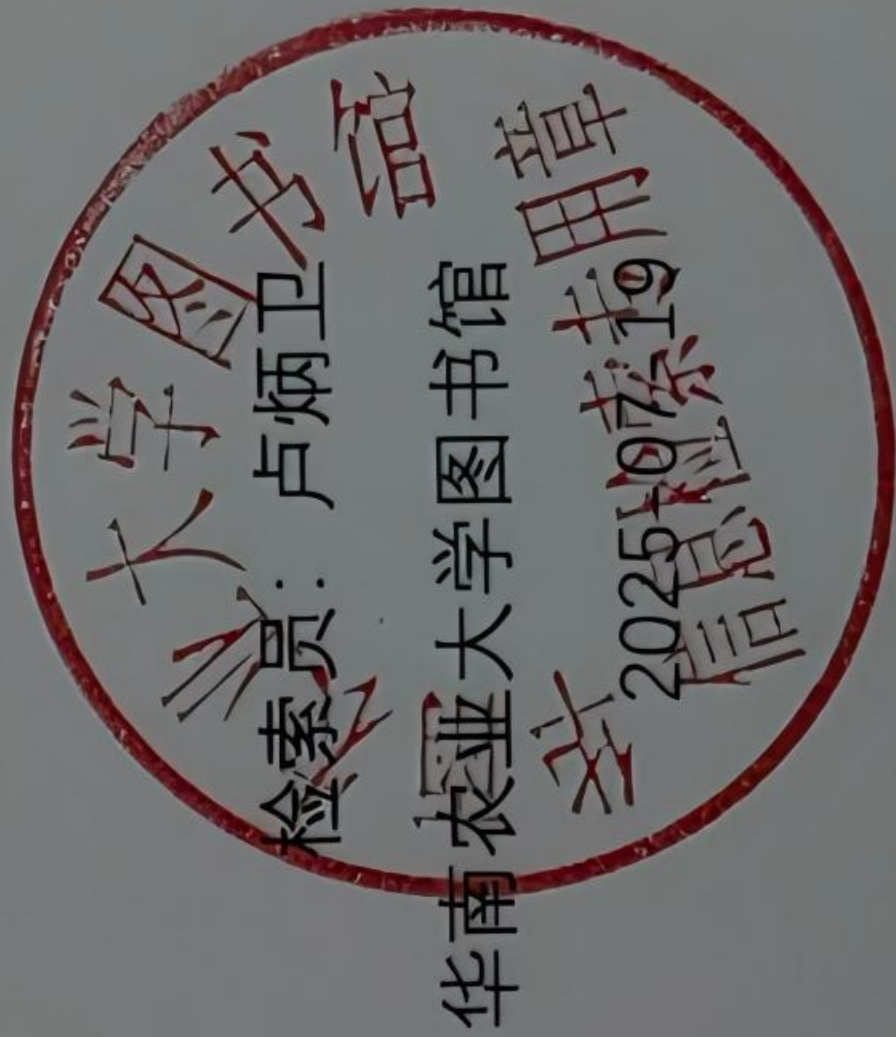
检索证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侯丽娴 2 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作者排名	论文等级	作者文中单位	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中科院大类分区
1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出版年: 2020 出版日期: JUL 2 卷期: 21 3 页码: 337-355 文献类型: Article	1	C类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SCI	IF2-year=0.259 IF5-year=0.61 (2020)	法学 4区 Top 期刊: 否 (2020)
2	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hina: situat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出版年: 2023 出版日期: AUG 8 卷期: 25 4 页码: 711-733 文献类型: Article	1	B类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SCI	IF2-year=1.9 IF5-year=2.4 (2023)	社会学 3区 Top 期刊: 否 (2023)

说明：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位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如未盖章，报告无效



检索证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侯丽娴 1 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作者排名	论文等级	作者文中单位	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中科院大类分区
1	青年网络短视频女权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研究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出版年：2020 卷期： 页码： - 文献号： 文献类型：	1	B类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人大复印资料	无	无

说明：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位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如未盖章，报告无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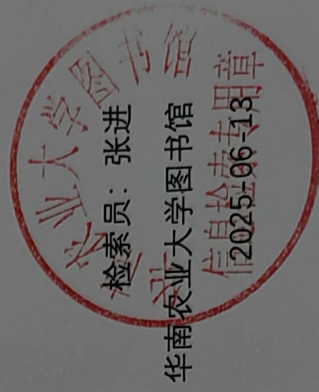
检索证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论文材料，委托人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侯丽娟 2 篇论文收录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及发表的年月卷期/页码等	作者排名	论文等级	作者工作单位	收录情况	影响因子	中科院大类分区
1	香港青年大湾区短视频实践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研究	南方论刊 出版年：2024 卷期： 5 页码： 82-85 文献号： 文献类型：	1	普刊类	华南农业大学	CNKI	无	无
2	香港青年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视听 出版年：2024 卷期： 13 页码： 18-22 文献号： 文献类型：	1	普刊类	华南农业大学	CNKI	无	无

说明：论文等级和中科院大类分区按《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划分。

报告免责声明：如未盖章，报告无效





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hina: situat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Holly Lixian Hou (she/her/hers)

To cite this article: Holly Lixian Hou (she/her/hers) (2023) 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hina: situat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5:4, 711-733, DOI: [10.1080/14616742.2023.2238211](https://doi.org/10.1080/14616742.2023.22382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14616742.2023.2238211>



Published online: 14 Aug 2023.



Submit your article to this journal [↗](#)



Article views: 230



View related articles [↗](#)



View Crossmark data [↗](#)



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hina: situat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Holly Lixian Hou (she/her/hers)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has been used controversially by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activists to engage the state for legal refor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Drawing insight from the concept of situated knowledg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that enabled lala (queer women) activists to adopt a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It unravels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ir assimilation to effect policy change and their entanglements with feminists.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rticle first delineates the contours of lala activists' struggle and traces their strategic choice of assimi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1990s to the 2000s. Second,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wo aspects of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ion: establishing an ambiguous position toward institutions and orienting activism toward indirect legal provisions. Third, the article illuminates how lala activists created new gender dynamics through this politics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nd of lesbian–feminist cooperation characterized by restricted visibility in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and an open coalition with different feminists. I also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and conclude by summarizing how lala activism can enrich global dialogues on the controversial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the diversity of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s.

KEYWORDS Lala activism in China; anti-domestic violence movement;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policy change in China;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s

HISTORY Received 5 July 2021; Accepted 24 January 2023

Introduction

Chinese lesbian activists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local term “lala” to include different kinds of queer women in their movement. The organizing of lalas in China dates back to the 1990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lala activists have focused mainly on building local communities and providing

CONTACT Holly Lixian Hou  houlixian@scau.edu.c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2023 Informa UK Limited, trading as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mmunity services. Many of their activities have been organized surreptitiously so as to circumvent surveillance. Lala activism, which is initiated and implemented solely by lala activists and is not associated with gay activists, is generally “quiet” (Rofel 2008) and invisible and thus has attracted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ildebrandt and Chua 2017).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cultural and media activism within the lala community and explored how lala activists have constructed discourses on coming out (Wang 2021) and gender roles (Huang 2015), how they have made print and digital journals to produce unique lala and queer cultures (Han 2021; Yang 2019), and how they have coped with the sense of loss and trauma in their activism (Huang 2017, 2021). Some schola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the increasing association of lala identity with the emerging grassroots¹ feminist campaigns launched mainly by a cohort of young women since 2012 (Bao 2020; Liu, Huang, and Ma 2015; Wei 2015). However, lala activism and politics aimed at creating policy change and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movement are still underexplored. This is unfortunate because lala activists have developed innovative strategies to further their goals through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feminists and the state. Between 2007 and 2015, lala activists from an organization referred to here as ABC,² one of the leading lala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dopted a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to wide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mainstream anti-domestic violence (DV) movement,³ and, at the same time,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enactment of a national Anti-DV Law designed to protec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er (LGBTQ+) people, among others.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activist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 to incorporate LGBTQ+ people into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o engage the state to make legal changes to endow LGBTQ+ people with the same rights as heterosexuals, such as legislation permitting same-sex marriage (NeJaime 2018; Robson 2002). Yet this approach is also highly contentious; i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queer and liberationist activists as a threat to the subversive power of both LGBTQ+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and a co-optation of dominant institutional norms (Bernstein and Taylor 2013; Duggan 2003; Richardson 2004, 2005; Warner 1993).

This understanding of and controversy about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is situated withi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which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o mount bottom-up campaigns to engage the state for policy change; meanwhile, radical and confrontational activ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GBTQ+ movement. By contrast, lala activism is situated in a polit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authorities have strict regulations against grassroots organizing (Liu and Chang 2019).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lala activists, like all other grassroots activists in

China, have learned how to survive and negotiate with the government by keeping their activism quiet, non-confrontational, and depoliticized (Ho 2008; Spires 2011; Wesoky 2002; Zhang 2009). While visible political activism seems to be impossible for lala activists,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to be part of mainstream feminist activism, as LGBTQ+ issues are still sensitive and censore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Facing such socio-political limitations, how did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e lala issues into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anti-DV movement in China, and what kinds of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s did they form? How did they get involved in the interplay with the state and assimilate the protection of lala rights into the state's legislation of the Anti-DV Law?

Drawing insight from the concept of situated knowledges, this article seeks answers to the above questions and illuminates the situated meaning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ntroduced by Donna Haraway (1988), the concept of situated knowledges indicates that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 always partial and located (Jackson 2011; Nash 2001; Rose 1997). Feminist and queer scholars accentuate the importance of location in their own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and politics, where "location" refers to the diverse specificities of local history, culture, polity, law, religion, and so on (Alexander and Mohanty 2010; Browne and Nash 2016; Franks 2002; Madhok 2018, 2020; Mohanty 1992).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of lala activists' adoption of a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their assimilation. The article's aim is twofold: (1) to contest the limited nature of the dominant knowledge on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in European and US academia, and (2) to suggest new perspectives on producing and practicing the local specificities of the lesbian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lesbian-feminist interactions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lala activism and politics in two phases of the Chinese anti-DV movement, between 2007 and 2009 and between 2014 and 2015. The analysis engages critical dialogues with the dominant scholarship on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on the complexity of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s in Europe and the US. Such scholarship informs the positionality from which I began my reflectivity in the fieldwork and in this article. I then investigate the situated meaning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eminism in three sections.

First, three key factors are introduced as the framework: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 structure of the movement organization, and its adaptation of influences from other social movements. These factors are used to delineate the contours of lala activists' struggle and to situate their strategic choice of assimilation with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from the 1990s to the 2000s. Second, two aspects of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ion to create policy change in the Chinese anti-DV movement are

elaborated: establishing an ambiguous position toward institutions and orienting activism toward indirect legal provisions. Third, the article illuminates how lala activists created new gender dynamics through such a politics in forming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to feminism characterized by restricted lala visibility in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and an open coalition with different feminists. I also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and conclude by summarizing how lala activism can broaden global conversations on the strategic and situated meanings of assimila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esbian–feminist entanglements.

Methods and material

This article builds on my PhD project, and specifically on my fieldtrip to ABC on November 20–23, 2014, as well as my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between 2014 and 2016 with 16 lala activists who worked in the organization and/or participated in anti-DV activism. Each of these interviews lasted two to three hours and was conducted in a semi-structured manner in Chinese. The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with the interviewees' consent and transcribed for analysis. The excerpts quoted in the article are my own translations. The article quotes four of the lala activists who are significant in the anti-DV movement; their names are coded to protect their anonymity. I conducted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Respondent D on October 6, 2014, in Hong Kong; with Respondents B and C in Beijing on November 20 and 21, 2014; and with Respondent A on January 21, 2016, in Shenzhen. After 2016, I continued to observe ABC's anti-DV activism via it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In addition to the interviews, my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notes from my fieldtrip,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on Chinese LGBTQ+ issues, and internal documents that I collected at lala and LGBTQ+ activities or downloaded from ABC's website.

Controversial assimilation, lesbian–feminist entanglements, and positionality

Kath Browne and Catherine Nash (2016, 7)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ituatedness in queer activism, noting that "social science and queer intersections need to recognise the location of both of their key defining terms and their various ways of knowing (even where they are widely and diversely used)." This section engages cr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revalent arguments on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the interwoven history of lesbian and feminist activism in Europe and the US. It accentuates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in China underpinning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their entanglements with feminists.

Controversial assimilation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within the LGBTQ+ movement “typically embraces a rights-based perspective, works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pluralist democracy – one situated within classical liberalism – and fights for a seat at the table” (Rimmerman 2008, 5). With this strategy, activists tend to emphasize LGBTQ+ people’s “sameness” or “similarity” to heterosexuals and pursue an insider position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seek legal changes so as to endow LGBTQ+ people with equal rights (Ghaziani, Taylor, and Stone 2016, 166; Kim 2016, 710; Rimmerman 2008, 5). Thi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s especially controversial in the US LGBTQ+ movement (Bernstein and Taylor 2013; Rimmerman 2008). Liberationist and queer scholars in the US critique this approach as an erasure of distinctive LGBTQ+ identities and a failure to both challenge heteronormativity and subvert dominant institutions (Bernstein and Taylor 2013; Duggan 2003; Richardson 2004, 2005). Such critiques are situated in an extensive history of homophile activism in the US since the 1950s. Liberationist activists since the 1960s and queer activists and scholars in their militant response to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HIV/AIDS) pandemic since the late 1980s have advocated the liberationist approach, which adopts an outsider position against heterosexual institutions and prioritizes radical activism for cultural change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Kim 2016, 710; Rimmerman 2008, 5).

For lala activists, the earliest recorded Chinese homophile activism only took place surreptitiously in Beijing in the 1990s. Though homosexuality was decriminalized in 1997 and depathologized in psychological diagnosis in 2001, it is still perceived as immoral and censore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s a result of such sensitivity,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lala organizations remains precarious. Neither the assimilationist nor the liberationist approach is feasible for lala activists in most cases. The specific Chinese historical moment and particular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not only facilitated lala activists’ engagement with the state, but also made their assimilation of lala rights into policy chang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

Lesbian–feminist entanglements

Many scholars concur that lesbianism and feminism have been inextricably connected in both epistemology and practice since the onset of the second wav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Europe and the US, but that this connection has also been characterized by tension (Heller 1997; Jeffreys 2018; Zimmerman and McNaron 1996). The paradigm of lesbian–feminist dynamics has always been illustrated in the complicated trajectory

of crossings. Lesbian and feminist activism have long been interwoven, sharing similar goals, and lesbian activists have been openly acknowledged as a prominent force in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since the 1960s, with lesbianism sometimes labeled as radical – the “lavender menace” (Heller 1997; Rubin 2006). The close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paradigm of lesbian activism and by studies that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toward identity politics and queer theory since the 1990s (Rudy 2001; Zimmerman 2007). Hence, an open coalition, regardles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has been advocated to resume the connection (Jeffreys 2018).

Lala activism is situated in a very different histo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since LGBTQ+ issues are still taboo in state ideology, neither queer activism nor queer studies have gained much legitimacy and prevalence.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1950s, the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⁴ a mass organization directly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has played the dominant role in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Its attention to women's sexuality focuses on women's sexual health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sex work,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Howell 2010; Ke 2015), but excludes women'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desire. Closely following the ACWF's work, the discourses in mainstream feminist scholarship rarely show interest in lesbianism (Wu 2018).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feminist activism, lala activists have mainly conducted their own independent activism and constructed their own cultures in a quiet way. Acknowledging the significance of feminism, lala activists do not expec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ainstream feminists and created their own way to cooperate with them in the anti-DV movement.

Positionality

To adhere to the thesis of situated knowledges, researchers should always be reflective about their positionality as an insider or outsider in the field (Berger 2015; Naples 2003; Nash 2016). When I started my fieldwork, I initially considered myself an insider. On the one hand, I was well informed by the scholarship in Europe and the US on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the close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 On the other hand, as a Chinese person and a postgraduate student in Guangzhou, I gained access to local lala groups by attending activiti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I had three years of volunteer experience in lala community services between 2010 and 2013. However, when I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ABC between 2013 and 2016 and started my fieldwork on the organization in 2014, my position shifted from insider to outsider.

In contrast with most lala groups, which avoided anything public or political, ABC was and is one of the few lala organizations in China committed to launching advocacy campaigns for public education and to influencing policy change on LGBTQ+ rights. I was an outsider to such a model of lala activism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political context for grassroots activism was restrictive, and mainstream feminists' attitudes toward lesbianism were conservative. On the other hand, most activists from ABC had received bachelor's degrees or higher at elite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of them not only knew but also embraced queer theory and liberationist arguments. Yet, lala activists strategically adopted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successfully worked with feminists and even the ACWF to push the state to legislate against DV.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led to exciting and situated forms of queer feminist activism in China.

To unravel such situatedness, I readjusted my position in this project as "in between" insider and outsider (Dwyer and Buckle 2009). I perceived the lala activists from ABC as "intellectual equals" (Mullings 1999, 340), which would avoid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academia and activism, with the researcher positioned as the privileged one. As an in-between, I adopted the tactic of active listening with respect to lala activists' accounts of their anti-DV activism without judgment. I regarded the interviews as a means of mutual learning (Milan 2014) with lala activists to discuss broad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LGBTQ+ activists, between lesbian activists and feminists, and between queer politics and other non-confrontational politics in the fight against DV and for LGBTQ+ rights in China and beyond. Those dialogues provided great insights into the situated understanding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feminism in the anti-DV move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ree factors to situate assimilation

Controversial though assimilation is, scholars have found that LGBTQ+ activists often adopt this approach and switch to the liberationist one in accordance with changing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hey propose a variety of factors tha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understand activists' strategic choices (Ghaziani, Taylor, and Stone 2016; Rimmerman 2008).

Craig Rimmerman (2008) emphasizes one key factor that prompts LGBTQ+ activists to oscillate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 POS is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lens through which to examine social movements, as it brings into view a broad set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unique to the nation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Meyer 2004). Within the LGBTQ+ movement, specific political climates and elite allies are often examin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POS (Armstrong 2002; Rimmerman 2008).

Mary Bernstein (1997) raise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the structure of movement organizations. She categorizes such organizations as either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Inclusive organizations “adopt strategies to seek to educate and mobilize a constituency or maximize political involvement,” whereas exclusive organizations oppose the above strategies and “actively discourage popular participation” (Bernstein 1997, 539).

Ashley Currier (2007) highlights a third key factor: influence from other movemen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ough scholar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ften refer to influences from the LGBTQ+ movement in the US, they are critical of the narrative of origin in the US LGBTQ+ movement and the discourse on progressive and backward politics within the European and US scholarship (Currier 2007; Jackson 2009).

The following section uses these three factors to explain why and how lala activists chose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It helps to delineate the contours of their struggle and to situate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for lala activists’ strategic choice of assimilation from the 1990s to the 2000s.

Lala activists’ strategic choice of assimilation

Drawing on the thre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his section illustrates that (1) the Fourth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Women (FUNCW) provided crucial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lala activists to build connections with feminist elites; (2) ABC was structured as an inclusive movement organization with a mission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3) lala activists were influenced by Chinese gay and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ir adoption of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in the anti-DV movement.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the FUNCW

While a substantial body of scholarship explores how the FUNCW offered positiv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exponential rise of women’s NGOs and their diverse activism in China (Feng 2018; Milwertz 2002; Wang 2010; Wesoky 2002), few studies attend to its impact on lala organizing (Bao 2020; Wei 2015). Lala activists described the FUNCW as “opening the door” for independent lala organizing and early dialogues with feminist elites and ACWF cadres. Lala activists latched onto the relaxed political climate generated by the FUNCW for women’s autonomous organizing to make their initial attempt at establishing independent lala groups in Beijing and even holding national events.

More importantly, the FUNCW galvanized open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feminists and foreign lesbian activists, both in the preparatory events abroad before 1995 and the NGO forum at home in 1995 (Milwertz 2002). After the FUNCW, those open dialogues continued between local

lala activists, some open-minded ACWF cadres, and feminist professionals in private and academic settings in the 1990s (ABC Internal Document 1).⁵ Building friendly interpersonal ties with these feminist elites created another significant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 elites became reliable allies and crucial intermediaries connecting lala activists with anti-DV activism in 2007. Respondent A explained:

We realize that the feminists and professionals we built interpersonal ties with many years ago are the top experts on DV. Their support for our anti-DV activism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ll of those years, we have had just a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m but no cooperation for activism. But in retrospect, such interpersonal ties were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our later alliance.

ABC's inclusive structure

After 2004, though lala groups were thriving all over China, almost all of them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exclusive, in Bernstein's terms. They aimed to build closed, small, and safe networks for local lalas, and thus they mainly offered quiet community services and balked at any public or provocative activities. The exclusive structure of these groups was attributed not only to their political constraints but also to the precarity of lala organizing. Respondent C summarized it as "three nos": "no money, no human resources, no example of a mature organizing structure."

In 2004, ABC was established and became one of the very few lala organizations to have an inclusive structure. Though ABC also faced the conundrum of the "three nos," it had a vision of igniting the fire of the lala movement in China by declaring its clear mission of "launching advocacy on LGBTQ+ equality for public education and engaging in policy change" on its web page and Weibo account.

Since ABC's establishment, lala activists affiliated with it have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encompass more constituencies into their activism and to exploit any opportunity to be involved in policy change. The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sume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feminist elites through cultural events and exchanges, and found the issue of DV to be the icebreaker among ACWF cadres, feminist elites, and lala activists for joint activism. Respondent A pointed out:

ACWF cadres and the mainstream women's NGOs are not concerned about sexuality or lala issues. They don't think they are important. So, let us talk about what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Let's talk about DV. Without DV,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carve out the space for us to ally with them.

Respondent A's comment verifies once again that the Chines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never took lesbian issues into account. Nevertheless, lala activists from ABC were tactical in recentring their discussion on DV

so as to create a common interest among lala activists, ACWF cadres, and feminist elites and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alliance with those actors.

Influences from domestic gay activism and feminist politics

Compared with HIV/AIDS issues in the gay community, lala issues were not perceived to be urgent or crucial for the stat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any policy change. In the 2000s, the seriousness of the HIV/AIDS problem escalated,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Since then, its prevention has been written into the state agenda, and gay activists have maneuvered this agenda to cooperate with officials and to conduct advocacy on gay rights. However, lala activists could only opt for an indirect way to change policy through the state agenda on women's rights instead. Respondent D explained:

You have to assimilate [*naru*] your agenda into the state's. You don't get to raise your own agenda. This is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China. Whatever the state agenda is, you need to assimilate yours into it. The gay activists could assimilate their agenda into the state's AIDS project. Lala activists could assimilate their agenda into the state's project on women's rights. We are not in a state where you could bring out your issues freely to the state.

For Chinese grassroots activists, the only way to engage the state for policy change is to embed their demands in the agenda that the state has already approved (Ho 2008). For gay activists, the state agenda of HIV/AIDS is their ticket to make political claims. For lala activists, women's issues and women's rights are the potential leverage, sinc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has been emphasized in the Chinese state's political agenda since the FUNCW (Ke 2015).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ion of their agenda into the specific feminist issue of DV was a strategic choic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anti-DV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and significant agendas in the mainstream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since the 2000s (Feng 2018) and that the feminist anti-DV campaign for policy change was a success. In 2003, the Anti-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 (ADV), the only national women's NGO on DV, launched the first bottom-up legislative campaign, which became an annual event (Feng 2018; Wang 2010; Zhang 2009). To exert more influence on policymakers, they adopted a politics of engagement; that is, they engaged the ACWF to conduct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sm and to gain an insider position within the system (Zhang 2009). Though the ACWF is not a policymaking institution per se, it has the author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resources to mobilize opinions nationally and to participate in gender-specific policy and legislative processes (Howell 2010, 203). Zheng Wang (2010, 110) describes the ADV's politics as "the best channel for feminist infiltration into the state in the post-FUNCW time." Allying with the

ACWF enabled feminists from the ADVN not only to be involved in the anti-DV legislative process at both local and national levels, but also to conduct workshops on gender for local judicial and police officers.

In 2007, ABC decided that the time was ripe for lala activists' engagement with policy change on DV, as it had significant mentorship from elite feminist allies who were major actors in the ADVN, and the legislative space was opened up by the ADVN and the ACWF for anti-DV activism.⁶ Hence,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ed the DV issue from the lala community into the mainstream framework of feminist activism against DV and applied for the ADVN's funding project on DV. ABC received a grant for its proposal of a survey on DV in the lala community and "carve[d] out the space" to openly work with different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ACWF for anti-DV activism after 2007.

The next two sections elaborate on how lala activists conducted their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to create policy change and new gender dynamics. They unravel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ion and interaction with feminists.

Creating policy change

While assimilation often embraces an insider position in the system so as to make policy change directly (Rimmerman 2008), lala activists sought an ambiguous position toward institutions and strived for an indirect legal approach that could protect their rights in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This section explores how lala activists conducted assimilation characterized by ambiguity and indirectness in their two phases of anti-DV activism between 2007 and 2009 and between 2014 and 2015, respectively.

The first phase: establishing an ambiguous position toward institutions

Though the ADVN's politics of engaging the ACWF gave it a seat at the table for policy change, this came at the cost of its autonomy and radical demands for women's rights (Zhang 2009). Because of this, lala activists aimed to establish an ambiguous position toward the ACWF – that is, seeking proximity to the ACWF and yet keeping it at arm's length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irst phase, lala activists attached significance to proximity, as it could help them to advance their agenda of influencing policy change by connecting with the ACWF. To achieve this proximity, at the inception of their activism, they had to reshape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discourse that denied lesbian rights and to address feminists' ignorance of DV in the lala community. The feminist legal expert Rong Weiyi explained in the 2000s:

Though the perception of women's rights as human rights is widely accept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women's rights do not include lalas' rights. Though society has shown more understanding and even a certain acceptance of homosexuality, it is still ignorant about DV among homosexuals. Though society has gained awareness that the majority of DV victims are women, [it still considers that] those women do not include lalas. (ABC Internal Document 3)⁷

Thus, ABC articulated lala rights within women's rights by emphasizing the similarity of DV among lala and heterosexual women in a report:

Lalas who suffer from DV show high similarity to straight women, including the trigger of violence – jealousy and distrust. The victims also legitimize their own experience as normal and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as a direct result of an inadequate support system.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To foreground such similarity, lala activists tactically desexualized their identity and underlined the seriousness of lala DV by using alarming statistics of DV victims in the lala community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They further employed stories of battered lalas who had suffered from their parents' or relatives' violence when they came out and from their partners' control by threatening to expose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so as to attribute the seriousness of lala DV to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ity in China. They also highlighted 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lalas to turn to the police and the ACWF – the key state agents that deal with DV in China – for help because of the prejudice against LGBTQ+ people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ACWF cadres and mainstream women's organizations were shocked by the critical status of DV in the lala community. They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lala DV, and lala activists were able to cooperate with these organizations on anti-DV activism in different public settings. Lala activists' proximity to ACWF cadres and mainstream feminists was established. Such proximity provided lala activists with opportunities not only to be involv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ut also to gain access to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or instance, in June 2014, ABC wa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 high-ranking consultation conference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V co-organized by the ACWF and the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 Women) in Beijing. There, it successfully mobilized legal experts, who would also take part in the state's anti-DV legislative process, to take the protection of same-sex relationships into consideration (ABC Internal Document 4). In 2015,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Anti-DV Law, ABC was invited by a provincial ACWF branch to co-organize a workshop that aimed to train judges and police officers 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law. Lala activists were offered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make their way into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curatorate department, and people's courts (*daru gongjianfa*)" to conduct advocacy with respect to both LGBTQ+ people's DV and LGBTQ+ rights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However, seeing opportunities in such proximity, lala activists were cautious about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ACWF and the mainstream women's NGOs. Respondent B highlighted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o them:

Lalas could take part in some aspect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for socio-political changes, because we share common interests in those aspects, like the issue of DV. We could form coalitions and strategic unions. But we should be cautious and keep our distance. Lala activism is pioneering and radical. They [the ACWF and mainstream women's organizations] could be very conservative.

Respondent B's comments show that lala activists did embrace queer and liberationist arguments against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Though lala activists adopted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s a strategic act for policy change, they were alert to the intrinsic heteronormativity and to conservative attitudes toward sexuality within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movement and kept a critical distance beyond their joint activism against DV.

The second phase: orienting activism toward indirect legal provisions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imed to create policy change that could be used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indirectly rather than directly. Lala activists' tactic of indirectness was built on their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nd legal context in China.

In 2014, anti-DV legislation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state's five-year agenda.⁸ However, feminists and legal experts had been struggling since 2003 to lobby state legislators to include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in cohabitation under the new law. The legislators' official response was that cohabitation was not mentioned in any law with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us they could not create an opening for discussing such a relationship under the Anti-DV Law.⁹ However, Respondent A further disclosed: "The state legislators did not want to touch the definition of family. Some legal experts told me that they [legislators] aimed to safeguard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and thus rejected the inclusion of cohabitation in the new law."

Confronting such a political constraint, feminists and scholars replaced "cohabitation" with "intimate partnership" to prompt legislators to let their guard down. ABC adjusted its assimilation accordingly, from simply integrating lala rights into women's rights to embedding the lala relationship within intimate partnership, and it worked with feminists to conduct a survey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China and street advocacy activities. Lala activists explained, first, that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was an inclusive term intended to protect LGBTQ+ relationships and circumvent the use of sensitive words such as "cohabitation" and "homosexuality." Second, a similar strategic act proved feasible through successful legislative activism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ABC Internal Document 4). Such adaptation revealed feminists' and lala activists' ability to compromise and be flexible to cope with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successful. When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Anti-DV Law was passed by the state on December 27, 2015, though the terms "cohabitation" and "intimate partnership" were still avoided, the neutral phrase "people who live together," which includes these two kinds of relationships, had been written into the new law.¹⁰ Both lala activists and feminists celebrated this phrase as an inclusive legal provision that could be used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albeit indirectly. Respondent A commented:

Generally speaking, our [lala] activism to facilitate the legislation of the Anti-DV Law is a success because the main goal we se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campaign was to carve out the legal space for LGBTQ+ people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under the new law. Our goal has been achieved. Though this is an indirect legal provision for LGBTQ+ rights, LGBTQ+ people could still utilize this law in reality for litigation, and it will show that the new law could be used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Lala activists' achievement of this indirect legal provision is a significant and hopeful step forward to protect LGBTQ+ rights in the system. Instead of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the state for the unitary goal of an explicit legislative change following the European and US model of assimilation,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reflects their pragmatism in achieving multifaceted and small political gains for opening up a space to gain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negotiate incremental legal change.

The following section elaborates on how lala activists created new gender dynamics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nd of lesbian-feminist cooperation.

Creating new gender dynamics

In contrast with the entanglements between feminism and lesbianism replete with crossings, collisions, and coali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S, lala activists' open participation in mainstream feminist activism only commenced a decade ago in the anti-DV movement, and such lesbian-feminist coopera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restricted lala visibility and an open coalition.

Restricted lala visibility in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While lala issues were always invisible in public, they became "an open social issue" (*gongkaide shehuiyiti*) after ABC's first phase of anti-DV activism. On January 7, 2010, the authoritative state media outlet *Legal Daily* published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the lala DV survey completed by ABC. It highlighte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lala DV in the state agenda of anti-DV legislation. Meanwhile, ACWF cadres also made a public

commitment to “take lala DV seriously and help them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future” (Zhu 2010).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media and the ACWF had not only recognized lalas’ existence openly, but also confirmed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them.

With endorsement from those two institutions, lala activists gained unprecedented visibil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In 2009, they were invited to cooperate with 30 other mainstream women’s organizations for 16-Day Activism, an annual public feminist activity supported by the ACWF and the state media (Feng 2018). Lala activists wer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advocacy toward mainstream feminists on the diversity of both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gender identities. In addition, they were permitted to conduct street advocacy in public, promoting anti-discrimination against LGBTQ+ people and their equal rights (ABC Internal Document 2). However, such visibility was restricted to images of lalas as marginalized DV victims. The perspective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exual pleasure have not been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Nevertheless, the assimilation of lala DV into the anti-DV movement helped feminist elites to reflect on heterosexual hegemony in their anti-DV activism, and they expanded their formerly conservative definition of DV, which had only recognized violence by men toward women in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Rong Weiye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lala activism in *Legal Daily*: “The [lala] Report expands the definitions of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targeted at women is not limited to that from heterosexual men towards women, but between women as lesbians and bisexuals, and all these women need society’s support” (Zhu 2010).

Restricted though it was, lala visibility in anti-DV activism enlightened mainstream feminists on the issues of diverse sexual orientations and gender identities and helped to facilitate feminist discussions of women’s issues beyond heteronormativity in action and in academic seminars.

An open coalition between lala activists and feminists

Lala activists from ABC commenced their anti-DV activism based on a broad and open coalition. They did not insist on identity politics, but embraced “an open assemblage that permits of multiple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without obedience to a normative telos of definitional closure” (Butler 1991, 16). In the second phase of anti-DV activism, lala activists made an explicit point of establishing “the broadest coalition” (*guangfan lianmeng*):

In a legislative advocacy campaign, our coopera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internal [LGBTQ+] community, but to establishing the most open and broadest coalition with the various kin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about the same issue. This coalition refers to both the form of cooperation, and the advocacy strategy concerned with a wide range of people instead of

confined to our [LGBTQ+] group so as to gain more support. (ABC Internal Document 4)

Through this broad coalition, lala activists mobilized the lala community, the gay community, and different kinds of feminists, legal experts, and ACWF cadres to work together beyon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and toward the greater good for a wider range of people. Lala activists' open coalition with feminists and legal experts remained active after the anti-DV activism. In 2016, they collaborated again on a new project for policy change – the legalization of single women's freedom to freeze eggs – and in 2019, they conducted a legal activist campaign together – filing a lawsuit about a single woman's autonomy to freeze eggs with the aim of opening up legislative space for this issue. In the lawsuit, the plaintiff was a lala, but withheld her sexual identity. In a similar vein to anti-DV activism, lala activists assimilated lalas' rights into single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so as to strive for common interests for both communities of straight women and lalas.¹¹

Within the short history of lesbian–feminist cooperation in China, lala activists have had restricted visibility in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movement. However, they envisioned an open coalition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feminists for multifaceted interactions to create an egalitarian society for more people,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and sexual identities. Through coalition building, lala activists were able to generate new gender dynamics and gained more weight incrementally in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The limitations of lala politics

Since 2016, ABC has facilitated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by “mainstreaming” (*zhulihua*) the issue of LGBTQ+ people's DV. It uses this issue to consolidate its connection with feminist elites, legal experts, and ACWF cadres and to push the Anti-DV Law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with detail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n court cases (DEF Internal Document 1).¹² In June 2016, ABC established a new center for the mainstreaming mission, which has since organized a number of workshops and research seminars with this goal in mind (DEF Internal Document 2).

However, the limitation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have become palpable. The legal opportunity around the Anti-DV Law and the mainstreaming effects that lala activists expected to engender were precarious and constrained. In a press conference on December 27, 2015, the spokes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explicitly disavowed the Anti-DV Law's protection of same-sex partnership. Lala activists commented on the disavowal as “an anticipated official attitude” that could not cancel the legal provision created for LGBTQ+ people.

However, until now, the legal space has remained closed. According to a 2021 annual report on DV inside the LGBTQ+ community, not a single

court case alleging LGBTQ+ people's DV has ever been successfully filed (DEF Internal Document 2). Most judges, police, and ACWF cadres – all key agents in practicing the Anti-DV Law – still refuse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from DV. What is worse, many LGBTQ+ people consider DV to be a private matter and feel ashamed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nd they do not think that they should or could turn to the law for help.

In addition, LGBTQ+ people's DV and lala issues have been erased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again since 2016. While official news channels, mainstream media, and social media have all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DV cases, only one women's NGO reported a single case of lala DV on its digital platform between 2016 and 2020 (Xia, Feng and Cao 2020, 19). The visibility of the lala community and activism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seems to have been ephemeral.

The limitations of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resonate with liberationist activists and queer scholars' critiques. Rather than pushing for rad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lalas adopted a strategy of assimilation to suppress their subversive identity and emphasize their similarity to heterosexuals in the case of DV, and as a result the hegemony of heteronormativity was not challenged. Thus, the repudiation of LGBTQ+ ident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continues, as does self-contempt among the LGBTQ+ community. However, how to challenge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without provoking reprisals from the authorities has always been an intricate puzzle not only for lala activists, but for all grassroots activists in China.

Conclusion

Lala activists from ABC embrace queer theory as well as pragmatism. In an adverse socio-political climate for bottom-up activism, they found a way to assimilate their demands into the mainstream anti-DV movement and to facilitate legislative change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enriched their dialogues with global feminist and queer communities on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and the diversity of lesbian-feminist relationships.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to creating policy change is not feasible for lala activists all of the time in the Chinese context. Lala activists' adoption of assimilation with regard to anti-DV campaigning was situated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articular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bold and strategic act. Being pragmatic about and critical of the conservatism in mainstream institutions, lala activists maintained an ambiguou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ACWF and mainstream women's NGO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state's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assimilate the protection of LGBTQ+ rights indirectly into the new national Anti-DV Law. Through such assimilation, they not only

opened up a potential legal space to protect LGBTQ+ rights in China, but also gained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s they were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conduct anti-DV training for local judges and police officers. While those in the insider position are able to pursue the direct and unitary goal of seeking rights in the assimilationist approach in the democratic system,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emphasized ambiguity and indirectness. While the effects of this politics were difficult to discern, lala activists managed to achieve multifaceted and small political gains.

Through such assimilation, lala activists also formed their own trajectory of lesbian–feminist cooperation to create new gender dynamics. Without a significant history of crossing and colliding, lala activists only earned membership of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movement in recent decades, and their visibility has been restricted to anti-DV activism. Nevertheless, they did not hold onto the prevalent lesbian–feminist model of closeness and inseparability; rather, they embraced the strategy of coalition with a variety of feminists. The lesbian–feminist coalition enabled lala activists to enjoy greater agency in initiating more joint activism based o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both straight women and lalas, such as the legal activism on single women's reproductive rights.

Lala activists'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entail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last section shows the disturbing consequences of this politics: the continued refusal of state legislators, judges, police officers, and even ACWF cadres to protect LGBTQ+ people under the Anti-DV Law, as well as the erasure of DV reports in the LGBTQ+ community in both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mainstream women's movement since 2016. However, lala activists anticipated such backfires as they underst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s with regard to LGBTQ+ issues in China and the complex power dynamics in the 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 In a nutshell, they consider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a success and continue to adopt that approach when the time is right. As always, lala activists are comparatively quiet and exceedingly pragmatic in making small openings and bringing about incremental soci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The situated meanings accentuated in this article mark their creative and concerted efforts and open the way for more studies on their diversified politics in the future.

Notes

1. The term "grassroots" is commonly adopted by Chinese activists from NGOs, especially those who cannot get officially registered and are in marginalized positions.
2. To protect the anonymity of the lala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adopts "ABC" as a code name.
3. The anti-DV movement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refer to those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 For more about the ACWF, see Howell (2010).
5. To protect the anonymity of ABC, titles, years of publication, and page numbers are not given for internal documents.
6. Lala activists' anti-DV activism was also inspired by legislative anti-DV cases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that included the protection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people. See ABC Internal Document 2.
7. ABC completed its first phase of activism by publishing an earlier version of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in 2009. ABC Internal Document 3 includes all of the information published in the 2009 version and introduces legislative anti-DV ca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8. In China, when an issue is listed in the state's five-year agenda, state legislators will prioritize this issue in legislation; often, this means that a new law or policy on this issue will emerge.
9. See http://www.npc.gov.cn/zgrdw/npc/zhibo/zzzb33/node_9635.htm (accessed June 28, 2021).
10. More details on this law are available on the government website on the Anti-DV Law: <http://www.npc.gov.cn/npc/c10134/201512/a0381e5e6b894620870382f8423a378e.shtml> (accessed July 11, 2023).
11. In China, it is illegal for single women to freeze their eggs. For the state media report on the litigation, see Tong (2019).
12. DEF comprises a number of lala and gay organizations.

Acknowledgments

I extend my greatest gratitude to the lala activists whom I interviewed for their trust in this project and to the anonymous reviewers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during the revision of the article.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Notes on contributor

Holly Lixian Hou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ina. She obtained her PhD in Cultural Studie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in December 2016. Her research explores how young feminists and queer activists have cooperated on campaigns to change curr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to develop a new politics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Her recent publications include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2020) and "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the Youth's Online Feminist Video Activism and Its Precarity" (2020, in Chinese).

Refer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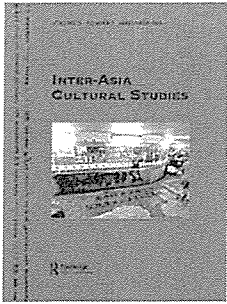
- Alexander, M. Jacqui,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2010. "Cart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 Transnational Feminism as Radical Praxis." In *Critical*

-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xis*, edited by Amanda Lock Swarr and Richa Nagar, 23–45. Albany, NY: SUNY Press.
- Armstrong, Elizabeth. 2002. *Forging Gay Identities: Organizing Sexuality in San Francisco, 1950–1994*.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o, Hongwei. 2020. “‘We Are Here’: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Narrating China’s Queer Feminist History.”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34 (4): 514–529. doi:10.1080/10304312.2020.1785079.
- Berger, Roni. 2015. “Now I See It, Now I Don’t: Researcher’s Position and Reflexiv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15 (2): 219–234. doi:10.1177/1468794112468475.
- Bernstein, Mary. 1997. “Celebration and Suppression: The Strategic Uses of Identity by the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 (3): 531–565. doi:10.1086/231250.
- Bernstein, Mary, and Verta Taylor, eds. 2013. *The Marrying Kind? Debating Same-Sex Marriage within the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owne, Kath, and Catherine Nash. 2016. “An Introduction.” In *Queer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 Intersecting Queer Theor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Kath Browne and Catherine Nash, 1–24. Burlington, VT: Ashgate.
- Butler, Judith. 1991. “Imitation and Gender Subordination.” In *Inside/Out: Lesbian Theories, Gay Theories*, edited by Diana Fuss, 13–31. New York: Routledge.
- Currier, Ashley. 2007. “The Visibility of Sexual Minority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Duggan, Lisa. 2003.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Dwyer, Sonya, and Jennifer Buckle. 2009. “The Space Between: On Being an Insider-Outsid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8 (1): 54–63. doi:10.1177/160940690900800105.
- Feng, Yuan. 2018. “Women Levering the State in a Glocal China.” In *Gender Dynamics, Feminist Activ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edited by Guoguang Wu, Yuan Feng, and Helen Lansdowne, 187–215. London: Routledge.
- Franks, Myfanwy. 2002. “Feminisms and Cross-Ideological Feminist Social Research: Standpoint, Situatedness and Positionality – Developing Cross-Ideological Feminist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3 (2): 38–50.
- Ghaziani, Amin, Verta Taylor, and Amy Stone. 2016. “Cycles of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in LGBT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2: 165–183. doi: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352.
- Han, Ling. 2021.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 Queer Feminist Community: The Lesbian Print Magaz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9 (14): 2388–2411.
-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s the Site of Discourse on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3): 575–599. doi:10.2307/3178066.
- Heller, Dana, ed. 1997. *Cross Purposes: Lesbians, Feminists and the Limits of Allian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ildebrandt, Timothy, and Lynette J. Chua. 2017. “Negotiating In/Visibil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esbian Activism and Rights Advocac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8 (4): 639–662. doi:10.1111/dech.12314.
- Ho, Peter. 2008. “Self-Imposed Censorship and De-Politicized Politics in China: Green Activism or a Color Revolution?” In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edited by Peter Ho and Louis Edmonds, 20–40. London: Routledge.
- Howell, Jude. 2010. "Women's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aking a Differenc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5 (2): 191–215. doi:[10.1080/1461674032000080567](https://doi.org/10.1080/1461674032000080567).
- Huang, Ana. 2015. "On the Surface: 'T' and Transgender Identity in Chinese Lesbian Culture." In *Queer/Tongzhi China: New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ctivism and Media Cultures*, edited by Elisabeth Engebretsen and William Schroeder, 111–130. Copenhagen: NIAS Press.
- Huang, Ana. 2017. "Precariousness and the Queer Politics of Imagination in China." *Culture, Theory and Critique* 58 (2): 226–242. doi:[10.1080/14735784.2017.1287580](https://doi.org/10.1080/14735784.2017.1287580).
- Huang, Ana. 2021. "Queer Women's Activism in China: Trauma, Sociality, and Confrontational Politics." PhD thesis, Duke University.
- Jackson, Peter. 2009. "Capitalism and Global Queering: National Markets, Parallels among Sexual Cultures, and Multiple Queer Modernitie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5 (3): 357–395. doi:[10.1215/10642684-2008-029](https://doi.org/10.1215/10642684-2008-029).
- Jackson, Peter, ed. 2011. *Queer Bangkok: 21st Century Markets, Media, and Righ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Jeffreys, Sheila. 2018. *The Lesbian Revolution: Lesbian Feminism in the UK, 1970–1990*. New York: Routledge.
- Ke, Qianting. 2015. *Wome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2015: Policy Research from Gender Justice Perspective* [In Chines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Kim, Suzanne. 2016. "LGBTQ Social Movements (Assimilation vs. Liberation)." I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LGBTQ Studies*, edited by Abbie Goldberg, 710–7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iu, Na, and Tsan-Kuo Chang. 2019. "In the Shadow of State Power: Citizenship Rights, Civil Society,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2000–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 1570–1591.
- Liu, Wen, Ana Huang, and Jingchao Ma. 2015. "Young Activists, New Movements: Contemporary Chinese Queer Feminism and Transnational Genealogies." *Feminism & Psychology* 25 (1): 11–17. doi:[10.1177/0959353514563091](https://doi.org/10.1177/0959353514563091).
- Madhok, Sumi. 2018. "Coloniality, Political Subjectivation and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Protest in a 'State of Exception'." *Feminist Review* 119 (1): 56–71. doi:[10.1057/s41305-018-0121-z](https://doi.org/10.1057/s41305-018-0121-z).
- Madhok, Sumi. 2020. "A Critical Reflexive Politics of Location, 'Feminist Debt' and Thinking from the Global South."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7 (4): 394–412. doi:[10.1177/1350506820952492](https://doi.org/10.1177/1350506820952492).
- McAdam, Doug,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Zald, eds.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David.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25–145. doi:[10.1146/annurev.soc.30.012703.110545](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30.012703.110545).
- Milan, Stefania. 2014. "The Ethics of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In *Methodological Practice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edited by Donatella della Porta, 446–4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wertz, Cecilia. 2002. *Beijing Women Organizing for Change*. Copenhagen: NIAS Press.
- Mohanty, Chandra. 1992. "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In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edited by Linda Nicholson and Steven Seidman, 6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llings, Beverly. 1999. "Insider or Outsider, Both or Neither: Some Dilemmas of Interviewing in a Cross-Cultural Setting." *Geoforum: Journal of Physical, Human, and Regional Geosciences* 30 (4): 337–350. doi:[10.1016/S0016-7185\(99\)00025-1](https://doi.org/10.1016/S0016-7185(99)00025-1).
- Naples, Nancy. 2003. *Feminism and Method: Ethnograph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Activist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Nash, Catherine. 2001. "Siting Lesbians: Sexuality, Spa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Queer Country: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in the Canadian Context*, edited by Terry Goldie, 235–256. Vancouver: Arsenal Press.
- Nash, Catherine. 2016. "Queer Conversations: Old-Time Lesbians, Transmen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Research." In *Queer Methods and Methodologies: Intersecting Queer Theor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Kath Browne and Catherine Nash, 129–142. Burlington, VT: Ashgate.
- NeJaime, Douglas. 2018. "Differentiating Assimilation." *Studies in Law, Politics, and Society* 75: 1–42. doi:[10.1108/S1059-433720180000075001](https://doi.org/10.1108/S1059-433720180000075001).
- Richardson, Dianne. 2004. "Locating Sexualities: From Here to Normality." *Sexualities* 7 (4): 391–411. doi:[10.1177/1363460704047059](https://doi.org/10.1177/1363460704047059).
- Richardson, Dianne. 2005. "Desiring Sameness? The Rise of a Neoliberal Politics of Normalization." *Antipode* 37 (3): 515–535. doi:[10.1111/j.0066-4812.2005.00509.x](https://doi.org/10.1111/j.0066-4812.2005.00509.x).
- Rimmerman, Craig. 2008. *The Lesbian and Gay Movements: Assimilation or Liber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Robson, Ruthann. 2002. "Assimilation, Marriage, and Lesbian Liberation." *Temple Law Review* 75 (4): 709–810.
- Rofel, Lisa. 2008. "Desire Is Back in China." *The Gay & Lesbian Review*, January. Accessed July 14, 2023. <http://glreview.org/article/article-681>.
- Rose, Gillian. 1997. "Situating Knowledges: Positionality, Reflexivities and Other Tac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 (3): 305–320. doi:[10.1191/030913297673302122](https://doi.org/10.1191/030913297673302122).
- Rubin, Gayle. 2006.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ulture, Society, and Sexuality*, edited by Peter Aggleton and Richard Parker, 143–178. New York: Routledge.
- Rudy, Kathy. 2001. "Radical Feminism, Lesbian Separatism, and Queer Theory." *Feminist Studies* 27 (1): 190–222. doi:[10.2307/3178457](https://doi.org/10.2307/3178457).
- Spires, Anthony. 2011. "Contingent Symbiosis and Civil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Understanding the Survival of China's Grassroots NGO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1): 1–45. doi:[10.1086/660741](https://doi.org/10.1086/660741).
- Tong, Lan. 2019. "Behind the First National Court Case of Women's Rights of Freezing Eggs: Policy Is Outdated and the Officials Are Extremely Cautious Not to Set a Precedent." *China Business News*, December 25.
- Wang, Zheng. 2010. "Feminist Networks."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edited by You-Tien Hsing and Ching Kwan Lee, 101–118.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Yiran. 2021. "Revisiting the Dominant Coming Out Discourses in China's LGBT Activism and Research: Lesbians' Chugui Experiences within the Family."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25 (4): 279–294. doi:[10.1080/10894160.2021.1969720](https://doi.org/10.1080/10894160.2021.1969720).
- Warner, Michael, ed. 1993. *Fear of a Queer Planet: Queer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ei, Tingting. 2015. "A Look at the Beijing Conference through Lesbian Eyes."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1 (3): 316–325. doi:[10.1080/12259276.2015.1072944](https://doi.org/10.1080/12259276.2015.1072944).
- Wesoky, Sharon. 2002. *Chinese Feminism Faces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Wu, Xiaoying. 2018. "The Discourse of Gender Studies in China: From Topics to Debat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5: 21–32.
- Xia, Tian, Yuan Feng, and Zhuyu Cao. 2020. *The Fourth Annual Monitoring Report on the Practices of the Anti-DV Law (March 1, 2016–February 29, 2020)*. Beijing: Weiping.
- Yang, Yu. 2019. "Lush Grass, Regrows in Spring: Queer Lala Times as Feminist and Queer Media in China." *China Media Research* 15 (2): 19–28.
- Zhang, Lu. 2009. "Domestic Violence Network in China: Translating the Transnational Concept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o Local Act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2 (3): 227–239. doi:10.1016/j.wsif.2009.05.017.
- Zhu, Wentan. 2010. "The First Report on Lesbian Domestic Violence in China: The Majority Were in Silence and Tears." *Legal Daily*, January 7. Accessed June 14, 2021. 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df/201001/t20100111_5312791_3.htm.
- Zimmerman, Bonnie. 2007. "A Lesbian–Feminist Journey through Queer Nation."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11 (1–2): 37–52. doi:10.1300/J155v11n01_03.
- Zimmerman, Bonnie, and Toni McNaron, eds. 1996. *The New Lesbian Studie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at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Hou Lixian

To cite this article: Hou Lixian (2020)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1:3, 337-355, DOI: [10.1080/14649373.2020.1796352](https://doi.org/10.1080/14649373.2020.179635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14649373.2020.1796352>



Published online: 17 Sep 2020.



Submit your article to this journa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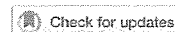
Article views: 288



View related articles [↗](#)



View Crossmark data [↗](#)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new feminist politics in China

HOU Lix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ngages the global controversies of digital feminism within the recent scholarship and offers a situat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young women’s digital feminism. Based on the ethnographic online observation of young women’s activism in social media from 2012 to 2018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eminist activists, my analysis takes the two landmark online campaigns in Weibo as case studies: Naked Ches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and #MituInChina, and elaborates on how such digital activism converged in and diverg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from the 1950s to 2000s and rewrote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in these three aspects: (1) establishing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via different ways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2) further politicizing women’s private matters for provoking public discussions and pressuring the government for policy changes; (3) forming new coalitions for public activism. The article further exposes the drawbacks of such digital activism: (1) the precarity of digital platforms; (2) the problems of politicizing personal issues in social media. This paper aims to delineate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picture of Chinese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feminism in Asia.

KEYWORDS

Chinese young women; digital activism; new feminist politics;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drawbacks

Introduction

Since 2012, young women’s¹ thriving online activism against gender inequality and sexism in Sina Weibo² has become the limelight and emblem of digital feminism in China. It was commenced by Naked Chest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 (DV) in 2012—the first landmark digital campaign in Weibo featured with the radical body politics of nudity, and reached its peak by #MituInChina in 2018³—the Chinese version of #MeToo movement—kindling an unprecedentedly heated discussion on sexual harassment in Weibo and other social media. This hashtag activism was also perceived as the revival of feminism, as grassroots feminist activism,⁴ online and offlin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has fallen into stagnancy since 2015,⁵ when the state intensified its surveillance on non-official feminist campaigns.

Chinese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is among the global new wave of young generation’s digital feminism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shares some common features: a focus on personal issues and activism highlighting hypervisibility, conn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Jouët 2018; Rogan and Budgeon 2018; Boyle 2019; Mendes, Ringrose, and Keller 2019). With regard to the studies on this “new

CONTACT Hou Lixian ✉ houlixian@scau.edu.cn 📍 #483 Wushan Road, Wushan,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2020 Hou Lixian. All Rights Reserved.

moment or a turning point in feminism” (Baer 2016, 18), many feminist scholars have affirmed its empowering effects: creating new modes of mobilization (Thrift 2014); forming new feminist protest culture beyond the pursuit of legal and legislative changes (Salime 2014); and bringing in diverse feminist constituencies and intersectional conversations (Thelandersson 2014). Yet the prevalence of hashtag activism has stirred up increasing controversies among scholars and feminists about whether the young generation was (un)able to fully incorporate the significant feminist principle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into their digital practic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guiding principle, the second wave feminists extende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to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power in public like electoral power or that from president to nations, but also patriarchal power from men over women in private (Oakley 1981, 310), and revealed how the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women’s personal life was repudiated via the gendered dichotomy of public and private (Rogan and Budgeon 2018, 3). They further reattached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ciousness raising group—a pervasive form of feminist activism at that time—functioning as not only a collective sharing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xposure of the systemat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nature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Loney-Howes 2019, 24), but also an impetus to shape the strategy of public speak-outs and to form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nd collectivity for political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Rogan and Budgeon 2018, 4). Revisiting this vital feminist tenet based on young women’s digital feminism within the neoliberal and postfeminist context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some scholars illustrate that such digital practices carry on and even exp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Rogan and Budgeon 2018), form the revival of feminism since the 1970s (Jouët 2018) and even redo feminism (Baer 2016). However, others criticize it as undoing feminism, for “the political (the collective public domain of politics) is reduced to the personal” (Mohanty 2013, 971). They elucidate how young women’s online engagement has been co-opted into the neoliberal system by emphasizing the discourse of self-empowerment, choice and individualization, and by embracing the “symbolic equality” without truly achieving socio-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rity (Carstensen 2014; Budgeon 2015; Mohanty 2013).

The global wave of #MeToo hashtag movement has aggravated such controversial arguments on digital feminism. For instance, in Bianca Fileborn and Rachel Loney-Howes’s recently published anthology *#MeToo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2019), quite a few scholars herald the politics of speak-outs in #MeToo movement, celebrate its efficacy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and affirm its influence of social change, whilst many others reveal its pitfalls and underlie the problems and even risks of politicizing the personal in the politics of speak-outs, which have long been debated within the anti-rape and sexual harassment movement since the second-wave feminist activism. Rachel Loney-Howes (2019, 30) and Karen Boyle (2019, 33) disclose the oppressing aspect of women’s public speak-outs in #MeToo as only those personal stories from predominantly white, middleclass, and heterosexual women that could be heard and believed. Loney-Howes further questions the political goal of #MeToo activism targeted at institutional changes as “reaffirming the power of those institutions to appropriate, redirect and contain activism and to systematically conceal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that enable sexual violence” (2019, 33). In a nutshell, scholars, mainly from Euro-America, by articulating young women’s online practices with the contentious arguments revolving a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and political, have depicted a complex picture of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oscillating between redoing and undoing feminism.

While the Chinese young women’s online practices have also foregrounded personal issues, such as DV, women’s body and sexual harassment, how should we engage the above controversies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and explore its meanings for femin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By far, scholarship on Chinese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resonates with the redoing and/or empowering of the perspective aforementioned and focuses on exploring feminist agency, new strategies and alliances (Hou 2015; Tan J. 2017; Han and Lee 2018; Wang and Driscoll 2018), whereas growing literature has noticed its adversary effect of aggravating misogyny in the real and virtual world (Tan J. 2017; Han 2018). Yet still few scholars have examined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and "political,"⁶ not to mention its potential deficiencies. To investigate such underexplored issues, these essential questions come to the fore: What were the meanings of "personal" and "political"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How were such meanings changed/unchanged via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What new meanings of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have they construed? Did "political" remain "symbolic" in their online engagement? Is such a politics the best way to facilitate the feminist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drawbacks within this wave of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in China?

To establish some provisional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this paper offers a situat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young women's digital practices from 2012 to 2018. It elaborates on how their activism in social media have converged in and diverg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from the 1950s to 2000s. Based on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two landmark digital campaigns—Naked Chest against DV in 2012 and #MituInChina in 2018, it further sheds light on how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has successfully and creatively reconfigured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t the interplay of the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 in these three main aspects: (1) establishing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via different ways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2) further politicizing women's private matters, mainly bodily autonomy and sexual harassment, as in provoking public discussions and pressuring the government for policy changes; (3) forming new and open coalitions for public activis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among young women, young feminists, veteran feminist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⁷ LGBT activists and male intellectuals. The article also exposes the drawbacks of such digital activism: (1) the precarity of digital platforms; (2) the problems of politicizing personal issues in social media, including: erasing diversified discussion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forming oppression for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oversimplifying the solutions to sexual harassment. This paper aims to delineate a complex picture of Chinese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with the nuanced meanings from its feminist predecessors in China and its current counterparts in the world. It thus contributes to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ng generation's digital feminism in Asia.

Methods

This paper adopted two main methods—online ethnography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I started the online observation on the two feminist self-media in Weibo—Feminist Voice,⁸ and Women Awakening (New Media Women Network),⁹ both of which were the main supporting platforms for disseminating news and provoking discussions on young women's online activism. My observation started on those two platforms in November 2012, when Naked Chest against DV began, and lasted until May 2015, when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feminist activism were quieted down by the authorities. In the second phase, I interviewed fourteen feminists and lesbian activists involved in the feminist online activities from November 2014 to April 2017. The interviews lasted two to three hours and were conducted in an in-depth, semi-structured way and mostly in a face-to-face manner, few via Skype or WeChat. Interviewees' names are coded according to their request. In the third phase, I started my online observation on #MituInChina from January to July 2018. I concentrated my observation on: (1) the two

important individual Weibo accounts—Luo Xixi, the victim-activist of sexual harassment igniting heated discussions on #MeToo in Weibo,¹⁰ and Qiqi, the key young feminist who created the hashtag #MituInChina and facilitated the activism in Weibo;¹¹ (2) Feminist Voice's and Women Awakening's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which archived reports, stirred up discussions on #MituInChina and called for offline campaign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My data in this article is thus mainly collected from my interviews, and from the reports and articles on young women's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 feminist discussions, and netizens' comments from the above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 media accounts.

"Personal" and "political"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This section demarcat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from the 1950s to the present into four phases and investigates the meaning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rsonal" and "political" via elaborating on these three aspects: main actors for activism; modes of activism; discussions on gender, sexuality and body. It aims to illuminate how young women's digital feminism converged in and diverged from the three earlier phases so as to offer a more situated analysis about the new meanings that these young women have construed in their politicizing the personal via digital practic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ile this section unrolls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emarcation of the four feminist phases in China since the 1950s, such demarcation is neither complete, comprehensive nor their boundaries are clear-cut.

"Personal is all political": state feminism and the state agent

From the 1950s to 1970s, the state and the Party-led All China Women Federation (ACWF)¹² were the sole actors to administer the women's movement, or "women's work." This state feminism, as scholars have labelled it (Wang Z. 2005), imposed structural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law and in public sphere via a top-down manner (Wang Z. 2005, 2010; Shen 2016). "Political," within this feminism, connoted the state power's enforcing gender equality in legislation and the feminist discourse "men and women are the same" in the public space on the one hand, and subduing women's struggle in private life under class conflict and appropriating their personal life for the state project on the other hand. As Li Xiaojiang comments:

In the past half-century in China, the personal has without exception been political. In everything from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o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hand of politics was felt everywhere. It penetrated and eventually completely appropriated personal space. (Li X.-j. 1997, 86)

Within such appropriation, women's gendered self and body were universally shaped based on "the male standard," and meanwhile, transformed into the political subject to rebuild the state, best demonstrated in the controversial example of the state propaganda of "iron maiden" (Honig 2000, 2003; Yang and Yan 2017). In this period, not only women's female awareness,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was erased (Barlow 1991, 1994; Yang 1999; Hsiung et al. 2001; Li and John 2005), women's sexualities (or to be exact, sexuality of all people) also became a taboo in the public sphere (Huang 2020).

"Personal is personal": market feminism and female intellectua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up in the 1980s in tandem with the state power's retrieving from the individual's life, Li Xiaojiang and other femal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criticize the

“double burden” women were enforced to shoulder in the earlier phase: masculiniz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of women’s body and self within the socialist state project in the public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touched patriarchal oppression in the personal life (Li X.-j. 2012, 9). To resolve this conflict for women in the new era, Li emphasized the gender difference and re-attached importance to women’s personal life and freedom of choosing private roles, such as housewife, so as to regain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us their natural and feminine self (Li X.-j. 1997, 83).

In this regard, those female intellectuals constructed an alternative feminist discourse featured with depolitic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essentialism (Yang 1999, 54; Wang L.-z. 2015, 105, 114; Shen 2016, 17). As such features conformed to the market’s discourse of commodifying women in the 1990s and with Li’s demonstrating affinity to consumption for reconstructing femininity, this new feminist discourse was also labelled as market feminism (Barlow 2004, 253). Although women’s femininity, individuality and autonomy were explored within market feminism, women’s sexualities remained neglected (Huang 2020). To further depart from “the political” —mainly the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involving the state power, Li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established academic groups and associations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the state and ACWF and pushed forward a cultural movement focusing on women’s studies. Hence, such an alternative mode of activism was also marked as elitist and idealistic orientation (Wang L.-z. 2015, 113).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though a narrative of disjuncture in the 1980s is made in this paper, in practices, there were indeed still a lot of overlapping activities between female cadres from ACWF and female intellectuals, and meanwhile, feminists concerns were multifaceted besides “personal,” for instance, on female reproduction, migrant and laid-off female workers (Tan S. 1995).

Repoliticizing women’s personal issues: 95 FUNCW and women’s NGOs

The 1990s witnessed the market’s further re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 and commodification of women concomitant with state’s redistrib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and that of labour based on gender. While feminist discussions on women’s issues gradually faded out of the public and legislative agenda, the Fourth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Women (FUNCW) in Beijing in 1995 was rendered as a milestone for reinvigo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On the one hand, various foreign feminist discussions on women’s personal issu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uch as those on domestic violence (DV), sexual harassment and sexual orientation (Tan S. 1995; Wei T.-t. 2015).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mainstreaming with the aim to integrate women’s issues into all government activities was also brought in and avowed by the state (Zhu 2015). Thus, it was possible to repoliticize women’s private issues once again for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wo new modes of feminist activism emerged. Firstly, a multitude of female cadres, intellectuals and professionals established women’s NGOs on a variety of women’s issues, such as anti-DV and migrant female workers (Hsiung et al. 2001; Milwertz 2002). Many of such NGOs not only organized workshops and established communities for women to share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us to raise their consciousness, but also conducted survey on women’s everyday life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push forward legislative changes. As for this line of feminist activism, most of the women’s NGOs often cooperated with ACWF and thus formed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of state-ACWF-women’s NGOs for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feminist programmes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the better chances of policy lobbying (Wang Z. 2010; Li S.-p. 2015). Secondly, intellectuals and feminist scholars continue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within academia and its disciplinarization in universities. Since the early 2000, increasing courses on women, gender studies and

even queer studies were opened to college students (Du 2009),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consciousness raising of college girls born in the 1980s and 1990s.¹³ Increasing activiti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even cooperation between teachers, students and LGBT groups in university also emerg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00s. However, most of those activities were only organized within the campus in an underground way.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women's personal issues featured low-profile and non-confrontation in this period (Chang, Ren, and Yang 2016), for feminist activism was mainly oriented towards the training of gender awareness for the internal government officials, policy lobbying on gender equality, specific issues for women in local communities, and courses on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in universities. Research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s on gender studies proliferated and yet feminist discussions had become gradually invisibl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public discussions since the 2000s (Li S.-p. 2015), diverting from the earlier two phases when women's issues were hot topics within the official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s.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young women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e inception of digital feminism in China c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early 2000s, when ACWF and some mainstream women's NGOs began to establish websites to promote their services and to advocate gender equality. More importantly, increasing grassroots women's associations and the marginalized LGBT groups built their virtual communities and created spaces for exchanges on the tabooed issu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via blogs, websites and QQ accounts.¹⁴ A multitude of grassroots actors and their bottom-up mode of activism emerged and discussions on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ty blossomed on the Internet.

More explicit changes could be identified in the advent of "We Media"—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ty of Weibo and WeChat after 2010. It marked the real beginning of digital feminism in China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women carried out the politics of hypervisibility and confrontation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in stirring up debates mainly on women's personal conflicts due to sexism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public. Since 2012, a group of young women¹⁵ conducted street performative activism¹⁶ to fight against gender inequality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s. They also used Weibo and WeChat to promote their feminist cause and to create a buzz to extend netizens' discussions on their offline activism. They further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feminist self-media in Weibo and WeChat to encourage netizens to share their daily suffering from sexism. For example, in Weibo in 2013, some young women started a hashtag campaign #IExperiencedGenderDiscrimination, 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feminist Weibo account under the same name to transform it into a long-lasting platform for women's public speak-outs.¹⁷ It wa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at more and more young women created various hashtags and carried out performative activism in Weibo so as to provoke wide-ranged discussions on gender inequality in social media and to draw great attention from mainstream media,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One landmark digital activism that marked this new chapter is Naked Chest against DV in 2012, and the other milestone is the recent #MituInChina in 2018.

These young women and their digital practices were situ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much greater pressure from the market's commodifying women, the state's retrieving his power from women's personal issues, and women's status in the public sphere declining significantly. In addition, they were also surround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holding "feminist phobia,"¹⁸ and consequently, most feminists and feminist arguments were stigmatized and silenced in the public. Young women, mainly urban and with college education, were "discontented with sexism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the limited options of public status" (DT, personal interview, 17 February 2016). By contrast to the earlier phases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ey lack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monetary resources. Yet they were opened to the diversified and even sensational feminist activism and profound discussion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ia internet. Furthermore, they were benefited from the feminist legacy from the 1990s. Not only did they have their gender awakening from the course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in university that have been commenced since the 1990s, but more importantly, since 2012, they had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Gender Equality Camps organized by the veteran feminists who had started their own activism since the 1990s.¹⁹ With the training in the camps and under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performative activism for feminist protests, they began to shape their mode of street and online activism via the repertoire of performance art and flash mob to draw the mainstream media's attention and to arouse the public's discussion with their ultimate goal to pressure the government to change policies and law for gender equality. In this regard,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se young women have continued certain aspects of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from what the feminists had carried out in the 1990s.

However, they also construed nuanced meanings of "personal" and "political" in their digital practices by contrast to their Chinese forerunners and the young counterpar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 shall firstly recap the two landmark online campaigns, and then illuminate such nuanced meanings via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ose two cases.

Rewriting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in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Naked Chest against DV

On 7 November 2012, feminists launched a petition calling for 10,000 signatures to facilitate the legislation of anti-DV in China and signatures were collected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On 13 November, while the heat of the petition was dying out, one famous young feminist activist—Xiao Meili posted the picture of her nudity with the slogan "Shameful to commit DV; Pride in having flat chest. Collecting Signature for Petition on Legislation of Anti-DV" on her naked chest in order to re-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petition. Such a picture went viral in Weibo and quite a few young feminist activists, lesbian activists and even gay activists followed Xiao and posted similar pictures in Weibo to support the campaign. It thus formed the controversial online activism named Naked Chest against DV drawing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provoking heated discussions among the public. While Xiao mixed up the messages with nudity, flat chest and anti-DV, other young feminists and LGBT activists also incorporated their own personal stories into the theme of anti-DV on their naked chests.²⁰

#Mituinchina

Different from #MeToo movement's focus on workpla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ituInChina firstly and mainly exposed 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On 1 January 2018, Luo Xixi—a former postgraduate in Beihang University—publicized an open letter in Weibo accusing her ex-supervisor Chen Xiaowu's sexually harassing her 10 years ago and revealing her true identity for verification.²¹ Luo's case reverberated the #MeToo discussion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viewing reached 4,500,000 times in Weibo before it was all cleared out by the Sina Weibo authorities.²² #MeToo discussions were banned in Weibo on 17 January and #MituInChina was then created by

the young feminist Qiqi to circumvent censorship and to resume the hashtag activism in Weibo. Ever since then, the cases of victims' exposing prominent professors' sexual harassment had been springing up under #MituInChina. In July 2018, such hashtag activism reached its peak, with victims' voicing out their stories in extensive fields, including exposures of the head of China's Buddhist association, leading figure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a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ormation of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via different ways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one before 2015 and that after 2015. During these two phases, different ways of raising consciousness and establishing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were identified. From 2012 to 2014, as illuminated in the last section, young women were enabled to raise their consciousnes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diversified ways thanks to the feminist legacy since the 1990s. Yet, they pushed for a more radical feminist identification and formed the intersectional subjectivity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civil rights in their digital practices. In both their online and offline campaigns, these young women took a rights-based and more confrontational position and emphasized the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ir identification as *nvquanzhuyizhe* (fighter for women's rights) and thus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eminists who have favourably labeled themselves as *nvxingzhuyizhe* (activist for culture movement on women and femininity). The young feminists further transformed the platforms of social media into their battlefield to bring out the marginalized and sensitive women's issues and connected them with the mainstream feminist discussions. For example, in Naked Chest against DV, the fifteen participants were members of NGO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openly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feminists, and/or LGBT activists. The initiator Xiao Meili, a famous young feminist who had don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feminist performative activism in the street, planned to challenge the internet censorship against women's nudity and virtually she decided to connect her naked chest with the feminist campaign of legislation of anti-DV (personal interview, 13 February 2017). Her formation of gendered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in this case is multifaceted and completed in a creative manner. By speaking out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of being laughed at as flat chest and comparing the male's gaze on women's breasts to DV (personal interview, 13 February 2017), she not only advocated the political request of legislation of anti-DV, but also pushed forward the radical body politics.

With these young feminists' digital campaigns, increasing open discussions on women's personal issues were unfolded in Weibo and WeChat, such as women's bodily autonomy and sexual harassment. It also motivated more and more young women to utilize hashtags in Weibo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some even established the public WeChat and/or Weibo accounts to initiate their individual activism. For instance, the public WeChat account ATSH (Anti-Sexual harassment) was established for women, especially female reporter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of sexual harassment.²³ Its founder Huang Xueqin was a young journalist who suffered from sexual harassment in her career, and greatly inspired by feminists' online and offline campaigns.

Although young feminists'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 was stymied after 2015, such burgeoning feminist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served as hubs of raising consciousness for a great number of netizens via sharing their personal issues, and further helping them establish feminist and political subjectivity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s. Luo Xixi—an initiator of #MituInChina was one emblematic example. She had her gendered awaken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Too movement on the internet and later established a WeChat group called "Hardcandy" to unite other victims of sexual

harassment from the same perpetrator Chen Xiaowu. This WeChat group served as a consciousness raising group and Luo also formed her feminist subjectivity through such collective sharing and eventually took the lead of reporting Chen to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evidence she gathered. When her personal activism failed as there was no specific regulation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she reached Huang Xueqin via ATSH and was able to form a feminist alliance with Huang and another feminist lawyer Wan Sensen. Luo's political subjectivity was formed when she and the other two feminists utilized Weibo to speak out and further politicized her personal story for public attention with the goal to pressure the authorities to enact regulation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Politicization of "private matters" for public discuss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imed for transforming women's private issues, which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taboos and/or neglected, into heated public debates, such as DV, women's body, and sexual harassment, and pushing the government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Naked Chest against DV, the public discussion on women's bodily autonomy was foregrounded unprecedentedly via young women's visualizing their naked chests for activism.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controversial strategy of nudity from Femen²⁴ and the trainings from the Gender Equality Camps, the young feminists took a radical politics of nudity to protest and to reclaim women's bodily autonom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kinds of power subjugating women's body: objectification under male's gaze within the market capitalism, privatization as property under patriarchy, and internet censorship against women's nudity as obscenity.²⁵ This digital campaign successfully stirred up netizens' heated discussions on women's bodies, anti-DV and feminist activism. It also spurred other online activism on transforming women's nudity into political protest in the wake in China (Hou 2015). Increasing netizens demonstrated their feminist awakening in commenting positively on this online activism and facilitating the profound debates on corporeal feminism and its political efficacy. For example, one netizen commented,

The patriarchal logic behind DV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s flat chest is the same: men's control over women's body. The former is explicit, while the latter is implicit and it makes women internalize such violence, objec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body into thei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Women's body is a battlefield. (Posted by "Bianpingcuxianguan")²⁶

The hashtag activism #MituInChina has brought the "invisible" issue of sexual harassment to the spotlight of the Chinese public. In the early 1990s, the western feminist discussions 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concept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some scholars have commenced studies on this topic ever since then (Tang 1995; Huang and Pan 2013). However, feminists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to push this issue forward into the official and public discussions because debates on sexuality have long been marginalized even within the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Huang 2020), and on the other hand, "feminist phobia" aforementioned has been embedded in mainstream media since the 2000s.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was paid even less attention by both scholars and the public until a famous case of sexual harassment was exposed in Xiamen University in 2014.²⁷ It was only after this case di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mentioned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ir official decrees under the name of "Red Seven Rules" to improve "college teachers' morality," stipulating that "teacher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nappropriate relationship with students are prohibited."²⁸ While in this case, the of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sexual harassment as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personal morality was firstly publicized, it was explicitly reinforced in a sensational case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exposed in #MituInChina.²⁹ In the public announcement of its punishment against the famous professor and perpetrator in this case, the university did not use "sexual harassment" at all but labelled the perpetrator's offense as personal misconduct—"an inappropriate behaviour that violates against teachers' morality and against the lifestyle and principle of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³⁰

To rebut against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and fight for the visibility of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public, since 2014, young women organized performative activism in ten universities entitled "Little Redhood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³¹ and meanwhile conducted online campaigns to mobilize netizens to support their cause. Veteran feminists from NGOs, intellectuals and women's cadres cooperated to collect signature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and to draft two letters of advocacy with detailed definition and regulations, both of which were sent to Xiamen University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ng 2014). It was until then the concept of sexual harassment as power imbalance and gender inequality based on MacKinnon's paradigm (Anderson 2006, 286) was introduced systematically and reinforced through feminist campaigns among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public discussions (Li J. 2014; Li and Fang 2016).

With such efforts, feminist discourses on sexual harassment have formed powerful counter-arguments against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as a private matter. Since 2014, MacKinnon's paradigm on sexual harassment has also become a pervasive conceptualization for the public's knowledge of this issue. In #MituInChina, such a paradigm has been taken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weapon by young women, feminists, intellectuals, scholars and even mainstream media to condemn perpetrator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meanwhile to urge for policy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³²

New and open coalitions

Chinese young women's politicizing their personal issues in digital platforms mobilized a wide range of participants and formed the politics of open coalition for collective activism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that have rarely occurred in the earlier phases of Chinese feminism. Young women's open coalition via digital practices challenged the critique of "clicktivism" as political inefficacy (Christensen 2011), and construed significant meanings more than just "connectivity." One essential aspect of this open coalition is the increasing open cooperation between feminists and LGBT activists. As homosexuality were and still are taboos in the official discourse in China, dialogues between women's cadres, feminists, scholars,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LGBT activists were started in a secretive way during the 95 UNFCW and have continued under the table and in the form of personal ties ever since then (Wei T.-t. 2015). Yet, in Naked Chest against DV, feminists and LGBT activists formed their first open cooperation in pushing forward the legislation of anti-DV. They have not only coordina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online campaigns, but even worked together offline to expand the definition of DV to protect people in both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marital and no-marital relationship via the ACWF cadres and legal professionals' proposal of the draft of Anti-DV Law submitted to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is open coalition marked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feminist and LGBT activism in China, as the new Anti-DV Law, which took effects on 1 March 2016, has adopted the extensive meaning of DV advocated by the feminists and LGBT activists.³³ Through this open coalition, meanings of gender have been broadened from binary opposition to diversification even in legal discourse.

The other essential aspect of young women's open coalition is the recruitment of male intellectual sympathizers and participants. It changed the dynamics between male intellectuals and feminists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hile male intellectuals, even the liberal ones, denied women's rights and even showed hostility to feminism (Li S.-p. 2013). Their interplay was best demonstrated in #MituInChina. While it was initiated by the victim-activists, facilitated by young feminists, feminist self-media and NGOs, it was openly supported and even propelled by male intellectuals. For instance, Xu Kaibing, a male professor in Wuhan University, initiated an online petition and collected signatures from university teachers all over China to advance the legislation of anti-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While #MituInChina was constantly censored and the contents under the hashtag were purged in Weibo, Chang Jiang—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 Weibo celebrity with over 100,000 fans,³⁴ and Chen Di—a public critic and a Weibo influencer with 800,000 fans,³⁵ helped collect and disseminate the stories of women's sexual harassment via their own Weibo accounts and thus helped maintain the activism's momentum. Mostly importantly, such an open coalition created a rupture among the "close interpersonal ties of the brotherhood among male professors with sexism in higher education" (Li J. 2014, 52) and thus formed a new counterforce against the male-dominated intellectual circle who repudiated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sexual harassment.

Drawbacks of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From Naked Chest against DV to #MituInChina, Chinese young women creatively transformed Weibo and WeChat into their battlefield for activism and rewrote the feminist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This section does not downplay the empowering effects of such digital activism and its potential for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Rather, it unravels its underexplored problem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complicatedness of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and thus to seek for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of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Precarity of digital platforms

Hester Baer (2016, 24) adopts the concept of precarity to capture the double func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s sites of empowering young women and disciplining them in complicity with the market and the neoliberal system. The precarity of digital platforms works in a more complicated way in China. For the generation of young women who have very few resources, they considered social media as "low threshold" for activism and felt empowered as "we can fight for our rights and change the society" (WT, personal interview, 12 February 2017). However, digital platforms in China are infiltrated with surveillance not only from the market, but also from the internet censoring system. On the one hand, these young women adopted digital hypervisibility as their feminist strategy to arouse the mainstream media's attention so as to circulate their feminist advocacy and to pressure the authorities for policy changes, as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mainstream media had much greater and more enduring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China" (DT, personal interview, 17 February 2016). Yet both mainstream and digital media are driven by the market and only those kinds of activism on sensational women's issues, such as nudity and personal stories with sexual details, could arouse their interest. Thus, young feminists had to play along with such a game to a certain extent so as to successfully carry out their strategy. But rather than uncritically complying with the market logic in social media, these young women were self-reflective about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of their online practices. As in their self-critiques against Naked Chest against DV,

Internet has been imbricated with pictures of nudity and thus many of the netizens have become numb to our activism. What could attract their great attention are those pictures of real persons' shameful and sexually private stories. Only those pictures could widely circulate along with netizens' vicious consumption of women [...]. Pictures of nudity could be reported in the genre of gossip, but not in the positive coverage of Anti-DV in serious news.³⁶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ict and yet ambivalent internet censoring system, especially after 2015, shut down and erased the majority of young feminists' online campaigns. Although these young women showed incredible resilience to carry on their activism in social media, such digital activism incited fierce backlashes, explicitly shown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sogynist self-media and the aggravating stigmatization of young women and their activism as "extremism" and/or "complicity with the foreign forces" not only from such self-media, but also from some liberal scholars, such as Liu Yu's deprecation against #MituInChina.³⁷

Problematizing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Chinese feminists successfully politicized the personal issues of DV for legislative changes, while the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further articulated it with women's bodily autonomy and helped facilitate the public and even legislative discussions on anti-DV to be opened to more marginalized people and relationship. Such kind of digital campaigns with the aim for diversified and open discussions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could also be identified in young women's performative activism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2012, entitled "I Can Be Slutty, You Cannot Harass Me" to fight against the Shanghai metro authorities' slut sham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wear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³⁸ These young women posted their pictures of offline activism in Weibo with the purpose to stir up a heated debate on women's bodily autonomy, sexual freedom and sexual harassment among netizens. It attracted the great attention from both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even official media, such as lady.163.com and CCTV,³⁹ for the full coverage of this feminist activism. In addition, the mainstream media introduced diversified voices from feminists and scholars on sex and even queer studies from both Mainland and Taiwan⁴⁰ to enrich public discussions. In #MituInChina, while it exerted greater and longer influences in China, very few diversified discussions on gender, sexuality and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be navigated in such hashtag activism. Young women's digital feminism seemed to take on the trend from diversity to universality, inclusivity to exclusivity.

Firstly, diversified feminist and queer arguments on sexual harassment were erased and open dialogues between feminists and queer activists were drastically reduced. While flourishing feminist and queer arguments on sexual harassment emerged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s on "I Can Be Slutty, You Cannot Harass Me," more profound dialogues on conceptualizing sexual harassment within the academia emerged after the well-known case in Xiamen University. The discussions aroused by this case was oriented towards a split, summarized by Song Shaoping (2014, 63) as a collision on the paradigms of defining sexual harassment "between the feminist cam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xu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ro-sex cam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xual autonomy." However, open dialogues were still embraced at that time. In the feminist camp's letter of advocacy to the headmaster of Xiamen University, although feminists adopted MacKinnon's paradigm to define sexual harassment and highlighted the power imbalance,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unwelcome behaviours related to sex, they did add a short supplementary note in the end to include other scenarios beyond heterosexuality and gender binary opposition.⁴¹ The pro-sex camp, such as Pan Suiming, Huang Yingying, etc., brought in critical arguments against the feminist camp's pervas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ir public WeChat account “Sex Research-ing”⁴² and other public platforms, revealing the feminist camp’s lack of a truly clear defini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differentiated from other sexual criminal behaviours, the risk of victimizing women and thus eliminating women’s sexual autonomy and hazards of fully integrating the western conceptualiz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 without taking the local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to consideration (Huang and Pan 2013; Huang 2018; Huang and Zhang 2018). Although contend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 two camps actually had reached the consensus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deal with sexual harassment, but differing in its definition and the prioritizing strategies.

Yet in young women’s public speak-outs in #MituInChina, all the visible and circulating stories were highly universalized into the same scenario: men, the superiors and the powerful, versus, women, the subordinates and the powerless. The feminist camp’s arguments based on MacKinnon’s paradigm became the dominant discourse for understanding and reporting sexual harassment in both social media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his period, other viewpoints to further complic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harassment were almost invisible. While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LGBT people and female workers did not fit into the narrative of speak-outs framed as middle-class, college education and heterosexuals, they could not cause any ripple in mainstream media and even in social media.⁴³ The abundant and localized debates aforementioned on sexual harassment before #MituInChina were erased. An intersectional perspective of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is overwhelming #MituInChina was also eliminated accordingly.

It thus leads to my second concern resonating with Loney-Howes’s (2019) and Boyle’s (2019) critiques against the overgeneralization of personal stories for political cause and thus the formation of oppressing power for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such as the sexual minorities and working-class women. It also disciplined the victim-survivors and formed a second-time victimization if they wanted their stories to be seen and believed. Xiao Meili has noticed this problem in her activism during #MituInChina,

#MeToo replies extensively on internet popularity and circulation. Only very few stories (mostly those very dramatic and the high status of perpetrator, etc.) could go viral in social media. Some victims asked me for help in Weibo to retweet their stories. But it was useless [...]. It is demanding for the victims (to speak out in social media). They need to master the skills to operate social media. They are requested not only to write their stories out, but also to illustrate details clearly and logically and to come out with an attractive title and yet to the point. They are requested to move away from their own emotionality and mentality and cater to the audience’s taste.⁴⁴

My third concern goes to the question: Are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authorities’ punishment the cure-alls for sexual harassment? Did we oversimplify the solutions to sexual harassment? At what cost if we mainly depend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to fight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While it is no doubt that there is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regulations and procedures to deal with sexual harassment in educational fields in China, Loney-Howes (2019) has alerted us about the concealing potential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MituInChina, while legislative change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punitive mechanism in university were foregrounded, the target was narrowed down to punish the perpetrators, leaving untouched the still formidable structure of gender and sexual discrimination conspiring to the pervasiveness of sexual harassment. Thus, Huang Yingying (2018)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schooling, family and society to cultivate cultures of mutual respect and equality for different gender identities and sexualities, and hence to eliminate the roots of sexual harassment instead. In addition, in the public speaks-out in #MituInChina, the discourse that sex is dangerous seem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Sex War in America* in the

1980s, Carol Vance (1984, 21–23) problematized the enduring slogan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on women’s sexual issues as setting up norms or prescription, and sexualities for women were further pushed into the narrative of danger. While I am not arguing that all those arguments could appl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with the impact of censorship system and social media’s depoliticizing women’s stories and erasing diversified feminist and queer discussions, the dominant narratives of young women’s personal stories in #MituInChina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did mainly reply on the negative languages of victimization, punishment, regulation and prescription towards sex and sexual harassment. While this kind of language is undoubtedly one way to spur the anti-sexual harassment activism in China, it should also be altered that it is easy to fall into the polar that sex is negative and dangerous and thus consolidate the increasingly conservative sexual morality that could ultimately jeopardize women’s agency and self-empowerment.

Conclusion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ir feminist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While influenced by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discourses, these young women also formed great dynamics to their feminist fore-runners with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and within the changed Chinese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he paper also dismantles the seemingly coherence of young women’s digital activism and reveals that there was stagnancy and a shift of feminist discussions from inclusivity to exclusivity, from diversity to universality after 2015, since when feminist discussions and activism have been greatly censored. Yet miraculously, #MituInChina broke out in social media in China and it is still going on. Young women and feminists have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bravery, creativity, resilience and flexibility in carrying on activism and rewriting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to reinvigorate the public discussions on women’s issues and even to facilitate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said, within this new wave of digital feminism, I also elucidate my concerns about young women’s politicizing their personal stories in digital platforms, especially in #MituInChina. Part of such problems and risks could be understood as a strategy and a compromise under severe censorship and intensive surveillance on feminist activism. While I do affirm and celebrate young women’s self-empowerment in online activism and the vitality of their digital feminism, more critical debates should be embraced to open up our imagination for novel coalitions and innovative activism once again for the sake of a better feminist future.

Notes

1. These young women are aged around 18–35 years old and most of them have received college education and above.
2. Sina Weib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witter, was launched in 2009. Today, it is the most popular micro-blog platform in China. Hereinafter it is called Weibo in short.
3. “Mitu” was the homophony of “MeToo” in Chinese Pinyin. “Mi” means “rice” and “tu” means “bunny” in English. More details will be illu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4. In the feminist discussion in China, “grassroots” connotes the meanings of “non-official” and “few resources” as a contrast to the official women’s organizations, namely All China Women’s Federation (ACWF)—the party-led mass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movement, and its affiliations. They are endowed with sufficient funding from the state and/or the overseas foundations acknowledged by the state. Since 2012, quite a few young women formed their own grassroots feminist groups and conducted activism in the street.

5. In 2015, some young feminists planned to send out stickers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on 8 March. But on 7 March, the authorities detained five leading young feminists for that plan. Since then, young women's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 has been under intensive surveillance and thus have dropped drastically.
6. Some scholarly studies have elaborated on young women's street activism featured with individuality and its positive effect of changing policies. See Wei W. (2014). But very few focus on their digital campaig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feminist circle did pay some attention to and even showed self-reflection toward such an issue. For instance, Feminist Voice pointed out that social media had much less impact on changing the institutions than mainstream media and thus the political efficacy of young feminists' online activism remained questionable. For Feminist Voice's article, see <https://www.douban.com/note/254578319/?start=0&post=ok%E3%80%81>.
7. Veteran feminist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refer to the feminists generally aged over 40 and most of them have their own women's NGOs and/or work within the system, such as within universities and ACWF and its affiliations.
8. Feminist Voice was established by the famous veteran feminist Lü Pin in 2009.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gital platforms for feminist discussions and collective activism. After being shut down in March 2018, its blog continued updating until June 2018. For the blog, see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40974192_0_1.html.
9. Women Awakening is the first online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 for the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der issues and the mass media established by the famous veteran feminist Li Sipan in Guangzhou in 2004. Li established the public Weibo account of Women Awakening in 2011. See <https://weibo.com/1527379661/about>.
10. For Luo's Weibo, see https://weibo.com/p/1005051541900794?is_all=1. I use her real name here because Luo publicized her true identity and many reporters have also used her real name. Those reasons apply to the other real name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nalysis.
11. For Qiqi's Weibo, see <https://weibo.com/u/6032584361>.
12. ACWF was suspend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resumed its work in the 1980s.
13. One of the famous courses on gender and queer studies had been organized as a public selective course titled Culture and Gender Diversity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Guangzhou by Professor Song Sufeng since 2009. It became an important hub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for the leading young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ts who organized street performative activism in Guangzhou and many radical online campaigns.
14. QQ is a famous online chatroom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2000 in China.
15. These young women were also referred to as "Young Feminist Action School." See Wei W. (2014).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ot all young women engaged in performative activism accepted this label.
16. Performance activism here refers to the mini play the young women performed and/or the creative action they took to demonstrate their feminist advocacy in the public spaces, such as park, subway, etc. They used this hyper-visible and "loud" way to attract the mainstream media's attention for wider circulation of their feminist ideas and advocacy. One of these young women's famous performative activism was "Occupying Men's Toilet." In February 2012, some young women occupied men's toilets in a park in Guangzhou with banners advocating potty equality. See Wei W. (2014).
17. For the Weibo account, see <https://weibo.com/u/3229198652>.
18. The term "feminist phobia" is coined by Lü Pin to summarize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demonization of feminists in China since the 2000s based on her involvement into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s a feminist for over ten years. See <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2012renwu02.html>.
19. Gender Equality Camps were organized by Gender Equality Advocacy and Action Network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12 with veteran feminists and queer activists giving lectures on gender and queer studies and offering training on conducting activism. These camps had spread to different places in China ever since then. The camps and the Network spurre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wave of young women's performative activism in China.
20. See the link in Note 6.
21. For Luo Xixi's letter in her Weibo, see https://www.weibo.com/u/1541900794?is_all=1&stat_date=201801#_0.

22. For Feminist Media's report, see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c528700102xa6f.html.
23. The WeChat account of ATSH was cancelled. Yet the relevant reports on ATSH could be found on the internet. See <https://mp.weixin.qq.com/s/2gMr-RJzYbXvi8mDil3w5w>.
24. Femen was established by Oksana Shachko and three other college female students in 2008 in Ukraine and it has become famous for their radical activism of naked chest as in their slogan "Our Weapon are bare breasts!" and their guiding principle of sextremism. See <https://femen.org/>.
25. See the article in the link in Note 6.
26. See the comment in the link in Note 6.
27. In June, 2014, a female Ph.D student from Xiamen University publicized her story in Weibo—she was sexually harassed by her supervisor Wu Chunming—a famous professor in academia. Another victim later also publicized her story in Weibo about being raped by the same perpetrator. This case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s in social media and mainstream media and thus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8. See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01/201410/175811.html.
29. Zhang Peng—a famous anthropologist and professor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was exposed by his students as a perpetrator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past decade. See <http://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18071089770.html>
30. Please refer to the link in Note 29.
31. In September 2014, after the case of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in Xiamen University, some young women were dressed up as Little Redhood from the fairy-tale and protested against academic sexual harassment in te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hey posted the pictures of their activism in Weibo and motivated netizens to do the same in their own local universities to fight against sexual harassment.
32. For mainstream media's report, see https://k.sina.com.cn/article_2480472101_93d9002502000mvpr.html?from=cul. For official media's report, see <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1/03/045192.html?sh=top>.
33. In the Law of Anti-DV, DV is defined as violence not only against people within martial and familial relationship, but also against those who live together. Thus, it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feminists and LGBT activists as an open and inclusive definition to protect persons who are and were in cohabitating relationship, including LGBT people and tho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
34. For Chang's Weibo, see https://weibo.com/mutong?is_all=1.
35. For Chen's Weibo, see https://weibo.com/p/1005055655289725/home?profile_ftype=1&is_all=1#_0.
36. See the link in Note 6.
37. Liu Yu is a famous liberal scholar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China. During #MituInChina, she compared the activists' strategy of speak-outs in #MituInChina to that us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us raised her concern about the false rape claim. Her criticism was considered right-winged and liberalism based and provoked heated discussions on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right and left intellectuals in Zhihu—a famous digital platform popular with intellectuals in China, see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7236158/answer/454585449>. Yet within the domestic public discussions, feminists mainly rebutted against Liu's argu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triarchy, class and the Chinese context, rather than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right and left.
38. See Wei W. (2014).
39. For CCTV's full coverage, see <http://tv.people.com.cn/n/2012/0625/c222296-18375620.html>. For the special feature from lady.163.com, see <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nvrenxingdong02.html>.
40. Veteran feminists like Li Sipan from Mainland, scholars on sex and queer studies like Li Yinhe from Mainland and Ho Chuen-juei from Taiwan. See the link of lady.163.com in Note 39.
41. For the two advocacy letters, see <https://www.docin.com/p-983904478.html>; <http://www.doc88.com/p-0981484392875.html>.
42. "Sex Research-ing" could be found with "xingshehuixue" in the WeChat platform.
43. See <http://tootopia.me/article/11596>.
44. For Xiao Meili's public speech on #MituInChina, see <https://mp.weixin.qq.com/s/VpGdQdyZ6GsTq4rsswBxhg>.

Acknowledgements

I wish to extend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who offered very insightful comments and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revision. I am also grateful for all the activists I interviewed in this project for their great patience and exciting ideas.

Special terms

Mitu	米兔
nvquanzhuyizhe	女权主义者
nvxingzhuyizhe	女性主义者

Notes on contributor

Hou Lixian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 obtained her PhD in cultural studies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December 2016. Her research explores how young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ts have engaged different digital platforms and developed new feminist and queer politics to fight against sexism and homophobia in China.

References

- Anderson, Elizabeth. 2006. "Recent Thinking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A Review Essa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4 (2): 284–312.
- Baer, Hester. 2016. "Redoing Feminism: Digital Activism, Body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6 (1): 17–34.
- Barlow, Tani. 1991.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Genders* 10: 132–160.
- Barlow, Tani. 1994.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 (Un) Making National Wome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339–3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low, Tani. 2004.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oyle, Karen. 2019. *#MeToo, Weinstein and Feminism*. Switzerland: Palgrave Pivot.
- Budgeon, Shelley. 2015. "Individualized Femininity and Feminist Politics of Choice."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2 (3): 303–318.
- Carstensen, Tanja. 2014. "Gender and Social Media: Sexism, Empowerment, or the Irrelevance of Gender?"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and Gender*, edited by Cynthia Carter, Linda Steiner, and Lisa McLaughlin, 483–502. New York: Routledge.
- Chang, Jiang, Hailong Ren, and Qiguang Yang. 2016. "A Virtual Gender Asylum? The Social Media Profile Picture, Young Chinese Women's Self-Empower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Digital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3): 325–340.
- Christensen, Christian. 2011. "Twitter Revolutions? Addressing Social Media and Dissent."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 (3): 155–157.
- Du, Qinfang 杜琴芳. 2009. "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 理论与方法." [Reviews on China's History of Women'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ories and Methods].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5: 12–21.
- Fileborn, Bianca, and Rachel Loney-Howes, eds. 2019. *#MeToo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Han, Xiao. 2018. "Searching for an Online Space for Feminism? The Chinese Feminist Group Gender Watch Women's Voice and Its Changing Approaches to Online Misogyny."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 (4): 734–749.
- Han, Lin, and Chengpang Lee. 2018. "Nudity, Feminists, and Chinese Online Censorship: A Case Study on the Anti-domestic Violence Campaign on Sina Weibo." *China Information*: 1–20.

- Honig, Emily. 2000. "Iron Girls Revisited: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edited by Barbara Entwisle, and Gail Henderson, 97–1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nig, Emily. 2003. "Socialist Sex: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Modern China* 29 (2): 143–175. <https://www.jstor.org/stable/3181306>.
- Hou, Lixian. 2015. "On Fire in Weibo: Feminist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The 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50 (17): 79–85. <https://www.epw.in/journal/2015/17/>
- Hsiung, Ping-chun, Maria Jaschok, Cecilia Milwertz, and Red Chen. 2001. *Chinese Women's Organizing: Cadres, Feminists, Muslims, Queers*. Oxford: Berg Publishers.
- Huang, Yingying 黄盈盈. 2018. "'#MeToo'高校反性骚扰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建议." [Sociological Analysis on #Metoo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trategic Advice]. 政策简报(人大国发院) [Policy Briefing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min University)] 11: 1–12. http://nads.ruc.edu.cn/upfile/file/20180711095815_515168_74470.pdf
- Huang, Yingying 黄盈盈. 2020. "性之变: 改革开放40年的梳理与思考." [Changes of Sex: Teasing Out and Speculating on Its 40 Years'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Up]. 性研究ing [Sex Research-ing], 11 April. <https://mp.weixin.qq.com/s/yGG1sv5F7WVLDdEESeXQ0Ng>
- Huang, Yingying 黄盈盈, and Suiming Pan 潘绥铭. 2013. "21世纪中国性骚扰: 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of China: Contradictory Between Discourse Intervention and Subjectivity Formation]. 探索与争鸣 [Exploration and Argument] 7: 58–62.
- Huang, Yingying 黄盈盈, and Zhiyun Zhang 张育智. 2018. "女权主义的性论述." [Sexual Debates among Feminisms]. 社会学评论 [Sociological Review of China] 6: 71–83.
- Jouët, Josiane. 2018. "Digital Feminism: Questioning the Renewal of Activis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8 (1): 133–157.
- Li, Xiaojiang 李小江. 1997. "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 兼论谁制造话语并赋予它内涵." [What Language Should We Use to Think about Women: A Study on Who Created It and Construed Its Meanings]. 浙江学刊 [Zhejiang Journal] 4: 81–91.
- Li, Xiaojiang 李小江. 2012. 家国女人 [State, Family and Women]. 南京 [Nanjing]: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
- Li, Sipan 李思磐. 2013. "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Why Liberalists in Mainland China Don't Support Feminism]. 思想 [Reflexion] 23: 175–196.
- Li, Jun 李军. 2014. "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 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基于国内案例的分析." [Structure of Common Offenses of Sexual Harassment Academe: Academic Authority,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and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Chinese Examples].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6: 44–55.
- Li, Sipan 李思磐. 2015. "中国版女权主义: 从启蒙到自觉." [The Chinese Version of Feminism: From Enlightenment to Awakening]. 新浪微博 [Sina Weibo], 11 February. https://card.weibo.com/article/h5/#cid=1001603808858006020709&vid=5892008935&extparam=&from=10A1295010&wm=9006_2001&ip=117.136.12.224
- Li, Jiayuan 李佳源, and Suning Fang 方苏宁. 2016. "高校性骚扰: 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以女研究生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Sexual Hara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Status Quo, Causes and Dealing Mechanism—An Empirical Study on Female Postgraduates].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5 (8): 91–97.
- Li, Xiaojiang, and Mary John. 2005. "Women and Feminism in China and India: A Conversation with Li Xiaojiang."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0 (16): 1594–1597. https://www.jstor.org/stable/4416497?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 Loney-Howes, Rachel. 2019.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The Evolution of Anti-rape Activism From Second-Wave Feminism to #MeToo." In *#MeToo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Bianca Fileborn, and Rachel Loney-Howes, 21–35.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Mendes, Kaitlynn, Jessica Ringrose, and Jessalynn Keller. 2019. *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 Girls and Women Fight Back against Rape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wertz, Cecilia. 2002. *Beijing Women Organising for Change: A New Wave of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Copenhagen: NIAS Press.
- Mohanty, Talpade. 2013. "Transnational Feminist Crossings: On Neoliberalism and Radical Critiqu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8 (4): 967–991.

- Oakley, Ann. 1981. *The Subject Women*. Oxford: Fontana.
- Rogan, Frances, and Shelley Budgeon. 2018.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ssessing Feminist Fundamentals in the Digital Age." *Social Sciences* 7 (8): 1–19.
- Salime, Zakia. 2014. "New Feminism as Personal Revolutions: Microrebellious Bodi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40 (1): 14–20.
- Shen, Yifei. 2016. "Feminism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Advocates, Debates, and Strategies." Friedrich Ebert-Stiftung.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bueros/china/12947.pdf>
- Song, Shaopeng 宋少鹏. 2014. "何为性骚扰?: 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2014 年教师节前‘性学派’对‘女权派’的质疑." [What Is Sexual Harassment?: Disputes in Conception and Paradigm—Pro-sex Camp's Challenge Against Feminist Camp on Teachers' Day].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6: 56–65.
- Tan, Shen 谭深. 1995. "妇女研究的新进展." [New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社会学研究* [Sociological Study] 5: 66–74.
- Tan, Jia. 2017. "Digital Masquerading: Feminist Media Activism in China." *Crime, Media, 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3 (2): 171–186.
- Tang, Can 唐灿. 1995. "性骚扰在中国的存在: 169 名女性的个例研究." [Sexual Harassment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169 Women]. *妇女研究论丛*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 31–34.
- Thelander, Fredrika. 2014. "A Less Toxic Feminism: Can the Internet Solve the Age Old Question of How to Put Intersectional Theory into Practic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 (3): 527–530.
- Thrift, Samantha. 2014. "#YesAllWomen as Feminist Meme Even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4 (6): 1090–1092.
- Vance, Carol. 1984.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ang, Zheng. 2005. "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 *Feminist Studies* 31 (3): 519–551.
- Wang, Zheng. 2010. "Feminist Networks."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edited by You-tien Hsing, and Ching Kwan Lee, 115–130.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Lingzhen 王玲珍. 2015. "重申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 以李小江为例." [A Critical Review of 1980s Chinese Feminist Practice and Sexual/Gender Difference Discourse: The Case of Li Xiaojiang].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103–118.
- Wang, Bin, and Catherine Driscoll. 2018. "Chinese Feminists on Social Media: Articulating Different Voices, Building Strategic Alliances." *Continuum* 33 (1): 1–15.
- Wei, Wei 魏伟. 2014. "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Street, Behaviour, Art: Advocating Gender Righ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a Social Movement Repertoire]. *社会*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 94–117.
- Wei, Tingting. 2015. "A Look at the Beijing Conference through Lesbian Eyes."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1 (3): 316–325.
- Yang, Mayfair, ed. 1999.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Yang, Wenqi, and Fei Yan. 2017. "The Annihilation of Femininity in Mao's China: Gender Inequality of Sent-D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Information* 31 (1): 63–83.
- Zhu, Chunkui 朱春奎. 2015.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tate's Governmentality]. *中国行政管理*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7–11.

2020.6

第19卷
第6期
总第216期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广州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中国·广州

2020年11月

ISSN 1671-394X

126



微信公众号

阿多诺与批判理论研究专题 (主持人:赵勇)

介入 特奥多尔·W.阿多诺 著, 赵勇 译, 赵天舒 校 6

从冥府到故乡“还要多久”:批判理论的旅行和苦难

——纪念特奥多尔·W.阿多诺逝世50周年 塞缪尔·韦伯 著, 高竞闻 译, 姜皓月 校 19

启蒙:西方世界的宏大叙事

——以康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布朗肖为例

阿兰·米隆 著, 赵天舒 译 28

“精神分析只不过是夸大其辞”

——弗洛伊德与法兰克福学派

马丁·杰伊 著, 耿弘明 译 34

阿多诺与音乐唯名论

马丁·杰伊 著, 丛子钰 译 47

性别视角下的当代视觉文化研究 (主持人:张颖)

无声的叛逆:近年国产青春片中的少女形象与性别叙事 周舒燕 58

花木兰与 Fa Mulan

——性别、国族与中国故事再阐释

白玫佳黛 67

(双月刊)

学报主页: <http://xb-sk.gzhu.edu.cn/CN/volumn/home.shtml>

电子邮箱: journal@gzhu.edu.cn

联系电话: 020-39366068

爆米花女超人:重思当代美国主流电影中的赛博女英雄

张颖 74

青年网络短视频女权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研究

侯丽娴 82

廉政论坛 (主持人:卢汉桥)

地方政策俘获的发生机理与防治对策

——基于典型案例的一项研究

袁柏顺 93

集体腐败的破解路径:基于博弈论的模型分析

宋伟 10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廉洁秩序的建立与维系

——基于全球治理观的分析

刘琳 曹美晴 105

公共管理研究

心理学视域下的公共决策偏误探析

马桑 112

差异与互适:行为公共管理的演进脉络

邓崧 118

总目次

126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9 No. 6, 2020

CONTENTS

Commitment	<i>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Trans: ZHAO Yong, Proofreader: ZHAO Tianshu</i>	(6)
From Hades to Heimat: Quo usque tandem? The Travels and Travails of Critical Theory: In Memory of Theodor W. Adorno, On the 50 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Samuel Weber, Trans: GAO Jingwen, Proofreader: JIANG Haoyue</i>	(19)
The Concept of <i>Aufklärung</i> as the Meta-narrative of the West: Kant, Adorno-Horkheimer, Blanchot	<i>Alain Milon, Trans: ZHAO Tianshu</i>	(28)
"In Psychoanalysis Nothing is True but the Exaggerations": Freud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i>Martin Jay, Trans: GENG Hongming</i>	(34)
Adorno and Musical Nominalism	<i>Martin Jay, Trans: CONG Ziyu</i>	(47)
Silent Rebellion: Girls' Images and Gender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Films	<i>ZHOU Shuyan</i>	(58)
Hua Mulan and Fa Mulan: Gender and Nation-State in Retelling Chinese Stories	<i>BAI Meijiadai</i>	(67)
Popcorn Superwomen: Rethinking Cyborg Heroin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Mainstream Films	<i>ZHANG Ying</i>	(74)
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the Youth's Online Feminist Video Activism and its Precarity	<i>HOU Lixian</i>	(82)
Occurrence Mechanism and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s of Local Policy Capture: A Study Based on Typical Cases	<i>YUAN Baishun</i>	(93)
A Cracking Path of Collective Corruption: Model Analysis Based on Game Theory	<i>SONG Wei</i>	(100)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corruptible Order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alysis Based on the View of Global Governance	<i>LIU Lin, CAO Meiqing</i>	(105)
An Analysis of Public Decision-Making Err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i>MA Sang</i>	(112)
Difference and Adaptation: The Evolution of Behavioral Public Management	<i>DENG Song</i>	(118)

英文目录、英文摘要审校: 霍明杰

青年网络短视频女权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研究

侯丽娴

(华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从欧美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以及大众女权主义的批判性论述出发,女权自媒体“膨胀工作室”在B站上的女权短视频以“可见度”为核心策略,通过对视频定位、创作以及选题的“泛娱乐化”操作,将女权政治与青年网络亚文化融合。视频的女权话语呈现出与欧美数码女权主义一样的“不稳定性”,既具有后女权主义以及大众女权主义回避权力结构批判、突出个人主义特色、拥抱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特点,又具有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所强调的“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抗争性。因此,很有必要结合中国语境与本土女权主义,特别是数码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女青年视频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的特点并挖掘其积极意义。

关键词:青年女性;女权短视频;数码女权主义;不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0)06-0082-09

一、引言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原来以精英阶层为主导、集中在学院内讨论的女权主义话语^①出现了数码化、年轻化、大众化的转向。自2012年开始,越来越多年轻女性^②

在微博及微信平台上创建与女性议题相关的自媒体账号,在微博上建立各种与性别歧视相关的标签,引发大众对性别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一波新型的数码女权行动(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③。最近两年,这种数码女权行动与视觉文化、流行文化、青年网络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互动。膨胀工作室(以下称膨胀)^④——一个由广州本土女青年建立的自媒

作者简介:侯丽娴,华南农业大学讲师,从事文化、性别以及网络行动主义研究。

① 关于与女性相关的研究以及西方“feminism”理论与研究的翻译等,国内学者既有用“女权主义”,也有用“女性主义”来指称。国内年轻女性以及微博、微信上使用“女权主义”一词比较多。在后文中作为重要理论的“postfeminism”“popular feminism”,国内学界将其广泛翻译为“后女性主义”“大众女性主义”,但为了统一术语,本文将其译为“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国内学术界对digital feminism、digital feminist activism的讨论还比较缺乏,本文将其翻译为“数码女权主义”。

② 文章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女青年,指出生在1980年至2000年,年龄在18—35岁左右的女性。社交平台上开展女权行动最活跃的群体是1990年后出生的女青年。

③ 当下的数码女权主义泛指在网络平台上开展的一切与性别相关的行动以及讨论。大约在1990年至2010年间,学界关注比较多的是网络空间、技术与女性身体的关系,以及网站、博客空间上的女权主义行动等,也被称为赛博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可参见金春枝:《赛博女性主义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而最近十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学界关注的是青年女性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和新的数码网络平台,例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开展各式各样的女权行动,这些研究中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数码女权主义”这一术语。

④ 参见膨胀工作室在B站上的主页 https://space.bilibili.com/82694622?spm_id_from=333.788.b_765f7570696e666f.2。

体账号——专注创作女权短视频并在以青年网络亚文化著称的视频平台 bilibili(以下称 B 站)上建立主页,成为上面唯一专门上传原创女权视频并同时明确用女权主义者身份作为标签的 Up 主^①。

国内女权行动与影像结合最常见的形式是女权主义电影生产,膨胀是迄今为止首个将日常短视频制作与女权行动相结合并在视频平台上稳定更新的女权自媒体。这种女权实践既是对数码女权行动的创新,也是对女权主义视觉文化的再现,以及对精英化、学院式女权主义话语的改造。然而,这种女权实践有其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数码平台上的短视频受流量与资本的驱动,催生的是进一步商品化女性身体的网红经济与文化^[1],例如美妆类短视频与网红的崛起。另一方面,以“鬼畜”“弹幕”为主要特征的 B 站视频平台突显的是消解严肃批判的青年网络亚文化^[2]。那么,膨胀在其短视频生产中,是如何改造对父权制度及资本主义都进行了严肃批判的女权主义话语,使其在 B 站平台上成功吸引青年群体关注的呢?被改造后的女权话语有什么特点?这样的数码行动如何促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并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

国内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当下大多数学者从“赋权”的理论视角,探讨女性个体以及女权组织如何利用新媒体空间进行发声、传播及抗争。^②但青年女权视频行动,作为一种新型的数码行动,仍未受到学者的广泛讨论。而单一的“赋权”角度,难以厘清其中女权主义话语与资本、流量、消费、青年网络亚文化的复杂互动。欧美学界在此议题上将数码女权主义置身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高度垄断社会各层面的背景中,并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大众女权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特点,以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波以青年

为主体,以各种网络平台、社交媒体为抗争空间的新女权主义行动与市场、消费以及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建立的女权抗争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③,更好地勾勒数码女权主义行动对女权主义政治既有重构又有解构的“不稳定性(precarity)”特征。^[3]

本文以膨胀在 B 站上的女权短视频作为研究案例,借助欧美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围绕上述问题揭示出:(1)膨胀视频行动以“可见度”为核心策略,通过对视频定位、创作以及选题的“泛娱乐化”操作,将女权政治与青年网络亚文化融合,使女权短视频成功吸引青年群体的关注;(2)视频的女权话语呈现出欧美数码女权主义具有的“不稳定性”,既具有后女权主义以及大众女权主义的特点——回避权力结构问题的浅层批判,突出个人主义特色、个人选择,拥抱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时又具有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所强调的“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抗争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中国语境与本土女权主义,特别是数码女权主义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这种女青年视频行动的策略与“不稳定性”的特点,并挖掘其积极意义。

二、研究方法

膨胀是由广州本土青年于 2017 年 1 月建立的专注于创作女权短视频的自媒体。这些青年主要是 1990 年后出生的女性,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朴西是膨胀的主要负责人、主演以及大部分视频的主持人,其他主要成员还包括编剧、部分视频联合主持人太佛、后期制作欧媚、主要演员 Samsam 以及一些不固定的嘉宾。^④膨胀在微博、微信、腾讯视频以及 B 站上都注册了同名账号,但常规更新及比较活跃

① Up 主来源于英文 uploader,是 B 站上用于指称上传发布视频的人。参见 bilibili 网站主页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17151/>。

② 相关讨论很多,具体可参见蔡文之:《网络时代女性问题的新解读——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 年第 5 期;赵伟:《播放、快进与倒带——女性媒介传播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及其中国趋势》,《前沿》2014 年第 7 期;武晓伟等:《新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组织化与赋权研究——以“女友组”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王理等:《女性主义组织的网络行动研究——以“新媒体女性”新浪微博为例》,《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6 年第 6 期;华昊:《社交媒体空间女性声音的政治意涵》,《现代传播》2017 年第 12 期。

③ 相关讨论可参见 Mohanty, Talpade, "Transnational Feminist Crossings: On Neoliberalism and Radical Critique." *Signs*, Vol. 38, No. 4, 2013, pp. 967 - 991; Salime, Zakia, "New Feminism as Personal Revolutions: Microrebellious Bodies." *Signs*, Vol. 40, No. 1, 2014, pp. 14 - 20; Thrift, Samantha, "#YesAllWomen as Feminist Meme even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16, No. 6, 2014, pp. 1090 - 1092; Jouët, Josiane, "Digital feminism: Questioning the renewal of activis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Gender Studies*, Vol. 8, No. 1, 2018, pp. 133 - 157; Rogan, Frances, and Shelley Budgeon,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ssessing Feminist Fundamentals in the Digital Age." *Social Sciences*, Vol. 7, No. 8, 2018, pp. 1 - 19.

④ 这些名字都是膨胀对外公开使用的昵称。

的是微博以及B站上的账号。^①膨胀的微博号活跃程度最高,但专注于热门性别议题讨论,女权视频分散。B站上则比较系统,每周进行一到多次的视频更新,是膨胀女权视频最集中、视频分类管理最清晰的平台。

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及深度访谈两种研究方法。笔者对膨胀在B站上从2017年1月到2020年4月发布的八个栏目的96个视频、弹幕区、评论区都进行了参与式观察。2020年6月30日,笔者对朴西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围绕膨胀的运行情况、目的、策略、播放量最大的10条视频的创作理念,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女权身份的认同等问题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结合上述观察及访谈,本文选取膨胀B站中播放量最大的前十条视频中属于三个不同栏目的四条视频,从视频定位、创作、议题选择以及女权话语再现四个方面对视频进行分析,探讨膨胀视频行动中的策略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特点。

三、数码女权主义、后女权主义与大众女权主义

最近十年,欧美学界对数码女权主义的讨论集中在社交平台上繁荣发展的女权行动,特别是2012年后,社交平台上呈现井喷式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标签女权主义行动(Hashtag feminist activism)^[4],如影响全球的“#MeToo运动”。学者对这一波以青年女性为主体,在数码平台上进行的追求个性化、“可见度”以及传播效应的新型女权行动有了更为多元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一波新型女权行动是对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以来激进女权政治的推进,特别是对“个人就是政治的”——即强调个人受压迫的经历是公共性、结构性的,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这一重要的女权原则的重构。^[5]但更多学者则揭示数码女权行动所塑造的女权话语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构关系,即将制造个人选择、自由和提升作为实现女性解放的神话,来取代“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集体抗争。^②这种对数码女权主义的批判,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对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的反思。

(一)后女权主义与女性个人选择、自由、提升的神话

欧美后女权主义的讨论源于20世纪90年代女性形象

媒体再现的转变。在主流媒体中,青年女性以及成功自信的女性形象不断增多,“女孩力量(girl power)”以及女性的成功不断被鼓吹。但这绝非只是一种进步,因为其背后是大众文化对女性的进一步监控与改造。Rosalind Gill用“后女权主义感受性(postfeminist sensibility)”来概括这套被主流媒体改造的后女权主义话语的特点,并揭示其从观念、形象、意义、情感、主体构建各个方面对女性进行的新规范:

女性气质是一种身体属性;从客体化转变为主体化;强调自我监控与规训;突出个人主义、自由、赋权;“化妆打扮”成为主流;女权主义观点与反女权主义观点纠缠在一起;性别差异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复兴;突出文化的性别差异;以消费文化为中心,将差异商品化。^[6]

强调个人奋斗、自由,通过消费提升自我这套话语,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后女权主义通过这套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来打造女性解放的新出路,实际上是掩盖性别不平等在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上的结构性问题与权力失衡问题。^[7]因此,Angela McRobbie直接指出,后女权主义制造的是一种性别平等的幻象,使“女权主义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过时的意识形态而被否定,女性所遭遇的权力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问题,消解了女性集体反抗父权制度以及资本主义政治行动的可能。^[8]

数码女权主义是在后女权主义的持续发展中兴起的。数码平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发声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消费、规训女性身体以及女性自我规训身体的主要空间。^[9]在数码平台上发起的女权行动是去中心化的,突出个人主义特色。例如最近几年最主要的标签女权行动,就是由青年女性个人发起的,其他女性通过加入标签行动公开叙述自己的个人经历,或者转发标签,从中突显自我选择、自由,并以此作为一种女性自我解放的象征。女权主义学者并不否认这种标签数码女权行动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却继承对后女权主义批判的传统,质疑这种行动将个人公开叙事等同于个人自由、解放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一致的,得到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平等,^[5]身体仍然受到社交平台、市场的诸多监控,而现实生活中各

①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膨胀所有平台在2020年5月暂停更新,至今仍未有恢复。

② 相关讨论可参见Mohanty, Talpade, "Transnational Feminist Crossings: On Neoliberalism and Radical Critique." *Signs*, Vol. 38, No. 4, 2013, pp. 967-991; Salime, Zakia, "New Feminism as Personal Revolutions: Microrebellious Bodies." *Signs*, Vol. 40, No. 1, 2014, pp. 14-20; Thrift, Samantha, "#YesAllWomen as Feminist Meme event."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16, No. 6, 2014, pp. 1090-1092。

种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仍然无法被撼动。

(二) 大众女权主义与“可见度”策略的问题

数码女权主义与大众女权主义有更密切的交集。大众女权主义也是以后女权主义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反映的是近十年来女权主义话语与媒体、大众文化更进一步的连结。女权主义议题在各种媒介上——电视、电影、社交媒体等——变得“流行”起来,越来越多名人、明星、成功人士在大众媒体上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并大谈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女权主义因此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并迅速被市场吸纳,成为各种公共文化的热点与时尚商品的卖点。^[10] Sarah Banet-Weiser 进一步概括了大众女权主义的特点:一是不挑战结构这一深层次问题^[7];二是通过拥抱新自由主义式的“企业家精神,有顺应性、进取心”而实现自我赋权^[7];三是将“可见度”作为重要策略^[10]。

这三个特点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不挑战结构这一深层次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衔接“自我赋权”,将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选择、自由、提升置换为女权抗争政治的新出路。而将“可见度”作为策略则是充满争议的。一方面,女权主义的讨论以及媒体再现是史无前例的,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可见度”中,Rosalind Gill 延续了对后女权主义的批判,指出只有“中产、白人、同性恋、强调身体的、对新自由主义友好的”女性形象、叙事方式才能被“看见”,^[10]而更具挑战性、交叉性的讨论以及分析仍然不被大众所接受。Sarah Banet-Weiser 则提示了其中的危险性:“可见度是受利益、竞争以及消费者影响的,可见度高并不意味着受众是认同女权主义的。”^[10]

数码女权主义与大众女权主义交织在一起,并呈现出大众女权主义的三个特点。Sarah Banet-Weiser 特别指出,社交平台上的女权主义行动更强调“可见度”,因此看起来更繁荣,但实际上深深地受制于资本逻辑下的平台算法机制,无法对权力结构不平等问题进行有力批判。^[10] Alison Hearn 则进一步提醒,数码平台上的女权主义行动特别容易形成“内容空泛化”,成为一种纯粹的传播。^[11]

(三) 数码女权主义与“不稳定性”

基于对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的批判视角,女权学者对数码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契合的方面格外警惕。越来越多学者对数码女权主义赋权的一面以及消解女权抗争政治的另一面都有了更复杂的论述。Hester Baer 用“不稳定性”来概括这种复杂性。“不稳定性”这个概念是用来形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就业、生活以及情感等的不安全状态(insecurity)。^[3] Rosalind Gill 和

Andy Pratt 指出了这种“不稳定性”的双面性,揭示了其积极的一面,亦即这种不安全状态一方面是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压迫,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促进新主体性、新社会关系形成以及新型政治产生的潜在可能性。^[12] Hester Baer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用“不稳定性”来概括数码女权主义的内涵以及特点,落脚点在其对女权抗争政治的重构、复兴这一积极层面上。

如前面所分析,社交媒体上的数码女权行动与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一样,迎合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逻辑,用个人特色、选择、自由以及女性身体商品化等话语来消解女权行动的政治性诉求。同时,这种数码女权主义行动以“可见度”策略为核心,更容易为市场所进一步收编,取向只能停留在以“中产、白人、同性恋”为中心的内容,这些问题在“#MeToo 运动”中就尤为明显。^[13]

但是,这种“不稳定性”促使弱势女性发动标签行动,并通过标签行动中的个人分享达到意识提升的作用,从而促进广泛的连结,甚至是催生全球联动。这不仅仅带来了本地女权抗争的复兴,同时也增加了跨国女权行动团结的可能性。^[9] 这同样体现在“#MeToo 运动”中,其从美国发端,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迅速燃烧到各国,致使全球大规模的反性骚扰、反性侵运动持续至今。因此,Hester Baer 认为,数码女权行动在对女权抗争政治的继承、对父权制度的批判、对资本市场的态度上尽管是“不稳定”的,但正是这种“不稳定”让全球年轻女性产生了行动的可能,并催生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2]

以下将以数码女权主义的“不稳定性”理论视角作为切入点,探讨膨胀的女权视频行动的策略、女权主义话语的特点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四、膨胀女权短视频行动分析

(一) 采用以“可见度”为核心的“泛娱乐化”策略

基于女权主义话语对父权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短视频平台受资本、流量的驱使以及青年网络亚文化对严肃批判的解构之间的矛盾,膨胀通过弱化女权主义的严肃讨论,在视频定位、选题、创造形式以及语言使用上,都采取“泛娱乐化”的操作来解决。膨胀将视频定位为“搞笑”“有趣好玩”,突出以“戏谑”“无厘头”“吐槽”为主的青年网络亚文化“泛娱乐化”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在膨胀视频选题、创造形式以及语言特色上。在 B 站的 96 个视频中,其选题绝大部分都避开严肃、具有交叉性的女权政治议题,如性

侵案件、女工议题、多元性别议题等。大部分选题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大众热烈讨论、偏向中产关注的性别文化议题,如女性单身、春节逼婚、直男癌、主流审美与女性刻板印象等,但仍有部分选题涉及家暴、性骚扰以及拜访各地妇女组织、社工组织的田野之旅。视频创作采用搞笑小剧场、talk show、戏仿、采风采访等形式,前两种是最主要形式。题目以诙谐的青年网络语言为主,例如搞笑小剧场“春节逼婚倒计时,朴西教你几招反击术!”以及轻松的 talk show“母胎 solo!单身的 n 个真相”。随着韩国娱乐与国内综艺节目的 reaction 视频^①在 B 站兴起,从 2019 年开始,膨胀的内容生产也转向以与 K-pop、国内热门综艺相关的 reaction 视频为主。

膨胀“泛娱乐化”的策略旨在提高青年群体对女权主义的接纳与关注,但同时呈现出与数码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一致的问题——迎合市场、青年文化,削弱女权主义的结构性、交叉性批判,突出的是对“可见度”的追求。从实际效果来说,这种策略是成功的。膨胀其他栏目的女权视频只有几百到几千的播放量,但 reaction 栏目的视频则大部分上万。在总播放量排名前十的视频中,有六个属于 reaction 栏目^②。排名第一的 reaction 视频甚至高达 9.2 万播放量^③。那么,在这种成功的“可见度”策略下,女权主义话语呈现出什么的特点?是否如 Banet-Weiser 和 Hearn 这两位学者所担忧的那样,即对“可见度”的追求导致“内容空泛化”,最终消解女权主义政治?

(二) 女权主义话语的“不稳定性”

此部分通过分析膨胀播放量在前十名的四个视频内容,揭示视频中女权主义话语再现的特点。这四个视频具体如下。

reaction 栏目的两个视频。第一个是“韩国四代女团 ~ BLACKPINK & TWICE & MAMAMOO & REDVELVET & GFRIEND,千人千色 ~ 女权视角 reaction!”,9.2 万播放量,排第一^④。视频中两位主持人是朴西以及望望——从事性别相关的公益行动以及熟悉韩国女团文化的青年,她们一边看韩国四个女团的歌曲 MV,一边做出回应以及评价。第二

个是“女权者看偶练创 1 青你主题曲对比”,5.9 万播放量,排名第三^⑤。视频中两位主持人朴西以及大佛一边看这三个国内热门偶像选秀类的主题曲 MV,一边做出回应以及评价。两个视频评价的重点落在偶像是否有个人特色、是否完全迎合主流审美和公司/节目组的包装这三个议题上。

第三个视频是“直男讲女权”栏目“去!你!的!绅!士!风!度!”,6.3 万播放量,排名第二^⑥。该栏目的编剧是大佛,唯一的出演者是男性成员 Samsam。膨胀强调“直男”这个身份,也是出于“可见度”的策略,因为“大家就是喜欢男人讲女权”(朴西采访,2020 年 6 月 30 日)。视频以讽刺小剧场的形式再现男女交往中最经常展现绅士风度的六个场景,旨在批判绅士风度中的性别不平等。

第四个视频是“女性保健养生专车”栏目——“阴道炎,我说出来了”,播放量 7 447,排名第八^⑦。视频是 talk show 的形式,由朴西主持,邀请医学生木分作为专家参与讨论。视频主体部分是朴西用戏剧化、搞笑的叙事方式,讲述自己得阴道炎的经历,同时揭露妇科疾病疾病的迷思,以及主流文化对女性身体、性的污名化。

以上四个短视频再现的女权话语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女权主义浅层批判。女权主义浅层批判体现的是大众女权主义的特点,即回避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性别、阶级、性向等交叉性议题,取而代之的是对女性气质、主流性别审美、市场、女性身体商品化的点到即止的批判。这种女权主义浅层批判在膨胀中的具体体现是:(1)性别事件的简单串联。四代女权的 reaction 视频串联起韩国近几年发生的与娱乐文化相关的性别事件。如分析 Red Velvet 女团歌曲《Zibalabim》的 MV,主持人点出“映射今年的李胜利事件,你好像得到了权力,但最后就像过山车一下落下去”。同时也提到,这个女团中的一位成员因为推荐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遭网友威胁的事件,另一位成员手机壳上写“Girls can do everything”遭网友谩骂的事件。但这些具体的

① reaction 视频是从欧美 Youtube 平台上开始的短视频类型,概括地说就是视频形式的评论。reaction 视频集中在对流行文化的评论,涉及影视综游乐,一般是双画面,小画面播放要做出反应的视频,主画面就是 Up 主及嘉宾同步对视频做出的各种口头及肢体反映。

② 六个视频分别排名第一至第六。

③ 所有播放量数据收集截至 2020 年 7 月 12 日。

④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J411m7Vh>。

⑤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b411m7uA>。

⑥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x411p7oV>。

⑦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W411G7BH>。

性别事件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权力结构,背后的厌女情结是怎样运作的,则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2)集中“主流审美”与女性身体的简单勾连。主持人多次提到“男性凝视”这一对父权制度规训女性身体进行批判的女权主义词汇,但并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勾连。例如在对《创造101》的主题曲MV评论时,朴西提出:“我不得不说,《创造101》有更打动我。因为我也女人。里面有很多审查很真实,那个凝视很真实。例如身材上的,什么样的人设比较受欢迎。”但具体是怎样的审查、怎样的凝视塑造怎样的身材以及人设,都没有详细说明,更没有从市场、资本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商品化这一层面进行批判。

二是强调个人特色。关于女团、偶像与主流审美、市场的角力的讨论中,主持人将“坚持个人特色”等同于女权主义实践。在女团以及综艺的两个reaction中,主持人多次用韩国极具个人特色的女团Mamamoo作为具有女权意识的范例。例如评价这个团体是“女性都想成为的女性的形象,一种非花瓶的形象”,“真是帅,女生看到了就很想成为她们,会想说我也要这么拽”。而事实上,这个女团只有两位成员是非传统的女性形象,而剩下的两位则契合了主流对女性“可爱”“性感”的审美标准。主持人对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经常反思的女性身体、性别气质及其与市场、商品化的关系这两个重要问题,都没有进一步论述:Mamamoo中两位非主流审美、“拽”的团员形象,是不是也只是市场无所不包的策略,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这两个成员的“另类”女性身体与气质,在多大程度具有抗争性,而不仅仅只是市场的包装以及资本取代父权制度对女性身体的新一轮规训与商品化?

三是拼凑式、对立式的性别批判。“去!你!的!绅士!风!度!”短视频以搞笑剧场的形式再现了六个具有绅士风度的场景:(1)开门由绅士来做,(2)“我帮你拉椅子”,(3)帮女生搬家,(4)餐厅买单,(5)走路保护女生,(6)送女孩子回家。这六个情景因为要突出戏谑的特点,是用弱逻辑拼凑起来的,前后的关联不明显,批判也不明显。五个视频更多展现的是男生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容易,只有“帮女生搬家”这一个小剧场比较鲜明地讽刺了绅士风度的虚伪。视频最后,Samsam话锋一转,将这种绅士风度和社会中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连结起来:

现在的男生好像帮女士开开门,买一下单,时不时讲一句lady first女士优先。就觉得好像很厉害了。eve-

rybody不要那么天真啦。你看各大机构企业提拔人才的时候,男士优先还是女士优先……分地分房的时候是男士优先还是女士优先……说句不好听的,当年你出生的时候,也可能是男士优先的。大富大贵的肥猪肉男士全吃饱,剩下的猪皮猪毛小恩小惠打包留给你们女士,美其名曰“女士优先”。顺便绕个弯夸自己的绅士风度。这招是不是高?^①

视频落脚点是批判绅士风度掩盖男女生活中的不平等,但这未能在视频的六个场景中展示以及连结,显得突兀又站不住脚。将绅士风度与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拼凑式、男女对立式批判,更容易落入主流媒体对女权主义污名化的窠臼——女权主义是厌男阴谋论、无的放矢。视频最后重新定义绅士风度——“虽然我不是绅士,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绅士,应该拥有平等的眼光,对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都发挥友善互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不会作性别区分的”——更呈现后女权主义话语的特征,存在对女权政治消解的危险,因为它强调的是去性别化,突出的是个人选择,亦即绅士风度实际和性别文化、女权主义无关,是个人素质问题。

四是“个人就是政治”的女权政治实践。“个人就是政治”是第二波妇女解放运动构建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并成为这几十年来女权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运动中,女权学者揭示“公共”与“私人”的二分,实际蕴含性别不平等权力运作的结果,并指出父权制度贯穿“公共”与“私人”空间,对女性进行压迫。因此,她们重新定义“政治”的含义,指出女性在诸如家庭、婚姻等私生活中所受到的压迫,并非只是个人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共性的、结构性的权力不平等,是具有政治变革意义的。^[5]“个人就是政治”这一女权主义政治口号在“阴道炎,我说出来了”这个视频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朴西将自己曾经因为阴道炎而感受到羞耻、不敢去看医生并自己胡乱用药而导致病情加重的惨痛个人经历,用生动有趣的话语叙述出来:

你知道吗?就像伏地魔一样,你得了阴道炎,你就fucked up!因为从来也没有人和我说过,女孩子会得阴道炎……你知道我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那个人……为什么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会那么恐慌呢?我就是害怕大家觉得我性生活不洁净。或者是你个人卫生没做好。可是从来都没人和我说过,你得了阴道炎是OK的。大家一听到你得了阴道炎就是……性

①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x411p7oV>, 视频 02:14-02:45。

病的一种……^①

真的要反思性与妇科疾病污名的来源,不是什么事情都和滥交有关系的,爸妈!^②

朴西在叙述个人经验中,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同时邀请观众一起批判这种“羞耻感”的来源、自身作为女性对阴道炎的无知以及自我的污名化,召唤出在私生活中有同样压迫性经验的女性的觉醒,促进其意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亦即主流文化结构中对女性妇科病、女性身体与性的污名化,从而导致女性对自己身体与性的自主性的丧失,进一步强化规范女性身体为主的保守的性文化。而这种女权实践也是非常成功的,视频中的所有弹幕表示了支持与赞同,而评论区里,很多网友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并赞同这个视频的观点,例如,网友“PGVelvet”就评论道:“真的,我妈自己学医的还给我冠污名,真的受不了。”^③在这个视频中,朴西将个人经历转化为打破女性妇科病污名化的政治诉求。同时也邀请医学专家木分对造成阴道炎的原因以及治疗进行科普,在医学常识上再次解构阴道炎对女性的污名化,促进女性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与性的主动权。

膨胀视频行动的策略以及女权主义话语都体现了数码女权主义“不稳定性”的特点。一方面,它坚持女权主义政治的一些重要原则,即结合个人经验批判不平等的文化结构。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消解女权政治危险的特点——强调个人主义、个人特色、个人选择,突出“可见度”策略,用以取代权力结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以及交叉性议题等更深层次的女权批判,同时体现了一种对市场、资本、平台算法机制妥协以及迎合的态度。但膨胀这种新型的青年女权数码行动的“不稳定性”,需要放置在国内的女权发展脉络与数码女权主义发展的语境中进行重新审视,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妥协”与“迎合”,并挖掘出行动积极意义。

五、重新审视青年女权视频行动的“不稳定性”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带动了国内1990年代以及千禧年之初女权主义行动的发展。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女性知识分子以及体制内工作的妇女干

部自此得到体制认可和各种资源、政策的支持,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妇女NGO,开展了从体制内到各地社区的丰富女权实践及行动。然而这些妇女NGO行动在当下已经逐渐式微。网络、社交媒体成为没有资源、没有体制支持的80后、90后、00后年轻人认识女权主义、进行女权主义讨论的主要阵地并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开展了新型的女权行动——数码女权行动。

最近几年,微博成为性别议题讨论最热烈的社交平台,更是成为数码女权行动的主要阵地,甚至出现了“微博女权”这一称呼。但微博的女权转向并不是性别平等意识的提高,而是因为“女权议题巨大的带流量能力”,是一种商业收编的结果。^[14]事实上,在国内的社交媒体特别是微博上,就出现了欧美后女权主义与大众女权主义光怪陆离甚至是分裂的景象:一方面越来越多青年女性参与、发起女权讨论,女权主义在新媒体上可见度、讨论热度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对女性的歧视、仇视言论,明确反女权主义的自媒体账号也不断增多,厌女文化加剧。微博上,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其中对女权主义的认同是强调个人选择、自由甚至是挑起女性内部的对立,生产对某些女性的污名化论述,例如倡导女性单身的一些博主污名化已婚女性为“婚驴”^④。李思磐分析,这种撕裂是由于微博上新出现许多以女权博主为名,实际是以带流量为目的、致力增强账号盈利能力的内容创业者。^[14]事实上,这也体现了女权政治在社交平台上的一种范式转变:从原来强调女性觉醒、建立姐妹情谊、集体抗争、改革结构性不平等,转变为多元的、分裂式的发展,其中强调个人特色、自由与选择,追求“可见度”,甚至以流量为目的女权政治尤为突出。

在这种女权范式转变的影响下,试图反抗撕裂式的数码女权发展趋势,膨胀作为没有资源的公益性性别自媒体,进行了女权短视频实践并力图与微博女权区分开来,这种实践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

微博的泛女权化,大家每天就在吵架,就在撕逼,出现很多商业化女权博主。她们通过挑起对立,就像营销号一样,但她们就是通过刺激女权议题,打着女权的旗号,但她们就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比较聪明。她们的内容输出是很硬的,她们(微

①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W411G7BH>, 视频 02:14-02:45。

②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W411G7BH>, 视频 04:18-04:24。

③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W411G7BH>, @PGVelvet 在 2018 年 12 月 8 日 19:30 的评论。

④ “婚驴”一词从网红 papi 的“冠夫姓”事件开始,迅速成为微博热门话题,专门用来污名化已婚妇女,批判其在婚姻中对丈夫言听计从、任劳任怨,还乐在其中。这个词的最早来源还没有定论,但这个词自此以后成为微博上一些博主用来批判已婚妇女,确认自己女权身份的重要词汇。参见澎湃网站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392917。

博女权)就是吵架,就像粉圈撕B。而我们本身有经验,可以做热点、文化评论。我们是做以内容为主的,这是我们赢的地方。而且撕逼撕久了,大家都很累,比如她们一直在说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权,她们反婚反育,然后骂人家婚驴等等,但我们是想展示不同的女性形象,就事论事,就某些文本内容展开,而不是吵架。(朴西采访,2020年6月30日)

在这种新尝试中,膨胀视频行动中呈现的女权主义话语的“不稳定性”是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源缺乏而不得不为之,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国内女权范式的转变。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膨胀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自身作为弱势女权自媒体的局限性,不将自己作为倡导型、促进结构性变革的机构而开展行动,而是定位于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去认识女权主义、认同女权政治的平台。因此膨胀认为她们的行动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有用的女权主义话语、一种女权主义入门的机会,强调的是个人的选择与自由,而非改革权力结构等深层次的女权批判:

法律、政策推进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不需要我做,我又不在其位,我怎么利用那些资源。你一个行动、运动背后是很多人身的成本。你应该在你现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而不是要求一个女权主义者做完所有的事,人家为什么看你的视频,一就是她们觉得有共鸣,要不就是她们想得到解答。最关键的内容就是有用。因为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她们看了不同答案,那她们就可以挑哪个答案是自己需要的。你不用告诉她们需要选择这个答案,而是告诉她们有这样一个选择。(朴西采访,2020年6月30日)

膨胀采取以“可见度”为核心的“泛娱乐化”策略,特别是在reaction视频的制作上,体现一种与资本、流量、市场合作的策略,也促使其女权行动的抗争呈现“不稳定性”。但膨胀并不是盲目追求“可见度”,而是基于对国内女权主义话语的边缘位置、青年网络亚文化的特点以及平台算法机制的综合考量而做出的选择。而这种对“可见度”的坚持,也不仅仅在于迎合算法机制播放量的要求,同时也是膨胀对自身过往没有影响力的女权行动的反思以及视频行动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在对女权内容进行娱乐化改造的时候,膨胀也是坚持女权主义的底线,注重将女权主义话语与流行文化、青年网络亚文化有机结合,以求“以点带面”,长期作战:

你想做大家想看的内容,播放量好的内容,你不能打女权的标签。你得用泛娱乐化来包装一下。因为大

家都不喜欢听什么女权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大张旗鼓的这些你的标题,你的整个package应该要迎合你的audience。因为每个短视频网站它的算法机制不同,它的recommendation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应该因平台制宜。你死讲女权,它不会把你的内容推向主页或者推广给其他人,之前已经试过(严肃批判的女权主义视频),讲了那么多,别人都不过来看你,有什么用!

我们的reaction,其实不是reaction,而是通过reaction的形式,死讲我们的东西,而别人的reaction,就真是reaction,例如“哇,好厉害”,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的偶像好在哪里。他们不仅业务能力好,他们呈现出来的internal的东西,它吸引你的究竟是什么?是它呈现的形象?还是它代表的某种新的价值观?(我们)没办法一个视频把全部东西都讲清楚。目的是吸引他们过来subscribe你。他们会挖坟的^①……他们(观众)get不到(女权主义)也没所谓。因为这是读一个学位才知道的,我通过视频想让观众留意到的就是一片,有一个位置他们不舒服,就可以了。不舒服他们就会继续看我们的视频,看其他视频,去查女权。(朴西采访,2020年6月30日)

朴西的“挖坟”论述,既体现膨胀对青年群体网络行为、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把握,也体现其对女权短视频在青年群体中产生影响的乐观期望、对青年群体自我觉醒的信心:

(视频的)目的是要引发他们讨论,他们可能会吵架…有feedback,有反馈,怎么都比没人看,没有人知道好。你要骂我,你做出的行动是很多的。他们持续过来骂,骂着骂着,就会骂出感情。因为他被迫看多了,他就有瘾,你不需要通过一个视频去说服他。因为advocacy都是很漫长的,所以我的心态很平和。我一直做,你一直骂,骂着骂着你就可能顿悟了。因为他们想骂,你骂得有理有据,想说服你,那他们就回去查资料。(朴西采访,2020年6月30日)

而观众的评论印证了膨胀对女权短视频传播效果的预测。评论区中,特别是reaction栏目中,尽管大部分观众是作为粉丝被偶像吸引来的,但仍然能激发一部分粉丝有趣的女权讨论,例如在“女权者看偶练创1青你主题曲对比”reaction这个视频的评论区,粉丝间就出现具有思辨性的女权主义对话:

① “挖坟”是网络用语,指对比较老旧的文章或帖子进行回复,导致旧贴重新被顶上帖子列表的前列。朴西这里的意思是指观众被膨胀的某一视频吸引,就会去挖他们主页的其他视频来看。

我也是赞同女权观点的。但是我也觉得创1的这种女孩子粉粉嫩嫩的设定挺可爱的。麻麻木(mamamoo)是很好,但是女权不代表一定要选择那种风格吧。我选择可爱的也不代表我就不女权了。我选择的权利是平等的,并且我能接受并尊重不同的选择,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吧。^①

粉色制服可以说是 stereotype 的产物可以理解,毕竟在营销女性形象。但歌词里的你越喜爱我越可爱真的是让人生理不适了,本质把女性放在了一个很低的附属位置。^②

在女权议题更突出的其他视频栏目的讨论区,观众的女权主义讨论则更热烈甚至激烈。例如在“去!你!的!绅!士!风!度!”视频评论区置顶部分,账号为“D_a_do_es”的网友就发起了“女士优先”的“女性专用车厢”的讨论,引起许多正反方网友从女权主义以及反女权主义角度进行了长达6页的激烈讨论。也正是这样的女权主义讨论、反馈,提示了B站上青年群体女权主义觉醒的可能,同时也再次体现了膨胀“不稳定”的数码女权主义行动的积极意义。

以青年为主体的数码女权主义的蓬勃发展是一种全球趋势。欧美学界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语境出发,在其对后女权主义、大众女权主义的发展脉络梳理以及批判中,揭示数码女权主义的“不稳定性”特征。本文通过分析膨胀女权短视频行动的策略以及女权主义话语的特点,发现国内这种新型的数码女权行动具有同样的特征。但膨胀视频行动的“不稳定性”,其对女权政治消解的部分以及起积极作用的部分,是有其本土情景以及在地意义的。在国内女权特别是微博女权的发展脉络下,重新审视膨胀女权行动的这些“不稳定”部分,其基于对“可见度”的追求,对市场、资本的妥协而做出的对女权政治的改造,有本土经济、政治、文化语境转变的原因。正是在这些艰难的语境中,膨胀不仅坚持了有别于“吵架式”的微博女权行动的尝试,并确实有效地促进了青年群体对女权议题的讨论,为青年群体的女权主义入门提供了机会。这种“不稳定性”中的积极部分,更需要挖掘以及肯定,因为这将带来改变的希望及可能性。而这种希望及可能性,不仅对于国内的女权主义发展具有意义,对于全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宁欣. 解构的反解构:“网红”后现代文化的悖论——

以 papi 酱为例[J]. 当代电视,2017(7):78-79.

[2] 王蕾,许慧文. 网络亚文化传播符码的风格与转型——以哔哩哔哩网站为例[J]. 当代传播,2017(4):69-72.

[3] BAER H. Redoing feminism: Digital activism, Body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 [J].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16,16(1): 17-34.

[4] RODINO-COLOCINO M. #YesAllWomen: intersectional mobilization against sexual assault is radical (again) [J].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14,14(6): 1113-1115.

[5] ROGAN F, BUDGEON S.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assessing feminist fundamentals in the digital age [J]. Social Sciences, 2018,7(132): 1-19.

[6] GILL R. Gender and the media [M]. Cambridge: Polity, 2007: 255.

[7] BANET-WEISER S.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feminism [J]. Feminist Media Histories, 2018(4): 152-156.

[8] MCROBBIE A.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M]. London: Sage, 2009: 8.

[9] CARSTENSEN T. Gender and social media: sexism, empowerment, or the irrelevance of gender? [M]//CARTER C, STEINER L, MCCLAUGHLIN L.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and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483-502.

[10] BANET-WEISER S, GILL R, ROTTENBERG C. Postfeminism, Popular feminism and Neoliberal feminism? Sarah Banet-Weiser, Rosalind Gill and Catherine Rottenberg in conversation [J]. Feminist Theory, 2020,21(1): 3-24.

[11] HEARN A. Verified: self-presentation, identity management, and selfhood in the Age of Big Data [J].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017,15(2): 62-77.

[12] GILL R, PRATT A. 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 [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08,25(7-8): 1-30.

[13] BOYLE K. #MeToo, weinstein and feminism [M]. Switzerland: Palgrave Pivot, 2019: 22.

[14] 李思磐. 微博女权的前世今生:从“政治正确”到“商业正确”[EB/OL]. (2020-06-16) [2020-08-2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54160.

[责任编辑 罗欢]

①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b411m7uA>, @杉田五五在2019年2月12日22:40的评论。

② 见 bilibili 主站网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b411m7uA>, @小鸟游 suna在2019年2月13日6:24的评论。

A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the Youth's Online Feminist Video Activism and its Precarity

HOU Lix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critiques against digital feminism,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feminism in Euro-America, this paper takes Boom Studio—a feminist self-media in Bilibili as a case study and reveals the strategy and features of Boom's feminist practices of producing feminist short videos: taking “high visibility” as a core strategy and integrates feminist politics into the youth online sub-culture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pan-entertainment”; the feminist discourse reconstructed in the videos featured with “precarity” in Euro-America's digital feminism: emphasizing superficial feminist critiques without touch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highlighting individualism, personal choice from 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feminism on the one hand, which are indeed in complicity with the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on the other hand, embodying the important feminist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This paper virtually situates the strategy and the “precarious” features of such feminist video activism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of digital feminist development and unravels its positive effects.

Key words: young women; Feminist short video; digital Feminism; precarity

(上接第 73 页)

Hua Mulan and Fa Mulan: Gender and Nation-State in Retelling Chinese Stories

BAI Meijiada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e legendary story of Mulan, recorded in The Ballad of Mula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Chinese cultural memory, and iconic in calling on women of new femininity to join in rescuing Chinese nation 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dapted to retell traditional story in China, this story also inspired Disney's cartoon film Mulan and its live action version. As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and the state, and ideologies delivered in adapting and retel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 Shao Brothers' Hua Mulan (1964), Director Ma Chucheng's Hua Mulan (2009), and Disney's feature animated film Mulan (1998) lack women's perspective as subjects. Thus, if common women do follow Mulan's example to work and fight, they will face specific gender problems that have never been included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Key words: gender; state; nation; Hua Mulan; adaptation

教育部名栏建设期刊
第六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扩展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广州大学学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双月刊 2002年创刊 Bimonthly, started in 2002

第19卷 第6期 (总第216期) Vol. 19 No. 6 (Sum No. 216)

2020年11月出版 (Published in Nov. 2020)

主管单位: 广州大学 Supervised by Guangzhou University

主办单位: 广州大学 Supervised & Sponsored by Guangzhou University

出版发行: 广州大学期刊中心 (广州 510006) Edited & Published by JC of GZHU (Guangzhou 510006, China)

期刊中心主任: 郑洁 Director of the Journal Center: ZHENG Jie

主编: 陶东风 Editor in Chief: TAO Dongfeng

执行编辑: 肖湘 Executive Editor: XIAO Xiang

国内发行: 广州大学期刊中心 Distributed in China by JC of GZHU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Distributed Abroa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Book Trading Corporation (P.O. Box 399, Beijing, P.R. China)

地址: 广州市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A213信箱

Address: Post Box A213, 230 Wai Huan Xi Road, Guangzhou Higher Education Mega Center

电子邮箱: (E-mail): journal@gzhu.edu.cn 电话 (Tel): 86-20-39366068 传真 (Fax): 86-20-39366068

封面及版式设计: 杨雍华 顾一唯 Designed by Yang Yonghua and Gu Yiwei

印刷: 广州市新怡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d by Xinyi Printing Co., Ltd. of Guangzhou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定价: 24.00元

刊号: ISSN 1671-394X
CN 44-1545/C

140

ISSN 1671-394X



RADIO & TV JOURNAL

视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5-1342/G2

2024/03/15

03

总第203期

ISSN 1674-246X



文化类节目的转文化传播提升路径探析 P3

乡村振兴题材剧中返乡人物形象传播效果研究 P6

广西电影的地缘文化景观建构及其价值 P39

当代广播电视新闻传媒学术月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网收录



学术交流的园地 理论探索的平台

当代广播影视新闻传媒学术月刊

视听
RADIO & TV JOURNAL

主管：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

出版：《视听》编辑部

刊号：ISSN 1674-246X

CN 45-1342/G2



《视听》微信公众号

视听

RADIO & TV JOURNAL

2024年3月15日 第3期 总第203期

主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主办

广西广播电视台

出版

广西广播电视报业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视听》编辑部

总编辑

陈朝阳

主编

黄永文

编辑部主任

何燕

编辑

张 晔 蒙春燕 李劲鹰

李文宗 杨姣姣

封面

伍永才

版式

徐 君

排版

黄 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 246X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5- 1342/G2

广告经营许可证: 4500000028

印刷: 南宁市友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定价: 30元

电话: 0771- 2632550

邮箱: gxshiting@163.com

微信: shitingbjb

网址: <http://shit.cbpt.cnki.net>

地址: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七星路123号

邮编: 530022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超星数据库、维普网收录。本刊已许可上述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著作权使用费。部分文章在《视听》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推送、保存。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本刊使用CNKI开发的软件对来稿进行学术不端检测,请作者自觉遵守学术规范,杜绝抄袭、剽窃行为。

目录

RADIO&TV JOURNAL

2024年第3期(总第203期)

视听

■ 专稿 ■

文化类节目的转文化传播提升路径探析 韦迪斯 /3

■ 青年学者专栏 ■

乡村振兴题材剧中返乡人物形象传播效果研究 李珏 /6

网络剧《漫长的季节》:悬疑剧与生活流的相融交织 陈怡含 /10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慢综艺的价值塑造与传播 张光耀 /14

香港青年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侯丽娴 /18

■ 论坛 ■

新时代青年导演与电影产业的和谐对话:青年导演的工业意识培养 初启钧 /22

克里斯·马克“以进为退”的媒介实践:对技术崇拜的超越 祝凤仪 /27

成长与冒险:彼得·道格特动画电影的叙事分析 廖翊翔 何珊 /31

互融性与延伸性:新闻改编电影现象研究 张帆 /35

广西电影的地缘文化景观建构及其价值 魏子超 /39

重庆动画影像中的地方性叙事研究 李雨濛 /43

传统曲艺的生命力重构:苏州评弹在电视剧中的运用策略 石玉婵 雷晓艳 /47

现实题材电视剧中青年群像的塑造与回归 陈结莲 /51

影视传播中“国家神话”的修辞策略与认同建构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黄钰珊 王依晗 喻沁怡 /55

■ 影视剧研究 ■

《问心》:医疗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创新和价值内涵 秦溢真 /59

中国神话史诗片的现代性表达与电影工业的突破
——以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为例 刘夏聪 罗龙锦 /64

电影工业化视域下中国神话史诗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以《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为例 马梦鑫 /68

后电影时代科幻电影的人文探索
——以《宇宙探索编辑部》为例 刘昊 /72

历史新说与“陌生化”呈现
——以电影《满江红》的叙事范式为例 曹艳梅 /76

■ 纪录片广角 ■

航天题材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价值书写 田源 卢俊 /80

宠物纪录片《宠物一千零一夜》:现代都市寓言的镜像呈现 刘文雅 /84

香港青年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研究

◎侯丽娴

摘要：短视频是讲好大湾区故事的创新传播手段之一。香港青年的声音是大湾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索香港青年博主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并揭示其三大特点：一是以日常生活短视频呈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真实面貌，二是以日常生活与创业的多元叙事视角展现对大湾区的多重认同，三是以大湾区美食叙事主题展示对香港-内地关系的新想象。

关键词：讲好大湾区故事；短视频；香港青年博主

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4.03.030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的发展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题材之一,而讲好大湾区故事,则有助于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香港青年(指18~35岁群体)的声音是大湾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香港青年的大湾区故事主要围绕他们在内地的成功创业经历展开,并通过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以专栏或纪录片的形式再现,例如央广网的《创业在湾区》栏目、芒果TV出品的纪录片《我们都是追梦人》。事实上,自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主动赴粤生活发展,探索融入大湾区的各种可能。他们通过短视频记录这些经历,以“微叙事”形式讲述各自精彩的大湾区故事。2020年以后,活跃于内地各大视频平台、展示与大湾区各种互动的香港青年博主明显增多。他们拥有上万乃至数十万粉丝,视频播放量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千万次,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例如bilibili平台(以下简称“B站”)上的“香港90后生活”拥有16万名粉丝,视频播放量高达2000多万次。

短视频生产是当下青年群体重要的媒介化文化实践及自我表达的新方式。青年个体通过短视频来呈现对社会变革的自我调适过程^②,展现多元的文化认同^③。1990年后出生的香港青年是在内地与香港两地地位显著变化的社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与当时落后的内地相比,香港的经济腾飞与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使得香港人普遍拥有“大香港主义”的优越感。^④但在遭受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严重打击后,香港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缓慢。对比内地最近十多年来在经济与文化上的高速发展,香港青年感受到一种“存在性焦虑”,即在内地的高速发展下,香港青年担心、焦虑香港将失去其独特性。^⑤这样的焦虑也导致香港青

年容易对内地产生偏见、抗拒与内地青年交往交流、形成对内地-香港关系的负面想象。^⑥大湾区的发展促进了香港青年与内地形成新互动,对内地形成新认识。而赴粤生活发展的香港青年博主通过短视频讲述这些新变化,从而展示了他们独特的大湾区故事。本文探索香港青年博主讲好大湾区故事的短视频实践并揭示其三大特点:一是以日常生活短视频呈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真实面貌,二是以日常生活与创业的多元叙事视角展现对大湾区的多重认同,三是以大湾区美食叙事主题展示对香港-内地关系的新想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抖音、西瓜、B站、小红书、快手等内地5个主要视频平台,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以关键词“香港”“香港青年”“大湾区”“大湾区青年”“Hong Kong”“Hong Kong Youth”“HK”“HK Youth”“Greater Bay”这些关键词,对内容及视频博主进行搜索和筛选。本文以2023年3月6日为截止日期,按照博主粉丝数、获赞量和视频数,整理出排名前5的香港青年视频博主及其短视频主要内容、主题,结果如表1所示。本研究主要观察这5位视频博主从发布到平台的第一条视频到上述截止时间为止的所有视频内容,并抽取这个时间段里的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

二、日常生活短视频呈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真实面貌

香港青年博主的短视频主要记录与书写自己在大湾区的日常生活,并集中在抖音、西瓜及B站这三大平台上(如表1所示)。

表 1 视频内容分析

博主	平台	粉丝数 (名)	获赞数 (次)	视频总数 (个)	主要内容	视频主题				
						日常生活		美食探店	搞笑模仿	其他
						日常活动 (如工作、访友、租房等)	评论内地/香港			
香港阿轩	抖音	27.3 万	507.6 万	63	探访广州特别是从化区, 后赴江西赣州助农	25	17	19	0	2
香港 90 后生活	B 站	16.1 万	153 万	196	大湾区生活日常及讨论内地、香港情况	80	66	40	5	5
香港曾小妹	西瓜	12.3 万	53.9 万	349	大湾区日常生活分享	188	55	93	3	10
香港西 DorSi	西瓜	5.5 万	11.8 万	720	大湾区美食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美食探索	30	10	676	0	4
香港 Esther	抖音	4.3 万	31.7 万	99	香港深圳两地生活、深圳创业分享	34	25	17	20	3

个人日常生活短视频的特点之一就是“真实记录、直接呈现的现实生活及真实生活中的人与事”^⑦。香港青年博主以日常生活为切口,用普通人的内视角,通过质朴的视觉影像,呈现大湾区内地各城市的真实面貌。例如抖音中“香港阿轩”的广州日常生活视频没有任何特效,以平实的镜头直接呈现广州的街头、小店,以及博主与路人的交流。博主在视频中强调:“希望分享更多我在内地的真实经历,让更多香港的青年朋友知道祖国真实的一面。”这些视频博主的真实性并非仅停留在镜头对现实生活事物单向度记录和书写层面,也包含着博主个人情感与认知的表达,是内在想法向外生发进而呈现的过程。他们的短视频在展示大湾区日常生活景观的同时,也传达了博主对内地的新认识,以及对两地青年能破除偏见、更好交流的渴望。例如B站博主“香港90后生活”在视频中记录自己在深圳生活的各种新奇体验,并强调:“我的频道是以生活类为主,主要希望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能放下成见。我们去客观交流,我们不会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只会告诉你现实是怎么样。”这些香港青年博主以大湾区日常生活影像弱化宏大的叙事表达,以微观、轻松的生活细节呈现大湾区内地城市中真实的人与事,成功引起观看者的情感共鸣。例如,在“香港90后生活”的视频下,内地网友通过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在香港旅游的经历,支持博主希望两地青年放下成见、客观交流的真诚提议。而“香港阿轩”的短视频不仅收获许多香港网友的支持点赞,同时也成为博主自己香港中学母校的教学案例。

由此可见,香港青年博主通过日常生活短视频呈现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真实面貌,展示对内地的新认识,消除香港青年过往对内地的成见,促进两地青年在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交流交心。

三、多元叙事视角展现对大湾区的多重认同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认同由自我界定,但同时也是在自我与他人交往中被构建的。^⑧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是对“我者”与“他者”进行划分,而“他者”在认同过程中通常被构建为负面形象。^⑨但学者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指出,也存在一种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这种方式则无关乎对他者的价值评判。^⑩这种差异性认同实际上是“我者”与“他者”建立起良性互动的体现。纵观香港与内地的长期互动,特别是在“存在性焦虑”的影响下,香港青年在构建身份认同的时候常常将内地视为负面的“他者”。^⑪但大湾区发展带来极大的转变。李晶、曾今两位学者探索在粤就读港澳籍大学生对大湾区的认同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港澳籍学生具有两大认同趋势:一是“归属感”认同,指粤港澳三地间在长期的交往中具有历史、文化的各种亲缘关系,对三地“文化同质”的认同及对大湾区内地城市“舒适生活”带来的“幸福感”的认同;二是“功能性”认同,指建设大湾区对于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的作用显著,对大湾区重要性产生认同。^⑫

香港青年博主的短视频主要记录自己在大湾区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同时以多元叙事视角呈现自我与大湾区的独特互动,并从中展演对大湾区的差异性、归属性及功能性的多重认同。

(一)大湾区生活日常中的比较视角展现差异性认同与归属感认同

香港青年博主的生活日常视频除了对大湾区的衣食住行四方面的原生态再现,也经常把香港与内地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消费”“住”三大民生议题进行比较。与香港青年以往因偏见而对内地文化的他者污名

化论述不同,香港青年博主的视频展示了他们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食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差异性认同。在住房方面,香港一直存在“上楼难”,即房价与房租高昂的居住困境。香港青年博主通过短视频再现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在住房方面的落差,凸显了他们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安居的归属感认同。

博主“香港90后生活”与内地有频繁的互动。在珠海完成本科学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他继续经常往返于香港与内地,最近几年则定居深圳。他的短视频记录他在内地特别是深圳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常常呈现对两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在“食”与“消费”方面,他通过视频讨论香港与内地的麦当劳文化的差别,展示他对两地文化的观察与反思,呈现出一种差异性认同。他在视频中提出,麦当劳在香港是最便宜的连锁快餐店,往往是香港草根阶层山穷水尽时的选择,但在内地却很贵。与之相比,香港草根饮食文化被麦当劳等少数几家快餐连锁店垄断,而内地的私人快餐小吃店多,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可供选择的便宜美食多样化。西瓜视频美食博主“香港西DorSi”主要探索深圳与广州的美食,并分析香港、广州、深圳三地美食文化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展示对香港与内地的差异性认同。

同样是西瓜视频博主的“香港曾小妹”属于香港的草根阶层,过去在香港是月入1万多元的文员,也曾是YouTube视频博主。2020年移居大湾区之后,该博主开始用短视频记录自己探索大湾区内地各城市的经历,主要集中在深圳、珠海、广州三地。她的日常生活视频关注大湾区内地城市住房方面与香港的区别,并超越了差异性认同,呈现对大湾区的归属感认同。她的短视频展示了自己在香港、深圳、珠海、清远的租房子的真实经历,即从在香港以8000港元只能租住又脏又小、没有阳光的20平方米逼仄小套间,到在清远以3000元人民币即可租住有着开阔山景与江景的四房一厅大房子。她在置顶视频中谈到其中的落差:“刚开始来深圳,其实那个体验就是比香港好一半,后面去珠海又再好一点点,然后来到清远这种小城市呢,那个体验就是同样的价钱,我可以做最有钱人做的事,我已经在这里变成一个小富婆了!”她对这一系列搬家经历的总结是“现在终于活像样了”。香港草根青年博主通过搬家对比视频,真实又细腻地展现了对大湾区幸福生活的归属感认同。

(二) 大湾区创业日常中的城乡发展视角展演功能性认同

香港青年博主也用短视频记录他们的创业日常,突出对大湾区发展的惊叹与功能性认同。而最为特别的是,他们不仅以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高速发展呈现这种认同,也

关注到大湾区农村地区的变迁,从而凸显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性,以及香港青年融入大湾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抖音博主“香港Esther”曾在英国留学,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都有过创业经历。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她最终落户深圳创业。她的视频除了记录自己在香港、深圳两地生活的日常趣闻,也展示了深圳的发展速度。该博主的短视频镜头对准了深圳的商圈建设:“来深圳这几年都看到深圳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建商圈,建地铁。早上出去的时候那个路段才刚开始修,晚上回去就修好了!那个速度真的是世界最快的速度!”她的视频也通过再现各式各样的深圳科技创业基地与文化创意基地,突出这种令人惊叹的中国发展速度。她在视频中强调:“我们(香港青年)来到这里,总是看到你们(内地青年)的福气!”

同样是抖音博主的“香港阿轩”在初中时参与过学校的内地交流团,在广州从化体验过农村生活。大学毕业后,他和其他香港青年到广州开始了农产品出口相关的创业尝试,并通过短视频记录自己在广州的日常生活。随后他继续北上,来到江西赣州农村,通过直播帮助当地果农销售脐橙。他的大湾区短视频通过乡村景观、人物探访的视觉再现,突出从化农村的变化,以及香港青年参与大湾区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例如,他的短视频通过呈现从化乡间房屋的变化,直观再现内地农村的发展速度。他首先用镜头对准乡间零落破烂的黄泥小房子,之后再转到小路对面一排一排明亮的独栋新房子,并用画外音提示道:“十年前,我在香港的学校交流团过来内地看,就是从化这里,都是那种房子(黄泥小房子)。但十年之后,都是这些大房子!看到吗?十年之间的变化!”该博主也用短视频记录自己探访早在2012年就从香港来到从化种植黑花生的丽姐的过程。他通过呈现丽姐与当地农民合作耕耘的广阔黑花生农地,以及双方努力共同打造的舒适生态度假村,呈现了在大湾区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重背景下,从化农村的高速发展与香港青年参与其中的可喜成果。

两位香港青年视频博主以创业者的身份,通过大湾区城乡两地的发展视角,书写了自己对大湾区重要性的功能性认同及融入内地发展的期盼。

四、美食叙事主题展示对内地-香港关系的新想象

尽管香港青年博主的大湾区日常短视频各具特色,但他们的叙事主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大湾区美食的探索(如表1所示)。这些博主的美食视频并不只是简单地“吃喝玩乐”的生活再现,而是透过美食文化,以

隐性的方式展示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香港青年对内地-香港关系的新想象。

(一) 以美食短视频重构香港与内地的关系

香港青年博主在大湾区美食探店主题视频中,频繁提及的是“传统广府美食”“正宗港味”这两大关键词。香港青年博主以前者重新连接香港与广州的亲缘关系,并通过后者突出香港无法被内地复制的文化特色。“香港西DorSi”探索广州早茶美食的短视频特别关注“香港几乎失传的怀旧点心”。博主特别提出,“在广州,这些香港不见了的传统广府味道得以保留。”博主通过视频不仅再现了一个香港青年对于香港“失传”的传统广府味道的怀念,同时更是通过广府美食,再现了香港与广州同宗同源的文化关系。与此同时,大湾区内地城市也保留了失去的“港味”。“香港西DorSi”的短视频对准了深圳商场中的许留山甜品店。许留山甜品店是众多香港青年的青春回忆,在香港已经全线关闭了,但在大湾区其他城市还有很多分店。这些店不仅仅是保留了香港的味道,更是保留了香港人的回忆。

另一方面,香港青年博主关注在大湾区内地城市遍地开花的茶餐厅是否够“正宗港味”。“香港曾小妹”在视频中就表示,内地茶餐厅的意粉与香港很不同,香港比较“西”,即西方口味。而“香港西DorSi”进一步评论,“打着香港茶餐厅的名号,从味道及价钱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香港’”,“真正的香港茶记,做的都是基层市民的生意。而内地的茶餐厅都太贵了”。这些博主在美食短视频中对大湾区茶餐厅“港味”的评价体现了香港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杂糅性(hybridity)特点。它既有广府文化的属性,也有西方的味道,同时还充满当地浓厚的市民文化。

香港青年博主通过美食短视频,以传统广府味道和“正宗港味”重新构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与广州以广府文化为宗源的亲缘性关系在轻松愉快的美食短视频中得以再现与巩固。视频呈现的大湾区对“港味”的保留与模仿,也体现了香港青年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新认识,而香港青年担心香港被内地吞噬,失去其独特性的“存在性焦虑”得到有效缓解——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一方面香港与内地有更多互动、关系更为紧密,但另一方面,香港仍保有自身不可取代的杂糅性文化特点。

(二) 以美食短视频再现内地文化的多元性

香港青年博主的大湾区美食短视频再现了大湾区内地城市(主要是深圳、广州)美食国际化的一面,即汇聚了各国美食,但更多是再现其多元化的一面,即充满了香港地区很难看到的内地各城市、各民族的美食。例

如高度城市化的香港缺乏路边摊草根小食文化,“香港Esther”的视频就聚焦深圳路边的早餐车,并评论这种在香港看不到的早餐形式令人“又惊又叹”。“香港曾小妹”再现了深圳城中村热闹的路边摊文化和珠海夜市摊贩美食,并形容其为“充满烟火气”“贴地”。此外,“香港曾小妹”在深圳探索延边美食的短视频则突出了她第一次尝试朝鲜族美食的惊喜。这些视频博主以美食为切入点,展示内地文化的多元性,用以消解香港青年对内地文化单一化、扁平化的他者想象。例如,在“香港曾小妹”探索延边美食的视频中,博主坦陈自己和许多香港人一样,在深圳找到这个美食之前,不知道中国有朝鲜族,也不知道延边在哪里,对内地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通过美食短视频,该博主不仅展示了自己对内地的新认识,也呈现了一个香港青年反思旧想象的片面性与构建新想象的过程:内地与香港一样,都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

五、结语

讲好大湾区故事需要形式创新。相较于传统媒体来说,短视频更受青年人青睐。讲好大湾区故事既需要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的宏大视野,也需要青年个体的微观角度。香港青年博主的大湾区故事短视频聚焦日常生活,以平民化视角呈现了大湾区的真实面貌,表达自己对内地的新认识,促进内地青年和香港青年融洽交流。他们以生活日常与创业日常的多元视角讲述自己与大湾区的特别互动,并展演了对大湾区差异性、归属性与功能性的多重认同。他们的短视频也让我们看到香港青年在融入大湾区生活发展过程中对香港-内地关系的新想象。他们利用美食视频重构了内地与香港的亲缘关系,在强调香港杂糅文化特质的同时,也打破对内地扁平化和同质化的他者想象,重新构建对内地多元文化的认识与论述。这些香港青年博主用短视频讲述了生动鲜活的大湾区故事,同时也激活了更多主体的创造力,以更多元的“微叙事”形式讲述他们独特的大湾区故事。

注释:

①李佳莉. 讲好大湾区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EB/OL]. 南方日报,2023-01-28. https://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301/28/content_10048860.html.

②陈瑞华. “地方再造”: 农村青年媒介行为的文化隐喻[J]. 中国青年研究,2019(02):94-101.

新时代青年导演与电影产业的和谐对话： 青年导演的工业意识培养

◎初启钧

摘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电影工业逐渐形成了工业化体制，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近年来，上游的项目发起端重视对青年导演的扶持，选拔竞争路径多元化、丰富化，配套的工业制作体系及影视生产的配套服务逐渐专业化、透明化，特效制作方面逐渐工业化、自主化。然而，青年创作者的意识培养并没有伴随工业化硬件配套设施的高速升级而强化。青年创作者对电影工业化语境内“导演”这一概念的理解普遍停留在“强势话语权”“天赋”“艺术家”等创作领域话语权威，却忽视了其作为影视产品生产者的服务属性。一个成功的商业导演不仅应该具有出众的艺术直觉与创作天赋，更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生动有趣的影像为观众奉上精神食粮，从而形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中国电影产业；青年导演扶持；商业敏感性；创作意愿；观众思维

早在1998年，陆川导演在毕业论文中就提到“体制中的作者”，形容科波拉等能够与好莱坞电影产业形成良性对话的导演。此处的“体制”指的是以商业产出为导向的好莱坞电影产业，其既为创作者提供土

壤，又干预创作的二元属性进行解构分析。^①黑泽明导演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对导演这一职业的理解，认为导演具有一种巨大的权力，剧组工作人员与观众让渡了一大部分权力给导演，创作权和自我表达的权力甚至

③罗兰·戏精文化：城市视域下当代青年短视频社交表达[J]. 湖北社会科学,2020(12):162-168.

④⑥⑪曾志敏,宁悦. 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演变历程与建构路径[J]. 青年探索,2020(01):97-104.

⑤郑婉卿. 香港青年的社会想象与本土意识[J]. 当代港澳研究,2016(02): 95-130.

⑦陈接峰,张煜. 日常生活的数字展演：短视频的生命情感和生活意蕴[J]. 中国电视,2021(12):70-76.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⑨何蓉. 略论他者的建构范式与欧洲认同[J]. 人民论坛,2015(32):206-208.

⑩[德]Diez,Thomas.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s:Reconsider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J].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5,33(3):613-636.

⑫李晶,曾今. 在粤就读港澳籍大学生湾区认同的实证研究[J]. 高教探索,2021(06):53-60.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2年度共建课题“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研究”（2022GZGJ249）和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专项课题“港澳台侨统战工作新趋势研究：以香港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为例”（TZ2022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南方 論刊

NAN FANG LUN KAN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扩展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首届“广东省优秀期刊”
全国首批A类学术期刊
国际刊号：ISSN1004-1133
国内刊号：CN44-1296/C
官网：www.nanfanglunkan.com



微信公众号

2024 · 5
【总第392期】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新征程上，年轻干部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必须牢记初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茂名市组百人团到高州市人民医院 探讨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的“良方”



“如何为当地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群众愿意在当地就医？”4月19日，茂名市卫生健康局组织茂南、电白、信宜、化州、高州等地卫生健康局及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以及民营医院的相关领导及部门科室负责人共约100人，组团到高州市人民医院开展“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现场调研交流活动，实地探讨高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的“良方”，面对面交流各区（县）各医院增进医疗服务的“金点子”，提升全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水平。

近年来，高州市人民医院党委以“四有”工程为抓手，打造以“聚力理想信念、聚力健康事业、聚力从严治党、聚力社会责任”为核心内涵的党心聚力工程，根据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要，从治疗疾病到以治疗和预防并重转变，制定了“心脑血管-肿瘤-康复养老”的发展中轴线，在人才外引内培、专科建设迭代升级、改善医疗服务等全方位持续下功夫，切实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门诊是医院服务患者的“第一站”。该院积极落实国家卫健委“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大力推进智慧门诊建设，为患者提供预约诊疗等便捷服务。预约挂号患者到院后可在自助设备完成报到取号、线上缴费以及打印检查报告、费用清单等，也可以在专业导医、辅诊人员、志愿者的服务下，舒心就医，实现分时段就诊、有效缩短候诊时间。“如今药品也可以快递到家，免去了窗口排队取药的等待。”该院优化药房取药流程，开设“药品寄递到家便民服务”后，赢得患者的一致好评。2023年该院门诊就诊预约率为91%，预约后就诊平均等待时间19分钟。

该院优化再造就医流程，开设一站式服务中心”，病历复印、盖章审批、医保服务等常见的服务需求，在这里都可

一次性办好，告别“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的历史难题。开设住院准备中心，提供“一条龙”服务，可办理入院预约登记、床位安排、采血检查、日间手术准备等手续，大大节省等候时间。此外，以往出院结算还要“跑上跑下”，如今已实现床边结算率约75%，让患者入院安心、出院省心。

该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帮扶全市村医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高州市互联网总医院联通全市32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38个村卫生站，村医通过“云端”可与三甲医院专家进行一对一会诊，村民通过党员群主建立的村医通微信群可获专家免费解答。建成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为高州全市村医提供免费培训。

全院开展星级服务考评，全员戴星上岗；创新常态化开展“120免费出车”“困难家庭学生先心病减免手术”、农村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等公益活动；开展志愿服务、社工服务、大病救助等……医院多措并举，与群众的心贴得更近，得到调研组的一致好评。“在这里靠近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成为了到高州市人民医院就医的众多患者的心声。

在近五年“国考”中，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均为满分。该院还蝉联国家卫健委医管局颁发的全国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称号，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广东省高水平医院”，被广东省医改办评为“全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

ISSN 1004-1133



南方 論刊

NAN FANG LUN KAN

月刊

2024年第5期 总第392期

刊物名称 《南方论刊》
主管单位 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 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 《南方论刊》杂志社
出版刊号 ISSN1004-1133 (国际刊号)
CN44-1296/C (国内刊号)

顾问 张惠灵 向晓梅

社长、编委会主任、总编 张学强
编委会副主任 伍进
编委会成员 王志军 邱克俭 龙泰良
黄蓉 罗亮 何秋菊
李亚凤 张婷 关锡飞
姜桂义 董福德 陆一霖
姜桂义

副总编

编辑部主任

编辑

美编

拓展部

通联部

官方网站 www.nanfanglunkan.com

电子邮箱 nanfanglunkan@vip.163.com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刊

出版日期 5月8日

国内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400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900100004

地址 茂名市油城五路28号

市委大院5栋

邮编 525000

电话 0668-2910312

传真 0668-2910312

印刷 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彩印

有限公司

地址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工业加工

区富民路西侧

电话 0668-2878228/2878638

定价 28.00元

广告总代理 茂名市尚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新福五路

南华小区39B号首层3号

邮编 525200

邮箱 mmsx2855009@163.com

电话 0668-2855009

13428188541 13553668006

传真 0668-2855009

深圳广告总代理 深圳市立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

二栋东座608室

邮编 518000

电话 0755-25566120

传真 0755-25566120

【理论前沿】

3/ 马克思异化劳动视域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研究 同济大学 邓宇欣

6/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内涵、重大成果及当代启示

北京交通大学 郭晨娟

【南方视点】

10/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内在逻辑探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刘瑶 李卓明

13/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中央民族大学 翟成鹏 上官嘉雯

【党的二十大精神解读】

17/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三维探析

西安工程大学 乔鑫 王志刚

19/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逻辑的历史考察 辽宁师范大学 高白雪

【经济观察】

22/ 以绿美引领生态建设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庄伟光 武文霞

24/ “三农”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机理、困境与路径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 王立娜

27/ 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路径

——以河南省N村为例

河南农业大学 郑州大学 苏玉娥 欧阳文倩

30/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优势和路径研究

——以廉江市为例

广东医科大学 王凯丽 黄祖辉

【学术之窗】

3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家庭思想的核心内容

及其时代价值

复旦大学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华东理工大学 付立平 李廷雨

36/ “宣传思想”到“宣传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

贵州财经大学 李娟娟 杨婷

39/ 关于共产党人心学的研究对象、学科视野、核心范畴的思考(上)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方绪银 葛翠茹 李梓萌

【社会治理】

43/ 共同富裕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下降成因及其破解路径

广州大学 温芊婷

45/ 西部地区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困境和路径探析

辽宁师范大学 彭涛 金星彤

47/ 张其昀的兰州开发方略和地学思想研究及启示

青海师范大学 刘响 丁柏峰

50/ 信息化时代下提升新市民职业素养的社区教育模式研究

——基于福建省的需求调查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开放大学

许驰 胡黎馨 李和欣 阮诗敏 王正环

53/ 河池市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河池学院 钟卓良 韦少雄

【党史党建】

55/ 高校青年高层次人才党员发展的难点问题与实践探索

——以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 林德丰 蔡晓平

59/ “制度-身份”视角下党建引领新型混合性社区融合治理模式研究

——基于J社区的分析 华南农业大学 唐朝南 唐斌

62/ 淬炼“四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实践路径

喀什大学 西南大学 邓永禄 唐颖

【民主法制】

65/ 多元共治下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势和诉前机制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黄佳莹

68/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权权利属性的界定探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戴明月

【工作研究】

71/ 后备干部“接班人心理”的双刃剑效应与管理策略

苏州大学 吴落兰 宋典

74/ 运用 PDCA 模式提升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管理质量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朱崇高

76/ 新时代中国国际形象建构的内涵辨析、重大意义与实践进路

新疆师范大学 高典典

【文化长廊】

79/ 新时代青年在“和”文化建设中的使命探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赵彩萍 张翔

82/ 香港青年大湾区短视频实践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侯丽娟

86/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冼夫人文化的阐释与弘扬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姚大斌 赵丹

88/ 冼夫人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的当今启示

中山大学 电白区冼夫人研究会 黄伟宗 戴国伟

【教育广角】

92/ 历史主动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曾进雯

94/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考

暨南大学 廖媛蓉

97/ 新文科背景下天津民办本科高校交叉学科建设路径及治理机制研究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 天津财经大学 赵星 李丞高 王丽娜

100/ “婚姻家庭法学”在线开放课程设计创新研究

——基于生成性学习资源的视角

广东怀集县开放大学 广东开放大学 茂名开放大学

陈洁云 梁文莉 龙世发

【政工园地】

103/ 自媒体时代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样态及应对策略

湖南师范大学 秦梦瑶 邱若男

106/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四维进路

福建师范大学 黄欣

109/ 加强高校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研究

——以上海政法学院为例

上海政法学院 刘姝娴

香港青年大湾区短视频实践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研究

侯丽娟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广州 510642)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香港青年与内地形成新互动。香港青年通过短视频讲述自己的大湾区故事并构建内地新形象。本文对香港青年博主的大湾区生活发展短视频进行文本分析,揭示他们构建内地新形象的以下特点:(1)以“日常性”与“流动性”来展现内地真实、多元的城市景观;(2)突出构建“医疗先进”“提供多元选择”“充满善良热情的普通人”的内地形象。通过这些短视频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香港青年博主展演了对内地的归属感认同。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短视频;香港青年博主;内地新形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香港青年(指18-35岁群体)与内地形成新互动,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自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香港青年主动赴粤生活发展,并利用短视频讲述自己的大湾区故事。在2020年以后,活跃于内地各大视频平台的香港青年博主明显增多。他们以短视频呈现大湾区各城市的丰富形象及自己“北上”探索更多内地城市的独特经历,展示对内地的新认识。这些香港青年博主拥有上万乃至数十万粉丝数量,获赞数能达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具备一定影响力。例如抖音平台的“香港阿轩”拥有27万粉丝,获赞数达500多万。他的短视频前期呈现自己在广州生活中看到的城市风光,后期则主要记录自己北上江西赣州助农所经历的人与事。

自香港回归以来,学界一直关注香港媒介中的内地形象,但研究大部分聚焦影视作品及主流纸媒对内地及内地人群的再现^[1],对青年个体如何主动使用新媒体构建内地形象的探讨则比较缺乏^[2]。香港媒介中的内地形象随着两地关系的转变而变化,同时体现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认同特点。短视频生产是当下青年群体重要的媒介化文化实践以及展演复杂认同的新方式。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香港青年不仅利用短视频记录自己与内地更频繁、更亲密的接触,同时也通过短视频构建在以往香港媒介研究中看不到的内地新形象,呈现对内地的新认同。本文对香港青年博主的大湾区生活发展短视频进行文本分析,揭示香港青年构建内地新形象的以下特点:(1)以“日常性”与“流动性”来展现内地真实、多元的城市景观;(2)突出构建“医疗先进”“提供多元选择”“充满善良热情的普通人”的内地形象。通过这些短视频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香港青年博主展演了对内地的归属感认同。

一、研究方法

此研究通过在内地五个主要的视频平台:抖音、西瓜、Bilibili、小红书、快手,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以关键词“香港”“香港青年”“大湾区”“大湾区青年”“Hong Kong”“Hong Kong Youth”“HK”“HK Youth”“Greater Bay”这些关键词,对内容以及视频博主进行搜索以及筛选。本文以2023年3月6日为截止日期,按照博主粉丝数、获赞量、视频数,筛选出排名前三的香港青年视频博主。按照短视频主要内容及主题,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此研究主要观察这三位视频博主从

发布到平台的第一条视频到上述截止时间为止的所有视频内容,并抽取这个时间段里的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探索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香港青年博主如何利用短视频构建内地新形象。

博主	平台	粉丝数 (万)	获赞数 (万)	视频 总条数	主要内容	视频主题			
						探索大湾区		探索内地其他 城市	其他
						大湾区日常 生活	探索大湾区 各城市		
香港阿轩	抖音	27.3	507.6	63	广州生活日常及江西赣州助农经历分享	14	15	32	2
香港90后生活	B站	16.1	153	196	大湾区生活日常分享及探索大湾区以外内地其他城市	126	20	30	20
香港曾小秋	西瓜	12.3	53.9	349	大湾区日常生活分享及探索大湾区各城市	125	190	19	13

表1

二、不同香港媒介中的内地形象特点

(一) 影视作品中内地形象的模糊性

学界最为关注香港电影电视中内地形象的塑造,特别聚焦回归前后影视作品对内地人物的再现差异上。赵慧在其硕士论文中发现回归前香港影视作品对内地人的呈现以负面形象为主,但回归之后则逐渐趋向以平和及客观的方式呈现内地人^[3]。任思燕在研究近30年香港电视剧中的内地人物形象变化的硕士论文中指出,内地人形象从遥远极端的“北佬”、到多元混杂的“远亲”、再演变为身份模糊的“同胞”^[4]。学者顾涵忱进一步指出,在2003年CEPA签署后,香港影视作品中香港与内地的地域特征开始变得模糊,而内地人形象转变为港人的合作者以及帮助港人渡过难关的救赎者^[5]。总的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催生“大香港主义”。香港影视创作受此影响,普遍将“内地”构建为落后的“他者”。但随着最近二十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出现逆差,而两地经济文化互动更为紧密,加之香港影视产业衰落,内地“落后”的他者形象被打破,香港与内地的区隔也逐渐模糊。

(二) 主流新闻报道中内地形象的复杂性

学界主要研究香港商业纸媒中的内地新闻报道来探索香港主流媒体对内地形象的构建。对比影视作品中内地、内地人形象的模糊性,香港新闻报道中的内地形象更为复杂。学者陈薇分析香港三份不同商业报纸对内地的报道,指出在经济与科技议题上,香港媒体偏向塑造

出“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的内地正面形象；但在社会议题上，则偏向负面主题，强化内地食品安全与医疗状况堪忧、社会问题频发的负面形象^[6]。刘楚君的硕士论文研究香港五份商业报刊中关于内地的新闻报道，并得出相似的结论：香港纸媒关注内地的民生议题；对内地人的正面形象塑造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助推者”，但更多是负面形象的再现，如“道德文明的忽视者”及“抢占资源的入侵者”^[7]。香港主流报刊对内地的复杂再现：一是由于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世界瞩目。二是两地经济文化科技发展逆转给港人带来一定的心理落差^[8]。学者陈薇指出，受市场导向的商业运营模式影响，香港主流报刊为了迎合市场以及港人心理，容易产生大报小报化、资讯娱乐化的现象，即对准内地社会议题的消极面及黑暗面，并通过夸大大部分内地问题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冲突来夺取香港读者的眼球^[9]。

（三）新媒体中内地形象的消极性

对比上述两种媒介的研究，学者对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中的内地形象构建问题关注较少。许俊仟、黄芸云探索香港本土网络社区中的内地形象并揭示部分香港青年网民塑造了偏负面形象的内地民众形象，包括“低素质土豪”“危险群体”及“没礼貌、不守规矩的人群”^[10]。这些负面形象一方面，延续了香港主流报刊中对内地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香港青年在缺乏亲身探索内地生活发展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歧见。受上述两方面影响，部分香港青年在网络媒体中对内地形象的塑造日益负面与偏颇，对内地的认同感也逐渐降低。

总的来说，不同的香港媒介呈现了不同的内地形象，也体现了港人对内地的复杂情感与认知。在大湾区发展背景下，香港青年博主更频繁、更深入地与内地互动，并在短视频生产中构建不同于上述三种媒介中呈现的内地新形象。

三、香港青年短视频中的内地新形象特点

（一）“日常性”与“流动性”

香港青年博主的短视频以“日常性”与“流动性”来展现内地各城市真实、多元的景观以及对内地各城市的新认识。

如表1所示，这些香港青年博主的短视频主要呈现自己探索大湾区的经历并突出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学者陈接峰指出，个人日常短视频的特点是“直接”“真实”^[11]。香港影视作品中的内地形象是一种基于文化精英视角的艺术加工，而香港青年的短视频则是以普通人的视角，通过朴素的视觉影像，呈现大湾区内地各城市在微观日常中的真实景观及人事。例如“香港曾小妹”的大湾区生活短视频没有任何特效，以平实的镜头记录了她如何与广州深圳两地青年相识相交，并一起探索广深两地的特色美食。与香港主流媒体关注内地社会民生议题相似，这些博主的短视频聚焦大湾区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经验。但有别于港媒夸大内地社会民生问题从而构建内地社会矛盾突出的负面形象，这些博主以个人的内在视角，通过沉浸式的生活影像记录，呈现内地社会环境与生活的丰富多元。例如“香港90后生活日记”在记录深圳生活的短视频中，呈现自己与其他香港朋友一起参与在媒体报道中颇受争议的“大妈广场舞”经历，并评论道，“第一次体验，没想到跳起来挺爽的！”

香港青年博主的短视频同时记录他们首先探索大湾区各城市，继而北上探索更多内地城市的流动轨迹。他们的短视频以香港土生土长的青年个体第一次体验内地不同城市的独特视角，深入到内地城市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去记录和表达，呈现出上述三种香港媒介无法触及的城市细节脉络，传达着对内地不同城市的本真体验并在亲身感受香港与内地差异中展示对内地的新认识，打破部分香港青年在香港本地新媒体中对内地单一化的负面想象。例如“香港曾小妹”集中探索大湾区内的深圳、广州、珠海、清远，进而继续探索福建与厦门。在探索珠海的时候，她的短视频聚焦热闹的夜市以及夜市美食，并以画外音赞叹道，这是高度城市化的香港“看不到的烟火气”。“香港90后生活日记”的短视频除了记录博主的深圳生活，更有北上苏州、上海、山东、内蒙古的旅行影像。在探索苏州的过程中，他的短视频对准阳澄湖高速公路服务区艺术中心、繁华的商铺及传统苏式亭台楼阁。与网红打卡的影像不同，他在短视频中加入香港青年的比较视角进行评论，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及高度商业化的香港是难以看到这种传统与现代、商业与人文完美结合的景观。“香港阿轩”则主要记录自己在广州的见闻，以及北上赣州农村帮助果农的经历。他的短视频不仅再现内地城市的繁华景象，也呈现了内地农村质朴的原貌。这种强烈的城市农村景观对比，不仅呈现内地的异质性，也展现了香港青年对内地更深入的探索与认知。

（二）丰富的内地新形象

三位香港青年博主从不同侧面展示他们对内地的新认知，突出构建内地具有以下丰富的新形象：医疗先进、提供多元选择、充满善良热情的普通群众。

1. 医疗先进

如前所述，部分香港传统媒体报道倾向关注内地负面的民生问题如医疗问题，塑造了内地医疗落后、医疗体系腐败的刻板印象，以及内地人“抢占资源的入侵者”形象。“香港曾小妹”的短视频通过独白与vlog两种形式打破这种他者化偏见，构建内地医疗的先进形象。

“香港曾小妹”的独白视频采取个人面对镜头直接叙述的形式，分享自己多次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耗时体验，以及忏悔之前对内地医院有“脏、乱，手术都是骗钱”的刻板印象而阻碍母亲到内地治疗甲状腺癌的经历，从而形成对内地医疗落后偏见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而她的vlog短视频则以自己到内地医院看病的真实情景呈现内地医疗体系、环境与设备的先进性。博主半夜到珠海人民医院急诊的视频对准医院墙上显眼的“拒绝‘红包’、回扣”的醒目标语及宽广的医院大堂，并以画外音评论到，“我自己以前没来过（内地）医院看医生。在香港，印象中的（公立）医院就是很脏，很乱，很落后的感觉。我以为内地也差不多……但这里也实在太好看了吧！装修太好了！好豪华，像私人医院。”博主另一条到清远市人民医院就医的短视频则是将镜头对准医院的自动取药机器人以及药物自动传送带，并再次以画外音赞叹到“太先进了！又卫生又智能又省人力！我真的没想到清远有这样的设备！孤陋寡闻……我都没来过这样的医院。”

2. 提供多元选择

“香港90后生活日记”博主不仅用短视频记录自己与内地各城市的互动，同时以日常聊天的短视频形式，

呈现博主与香港青年对内地与香港两地在生活发展中的各种差异的讨论。这些讨论短视频主要围绕“食”“住”“就业”三大民生议题，展现了不同阶层的香港青年基于与大湾区的新互动而产生的内地新想象，塑造了内地除了经济繁荣与科技发达以外，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的生活与发展选择的丰富形象。

在“食”方面，博主在与草根阶层的香港青年讨论中特别指出内地饮食文化的多元选择，即有和香港差不多的贵价美食，但也有很多十几块就可以填饱肚子的小店可以选择，但“在香港十几块在七仔买个三文治差不多，吃不饱。”在“住”的方面，博主与在香港住商业楼、公屋以及劏房的不同香港青年的讨论中都特别强调内地一线城市住房性价比香港高得多。同时，在内地，生活困难的青年可以选择去县城或不发达的城市解决住房问题，这是香港无法实现的。在“就业”方面，博主分享了自己大学毕业以后到内地从事乐队巡演经理的经历，“香港那么小，我这个行业在香港是没有的。你怀才不遇，你想发展的行业在香港没有前景。”博主与其他香港青年在讨论中都指出香港就业的局限性，即香港是高度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很多有前景的行业都是围绕金融进行的，而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相当有限。

“香港90后生活日记”通过讨论短视频呈现了大部分香港青年切身的焦虑——“买房难、就业难、择业更难”的“上楼及上流”困境，同时也展现了香港青年通过探索在大湾区及更多内地城市生活发展的可能性，缓解了这种生存性焦虑。在这些短视频中，内地成为能给香港青年提供多元选择的广阔天地。

3. 善良热情的内地普通人

“香港阿轩”的短视频通过记录自己在江西赣州农村的“创业日记”——用直播帮助当地果农销售脐橙及把脐橙推销到香港，构建了淳朴善良的果农以及热情仗义的内地网友形象。

与内地主流媒体再现的香港精英青年在内地成功创业的故事不同，博主的短视频展演了一个香港青年到内地助农创业并不那么成功的甘与苦日常点滴。他的短视频真实地呈现了在艰难的农村生活中，博主如何与内地果农一起通过回收垃圾建成一个简陋的直播间进行脐橙销售直播。短视频也记录了直播到半夜销售仍然不理想的博主的沮丧心情，但面对在黑暗中打着手电筒等待博主归家并安慰他的果农，博主面对镜头倾诉对果农这份同胞情谊的感动。博主的短视频同时呈现与果农的日常生活互动，特别是温馨的吃饭场景——善良的果农特意为博主准备广东鸡汤，博主则给果农特意准备一桌子地道的粤菜一起庆祝冬至。除此以外，博主也通过短视频展示了内地网友给他们快递的各种物资，并特别记录了几个热心仗义的网友从全国各地自费到江西赣州亲身支持博主，并为博主下厨做饭庆祝直播顺利完成的温暖场景。

“香港阿轩”利用短视频呈现了生活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青年并不熟悉的内地农村场景以及生活，同时也拆解了部分香港青年在网络媒体中对内地人负面形象刻画的片面性，再现了普通内地群众的多元化，同时体现了香港青年与内地群众的亲密同胞关系。

四、香港青年对内地的“归属感”认同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是对“我者”与“他者”进行

划分^[12]。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指出，在对“他者”的构建中，“我者”一般会将他者构建为“异类”“劣等”“存在的威胁”，但也存在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这种“差异性”呈现是基于客观的比较与反思，不存在对他者的偏见^[13]。

早期的香港电影、香港部分主流报刊、部分本地网络媒体对于内地、内地群体的形象构建都是采取负面的他者化策略，同时也凸显了这三种媒介对香港本土身份与本土文化优越性的认同。但自21世纪以来，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内地的经济科技繁荣给香港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香港与内地在影视文化产业的合作越发紧密。香港主流媒体与影视作品都开始呈现内地的积极形象，体现了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的一致性构建的转向。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香港青年利用短视频构建与上述三种媒介不同的内地形象。“香港曾小妹”以及“香港90后生活日记”的短视频采取“差异性”策略来构建内地形象，不仅以亲身的经历呈现香港与内地在医疗与日常生活的差别，同时打破了部分香港主流媒体及网络媒体对内地医疗落后、民生问题严重、掠夺香港资源的刻板印象，重构内地作为医疗先进、提供多元选择的生活发展新空间。“香港阿轩”的短视频则是以香港青年与内地果农、网友互动的独特创业经历，构建了内地普通群众善良热情的形象。博主以质朴的镜头呈现了更多内地普通群众的真实面貌，打破了部分香港青年在本地网络媒体中构建的内地人“素质低”“没礼貌”“危险”的单一化极端形象，同时也丰富了回归后的影视作品塑造的内地人作为香港的协作者、合作者的新形象。

总的来说，香港青年博主短视频构建的新内地形象展演了他们对内地的“归属感”新认同，即打破对内地他者化的偏见与对香港优越性的盲目认同，在亲身体验内地生活发展之后，产生对内地城市“舒适生活”、内地带来的“幸福感”以及内地群体作为亲密同胞关系的认同^[14]。

五、结语

香港青年基于探索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北上”认识更多不同内地城市的切身经验，以日常生活的视觉影像再现了真实、多元、鲜活的内地与内地群体新形象。这些新形象既批判了以往其他香港媒介对内地的他者化构建，同时也以微观的个人视角，丰满了香港媒介呈现的内地正面形象。香港青年博主短视频中的内地新形象构建体现他们对内地的新认识及“归属感”新认同。进一步研究香港青年短视频中的内地形象，不仅能为讲好大湾区故事提供新素材，也能为促进香港青年更好地筑梦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新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2年度课题共建课题“广州服务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研究：在穗‘港澳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研究”（2022GZGJ249）的最终成果；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高校哲社专项“广府民俗文化的译介及影响研究——以《粤讴》为例”（2019GXJK11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10] 许俊仟，黄荟云. 香港新媒体中的大陆人形象建构：以香港高登社区为例[J]. 新闻大学, 2015(02):131-

[2] 林芝娜. 香港媒体中的内地人形象研究综述及对提升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启示 [J].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 2017(0):173-190.

[4] 任思燕. 近三十年港剧中内地人形象演变与身份认同[D]. 江苏: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6] 陈薇. 国家形象建构与传媒话语的权力场: 香港商业报纸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实证研究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8] 曾志敏、宁悦. 香港青年对内地的社会心理: 演变历程与建构路径 [J]. 青年探索, 2020(1): 97-104.

[1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14] 李晶、曾今. 在粤就读港澳籍大学生湾区认同的实证研究[J]. 高教探索, 2021(6):53-60.

责任编辑 / 关锡飞 实习编辑 / 列晓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7]青年作为国家建设的奋进者和开拓者，要在推动中华文化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和”文化建设持续推进的新时代，青年要积极崇尚“和”文化、践行“和”文化、传播“和”文化、建设“和”文化，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勇做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先锋。

[2]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汉字文化, 2023(3):196-198.

[17]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1).

责任编辑 / 卢志东 实习编辑 / 列晓宁

指导学生参加 2024 年“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短视频大赛广东省省赛金奖，学院微信公众号截图
(https://mp.weixin.qq.com/s/Uz_X-1QUsJja2qChC1JZ_w)

榜样外语 | 喜讯! 我校学子在 2024年“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外语能力比赛广东省省赛中再创佳绩!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4年11月12日 23:48 广东

2024年11月9日至10日，2024年广东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暨“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比赛广东省省赛在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学院举办，我校由尹静媛、邵爱琴两位老师带队参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我校选手表现优异，再创佳绩！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黄凯琳同学获英语国际传播综合能力赛项金奖并晋级国赛；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林子琦、林凡、李思远团队荣获短视频赛项金奖并晋级国赛；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何璧君同学荣获多语种（日语）赛项金奖并晋级国赛；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邓钰沁同学荣获笔译、口译两项赛项金奖并晋级国赛；4名同学共获省赛6项银奖、铜奖。

获奖报告一瞥

比赛项目	学生姓名	学生专业	奖项	指导老师
综合能力	黄凯琳	英语	金奖	李红梅 陈瑾 周燕晖
	邓小宇	英语	银奖	尹静媛 黄璟 谢治萍

比赛项目	学生姓名	学生专业	奖项	指导老师
综合能力	黄凯琳	英语	金奖	李红梅 陈瑾 周燕晖
	邓小宇	英语	银奖	尹静媛 黄璟 谢治萍
	郭若瑜	生物科学	铜奖	黄海翔 苏安梅 程泉
演讲	黄凯琳	英语	银奖	李红梅 陈瑾 周燕晖
	邓小宇	英语	铜奖	尹静媛 黄璟 谢治萍
	郭若瑜	生物科学	铜奖	黄海翔 苏安梅 程泉
笔译	邓钰沁	金融学	金奖	邢小梅 邓琳超 李莉
口译	邓钰沁	金融学	金奖	彭英 邵爱琴 彭晓玲
	毛峥	英语	银奖	郭敏 许瑾瑜 沈文静
短视频	林子琦	英语	金奖	李成伟 侯丽娟 张丁元
	林凡			
	李思远			
日语	何璧君	日语	金奖	肖锦莲 袁钰 周茶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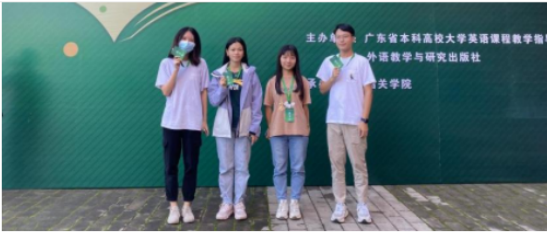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赞 分享 推荐 留言

指导学生参加 2021 年“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广东赛区），学生获一等奖。



阅读比赛参赛学生

此次比赛成绩检验了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成果，展现了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实力水平，是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学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外国语学院将进一步以此类学科竞赛为契机，加大英语教学改革步伐，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成绩。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是全国参赛人数最多、水平最高的英语系列金牌赛事，是大学生全面展示英语能力、沟通能力与思辨能力的综合平台，也是大学英语教育改革与探索开展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

本次比赛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省本科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韶关学院承办，吸引了全省66所高校629名选手参赛。

获奖情况一览表

比赛项目	学生姓名	学生专业	奖项	指导教师
阅读	刘卓	英语	特等奖	袁庆锋、李红宇
	梁颖琦	英语	一等奖	朱婕、侯丽娟
写作	文皓薇	农林经济管理	二等奖	周莉红、燕晓黎
	谢俞珏	商务英语	二等奖	李红梅、张丁元
	陈嘉颖	英语	二等奖	尹晓霞、秦洁
演讲	郑思漫	英语	二等奖	秦建华、许瑾瑜
	关秋怡	公共管理	二等奖	吕丽珊、牛莉
	陆心怡	动物医学	三等奖	钟建玲、张玲

（文：秦建华/钟建玲 图：秦建华）

荣誉证书

CERTIFICATE OF HONOR



华南农业大学 李良博、侯丽娴老师：

在2021年广东省第八届“联盟杯”本科高校英语写作大赛中荣获：

优秀指导教师奖

您指导的学生唐涛获得英语专业组特等奖。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2020 年 2 月获选校级“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一批） 截图

scau.edu.cn/2020/0229/c1390a220481/page.psp?ticket=ST-1616744-eJD3a4hvhV3wPHLvMiqL-cas01.example.org

淘宝 天猫 京东 百度一下 International Fem...

在校生 教职工 校友 考生 招聘

信息门户 教工邮箱 English Version 图书馆



华南农业大学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学校概况

机构设置

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校园文化

对外交流


思政在线

服务社会

招生就业

信息公开

来访预约



关于学习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的通知

审核发布: 教务处 来源单位及审核人: 发布时间: 2020-02-29 浏览次数: 4207

各教学单位、全体教师:
为帮助教师们更好地开展在线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教务处组织开展了在线教学优秀案例征集工作,遴选了部分优秀在线教学案例供全体教师参考借鉴,请大家自行下载学习。

教务处
2020年2月29日

附件: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一).rar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二).rar

电脑 > Windows (C:) > 用户 > cie > 下载 > 25f9bc5d-b98c-4647-a785-733244a72461 >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二)

侯丽娟《圣经》

贾昕璐《心理学概论》

梁红梅《现代物流管理》

刘敏《中国古典诗歌赏析与诵读》

张汉妍《大学英语》

胡远慧《电影音乐欣赏》

廖楠《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DOC 文档
31.5 M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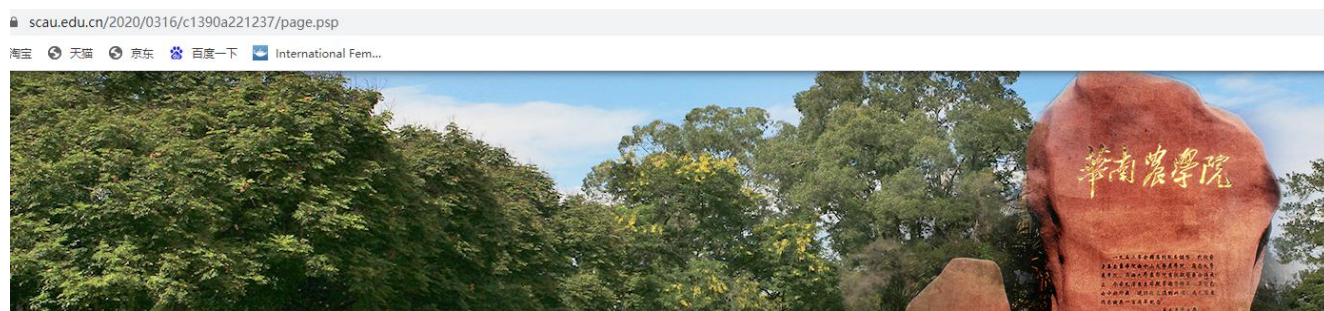
余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DOCX 文档

郑成英《学英语IV (阅读)》
DOCX 文档
18.0 KB

周海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DOCX 文档

161

2020 年 3 月获选校级“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 截图



关于学习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的通知

审核发布：教务处 来源单位及审核人： 发布时间：2020-03-16 浏览次数：1489

各教学单位、全体教师：

为帮助教师们更好地开展在线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优秀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教务处组织开展了在线教学优秀案例（第二批）征集工作，遴选了部分优秀在线教学案例供全体教师参考借鉴，请大家自行下载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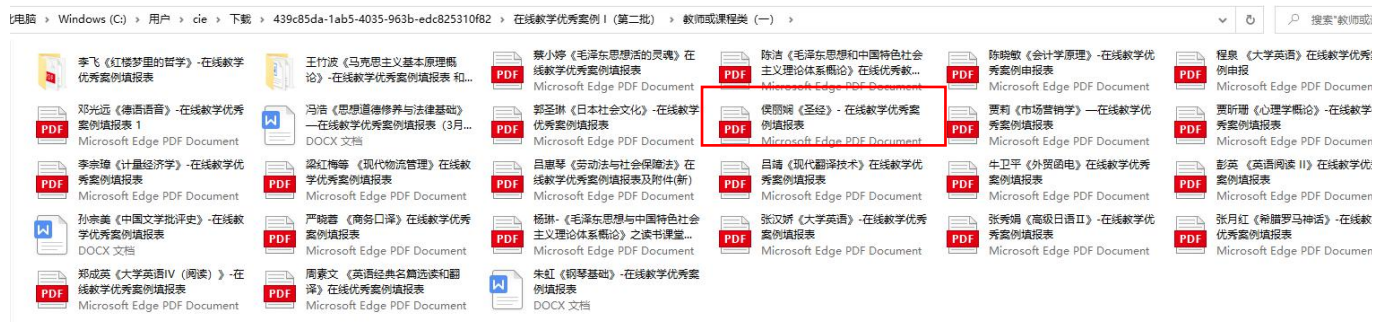
教务处

2020年3月16日

附件：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I（第二批）.rar

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II（第二批）.rar



获选华南农业大学 2019-2020 年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候选人，代表外院参加现场教学环节评比（截图）

scau.edu.cn/2020/0925/c5875a253242/page.htm



关于评选华南农业大学2019-2020学年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现场教学环节候选人的公示

审核发布：人力资源部 来源单位及审核人： 发布时间：2020-09-25 浏览次数：3285

各学院（部处、中心）：

根据《关于评选华南农业大学2019-2020学年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的通知》要求，经各学院（部处、中心）推荐、学校资格审查等环节，符合条件的29位候选人进入现场教学环节，现予以公示。

序号	单位名称	候选人姓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候选人姓名
1	农学院	连腾祥	2	农学院	金晶
3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李培	4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林蔚
5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陈祖慧	6	园艺学院	刘朝阳
7	兽医学院	梁晓欢	8	动物科学学院	孙宝丽
9	资源环境学院	李博	10	资源环境学院	梁瑜海
11	海洋学院	李雪竹	12	生命科学学院	张雪莲
13	生命科学学院	刘太波	14	工程学院	姜焰鸣
15	食品学院	沈兴	16	材料与能源学院	刘雄
17	数学与信息学院	王国华	18	数学与信息学院	李朝
19	数学与信息学院	林利云	20	经济管理学院	龙思颖
21	公共管理学院	刘卓君	22	人文与法学学院	李飞
23	外国语学院	郭圣琳	24	外国语学院	侯丽娟
25	艺术学院	周兮	26	艺术学院	赵娜
27	艺术学院	梁丹莹	2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何艳玲
29	体育教学研究部	刘建涛	/	/	/

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至10月1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实名向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反映，匿名及其他形式的异议恕不受理。

联系人：卢菁 崔芸 吴长芹

地址：行政楼303室

电话：85285590

邮箱：447948511@qq.com

从 2019-2020 年第二学期开始，连续 9 个学期教学评价排名前 20%，
本科生院数据截图如下

<div>HR 华南农业大学人力资源管</div> <div>系统首页 职称评审 2024年度职称评审</div> <div>侯丽娜</div>										
<div>表9-A 近五年本科生评教结果</div> <div>此数据来源于本科生院，按照时间倒叙排列，申报人无法填写或更改</div> <div>重获数据 本页数据完整性校验</div>										
<input type="checkbox"/>	操作	学年学期	分数	参评人数	单位排名	开课单位	排名占比	数据来源	业绩审核意见	业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1-2022学年...	96.21	134	139-1	外国语学院	0.72%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19-2020学年...	92.4	306	138-26	外国语学院	18.85%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0-2021学年...	98.9	91	145-2	外国语学院	1.38%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1-2022学年...	95.245	111	143-5	外国语学院	3.50%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0-2021学年...	94.8	61	134-5	外国语学院	3.74%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3-2024学年...	98.805	138	136-2	外国语学院	1.47%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2-2023学年...	97.15	135	140-12	外国语学院	8.57%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2-2023学年...	97.25	71	137-15	外国语学院	10.95%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3-2024学年...	98.95	119	132-3	外国语学院	2.27%	本科生院	通过	
<input type="checkbox"/>	上移 下移	2024-2025学年...	97.14	129	127-46	外国语学院	36.22%	本科生院	通过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统战部

2022 年华南农业大学统战理论政策研究 专项课题立项通知书

侯丽娴同志：

经审核，您申报的课题《港澳台侨统战工作新趋势研究：以香港青年短视频生产中的大湾区认同机制为例》（一般资助，项目编号：TZ2022007）被列为 2022 年华南农业大学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专项课题。

课题参与者：柳青、丁依若、赵轶哲。



经过科学研究院通过的社会服务内容，包括：

- 1. 为国外 SSCI 期刊 Feminist Media Studies、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审稿，为国内 CSSCI 期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审稿。
- 2.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 3. 参加学院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与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UCD) 督导 Dr. Alex Runchman 进行交流。

HR 华南农业大学人力资源管

系统首页

职称评审

2024年度职称评审

侯丽娟（教职工）

申报须知

申报信息

基本信息

工作负面情况说明

思政素质和师德师风

相关经历与培训、实践

学生工作等相关经历

生产实践锻炼情况

科技推广专家情况

社会服务工作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训

破格条件

表4 社会服务工作量情况（研究系列推广型申报人员必填）

新增

编辑

数据完整性整体校验

提交

操作	年度	服务概况	年度工作量	备注	附件	数据来源	业绩审核意见	业绩审核意见说明
<div>上移 下移</div>	2019年	为国外学术期刊F...	3		社会服务工作量2...	个人填写	通过	
<div>上移 下移</div>	2020年	参加学校或学院...	33	根据广州都柏林...	社会服务工作量...	个人填写	通过	
<div>上移 下移</div>	2023年	为《广州大学学...	12		社会服务工作量2...	个人填写	通过	
<div>上移 下移</div>	2024年	在国际学术会议...	2		社会服务工作量2...	个人填写	通过	